

第一部分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VOL1 和 《资本论》 VOL1 笔记

本文借助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一书，对《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些概念本身和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简单概括和整理。

Note 标记，不是原文自带，而是对笔者个人来说，Note 段落有助于理解中国当前形势的内容。

第一章 天才资本家海大富的《资本论》第一卷实践记

我们首先假设在 18 世纪末，一个名为海大富的英国人作为“可敬的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员工，被派往印度，收取印度人民田赋。靠着高的离谱的田赋，肥了东印度公司，也肥了海大富，还有就是饿死了很多印度人。

海大富比较恋家不喜漂泊异国，带着他的第一桶金回到英国曼彻斯特市。当时英国正在实行“公有地圈围法”^{[1]832}，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做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许多农民失地，并且失去了生产资料，向城市游离寻求工作。之前的殖民掠夺和这里使农民与生产资料剥离的活动都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海大富适时地开办了一家棉纺织工厂，并招入多名廉价失地农民。

产品生产过程中，转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叫作不变资本。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他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体现必要劳动时间的、等同于可变资本的劳动力价值，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导致了资本家们无限制的竞争，竞争的强制规律又导致资本家对于增加剩余价值的不懈追求，海大富向往自由轻松但也不能免俗，只能坠入这无休止的循环。

他引进了先进机器。因机器的引入，使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另外可简单通过提高机器速度，扩大工人劳动范围——增加工人可以控制的机器数目等手段增加工人劳动强度。缩短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工作日中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量的比例，由此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相对剩余价值。

工人们的主粮是面包，面包是他们基本和占比较多的生活资料。恰逢英国面包业生产力大幅提高，导致面包价格下降较多，导致整个资本家阶级受益，所有的工人劳动力价值降低，这也使相对剩余价值得到提高。

海大富以前就通过直接延长工作日来获取更多利益。引入机器后，因为机器不使用所带来的没有剩余价值作为补偿的折旧费用（虽然与因为使用而带来的机器损耗相对立），和机器面临的无形损耗——现有机型贬值或者出现更好机器——所带来的现有机器的交换价值贬值，

更加促使海大富延长了工人劳动时间。通过延长工人工作日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绝对剩余价值。

随着工作强度、时长日益增大，工人们也越来越不满，常常嚷嚷着工厂要遵守劳动基本法，还要求一天工作最多十小时，还说不然就闹罢工，砸机器，上法院。海大富心想要及时制止住这股歪风邪气，就从牛津请了个砖家西尼尔来给工人们上课。砖家一张口，就知有没有，西尼尔给工人们算了一笔账，疾呼“你们工厂最后一小时才产生利润啊，海老板是活菩萨啊”，感动得工人们鼻涕一把泪一把，还没听完演讲就回去继续十二小时工作了。海大富都要被自己感动了，仔细一算，才明白西尼尔的把戏简单来说是将被消费的生产资料与转化生产资料为产品价值的劳动力，这两个本来同时进行的部份进行了分离压缩，然后只对工人付出的劳动进行了大减法，却没减去分毫生产资料的价值。

生产完商品后，就是卖商品了，我们睿智的、从不失败的资本家海大富总能顺利卖出他的商并得到货币^①。商品出售后所得的货币额，包含海大富最初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不变资本 + 可变资本）和剥削工人劳动所得的剩余价值。海大富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这叫做资本积累。具体地说，积累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

海大富是个脸盲，他没有办法从相貌看出任何两个人之间的不同之处，但在他的内心中，他、是以价值来衡量和标记一切他物他人的。每件物品都有他的价值，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每个工人都生产他们的价值。海大富心中只有商品，没有人名，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有评论家指出

$$\text{剩余价值率} = \text{剥削率}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可变资本}}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劳动力价值}}$$

，并狂言资本家追求的就是剥削率。乖乖，我们海大富是个成熟的、睿智的资本家，但绝不是虐待狂和剥削狂啊。他对这一无耻言论表示非常遗憾。他说一个成熟的资本家所关心的其实是利润率，也就是

$$\text{利润率}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不变资本} + \text{可变资本}}$$

，虽然剥削率和利润率公式的分子是相同的，但这只是一个意外。并且作为一个成熟资本家来说，看见利润率这个公式其实是非常敬畏的，因为随着劳动率的提升，不变资本在预付资本中所占比重必将越来越大，这有可能是驱使资本主义进入利润率下降的周期性危机之一。据说一个著名的马姓学者在一本名为《资本论》第三卷的书中有此论述^{[2]144}。

脸盲与只重利润率不重剥削率均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

商品价值是靠创造价值的工人劳动得以体现，但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只能看到死的物，而不知工人，这也是拜物教性质。

^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般假定资本按正常方式完成自己流通过程，要到第二卷才论述资本流通过程。另外，马克思站在宏观一般分析角度上，还假设资本主义生产者独得全部剩余价值，没有将其分为不同类人占据的不同部分。如利润、利息、租金、税收等。

为了价值增殖，资本家海大富也不拥有真正的自由，他必须将利润（剩余价值）进行再投资，以实现资本的再生产，这也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它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替换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不止工人，资本家也不例外，海大富只有在行使资本职能时才是资本家，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

海大富的生意越做越大，劳动生产率明显比其他同行要高，工人们贡献的剩余价值也大。偶有工人要求涨工资时，他就说“外面劳动市场那么多人没活干，你还嫌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工人们立刻就不敢作声了。

海大富凭借着自己商品剩余价值比其他同行高一截的优势，略微降价就把其他同行们打的七零八落，有些同行变成了工人，有些同行把自己厂子卖给了他。人们都喜欢资本英雄，纷纷带着自己的钱来投资海大富厂子，经过一系列兼并整合，海大富成立了棉纺织托拉斯股份公司，全国棉布供应均由这个垄断的托拉斯说了算。

虽然海大富聪明智慧，生意场上屡屡得胜，仍感觉竞争压力巨大，对资本增殖的欲望也日益增强。通过借助货币资本的信用手段，他一步步纵向垄断产业链，横向价格战或收购或合作垄断了本行业竞争对手。在这一过程中，海大富公司从卡特尔、辛迪加扩张到托拉斯垄断。

垄断之路实在是太艰辛。现如今不止工人，就连资本家群体、国家也怨声载道，埋怨海大富剥削了所有人。号召联合起来抵制、打压、拆分海大富。海大富发现自己风头太盛，惹人嫉妒。

但他已经发现了一个道理——钱可以生钱。这也是资本拜物教。一个罗马时代的万元户，靠每年放贷 10% 的收益，那么到了 18 世纪，所拥有的财富将比全世界有货币以来的所有财富加起来还要多的多。于是，他顺势响应号召，主动将一些垄断资产较为低廉的出售，并投资慈善事业。成为举世闻名慈善家的同时，海大富藏身幕后，将巨额金钱投入到了银行、金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货币，海大富成为了超级信用金融资本家。知道内情的权贵富豪们背地里称他为康采恩·海。

海大富后半生致力于办大学，办基金会，宣扬资本自由化、市场看不见的手大于国家、组织管制的“自由价值观”，并名垂青史，令人仰望。

王权是什么鬼？总统、首相、世界政治不过是海大富的手中玩物，他要谁当谁就当。海大富一生未出任政府要职，每当别人说他统治世界，他都以此否认，我连个科长都不是。这叫啥？这叫统治阶级不统治。

第二章 大卫·哈维对资本论的解读笔记

大卫·哈维书中对《资本论》第一卷进行了辩证的导读和再评估，除对马克思的敬仰外，也结合《资本论》问世 150 余年以来世界历史和思想的变动状况，以及个人知识背景和社会、政治阅历对《资本论》一些内容做了修正或批评。

以下几点是哈维对马克思的几点解读和批评，这些解读和批评在笔者看来是务实且具进步意义的。

1. 只有读至《资本论》的结尾，我们才能充分理解这些概念的作用。……马克思就是从洋葱表皮开始，透过外部显示的层层包裹，一直到达它的核心，即概念的内核（剩余价值）。随后，他再次将论点向外展开，通过不同的理论层次而逐渐返回表面（货币资本等）。当回到实践王国时，论点的真实力量才变得更为明确。^{[2]9}
2. 原始积累。哈维继承和发扬了罗莎·卢森堡的“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是以这种动态关系为中心的，即持续的原始积累和贯穿于《资本论》所描述的扩大再生产体系的积累动力之间的动态关系”，哈维倾向于将原始积累“称为通过剥削手段而进行的积累……特别是通过采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策略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抢劫”^{[2]328-336}。也就是说，原始积累并非是马克思认为的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前，而是贯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的。
3.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在一些著作中论述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但是从没有下过决定论。哈维认为这观点带有错误的宿命论和因果关系，失却了马克思的辩证哲学，是被马克思的“朋友和他的敌人们”误解了^{[2]211-218}。哈维认为，根据《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章节的第 4 个脚注，与自然的关系、技术、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日常生活的再生产、对世界的精神观念这六者是一个生态的整体，每个时刻都紧密地内化了其他所有时刻。虽然哈维在此说六者互相内化的这一框架有助于通过一个基本的方法，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础。笔者却感觉这恰恰是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希望诸位大神指导下我，答疑解惑。

根据以上说法，哈维认为马克思所说“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是错误的，因为哈维据以上六个方面互相内化的理解，认为“技术和社会关系是相互整合的”，“技术在社会整体中，不是中立的”^{[2]237-238}。

4. 哈维针对“拜物教”的了解敏感而深刻。他常指出《资本论》中贯穿全文的显性或者隐性提及的“拜物教”现象，并对这一现象做了相当精彩的阐述。笔者在上文笔记中有所提及，在此不再赘述。
5. 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之上的剩余价值论。“价格是否可以在它们的价值之外附加其他的东西？它们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与价值无关，在所有范围内的量化波动，并且马克思为什么如此关注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维护他自己的判断……我认为马克思可能会求助于物质基础的概念：如果每个人都试图以瀑布的壮丽场景为生，或进行良心和荣誉的交易，那么将没有人能够生存。实际生产，通过劳动过程的实际的自然变换对我们的存在至关重要……”^{[2]64}。哈维认为马克思所做的论述，相比起对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演化做一个历史性的论述来说，更多的是在进行一种逻辑的陈述（以对古典自由政治经济学的乌托邦主张的批判为基础）^{[2]94}。像哈维所说，“如果你想按照马克思的原意理解《资本论》，你就必须准备好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这些原则去接受某个观点，至少直到你读到书的结尾时都应该是这样”。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兴趣，相较于对政治经济原理的细微解析来说，其实更多将重心放在人类的异化、被剥削、被损害上，所以他不喜欢承认自己是经济学家，也不喜欢承认自己是社会学家，这两方面在他看来都无视或轻视了人类被剥削的更深层的原因和关系。也如哈维所说，马克思是有浪漫色彩的。
6. 通过阶级策略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因为政府干预劳动价值，如纽约市不对食品征税，还有在英国历史上因资产阶级压倒封建地主阶级导致《谷物法》的取消，这些有意识的阶级策略和国家干预使得工人能够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增加了，从而造成工人劳动力价值降低，进而提高了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理论框架里没有这些，他坚持对自由市场的乌托邦主义的限制性假设^{[2]183}。
7. 供需关系。哈维说，“马克思认为，供需关系在一种特定商品形成价格的变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表面作用，但是当供求达到均衡时，他认为，供给和需求就不能解释任何事情了……这必须由完全不同的原因来解释，即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价值”^{[2]184}。借鉴自劳动的“必要价格”（重农学派）或“自然价格”（亚当·斯密）。
8. 工厂模式。哈维认为马克思受限于曼彻斯特大工厂模式，没有考察伯明翰之类地方的手工合作模式等。资本主义倾向于保留一种对劳动体系的选择。如果它们不能通过工厂体系获得足够的利润，他们就愿意回到对家庭体系的选择。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长期特点（选择）是，不同劳动体系之间的竞争，将成为追求剩余价值的斗争中资本用来对抗劳动的工具。笔者认为这一方面两人都很难说错，中国当代的互联网公司就像当时的曼彻斯特大工厂，甚至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巨额资本量、涉及多种产业、产业链和优势产业的垄断模式等，马克思大工业的论述在这里常常高度

契合。而哈维说的也无错，真正的资本市场，是活跃的，多样的，像马克思所说是革命性的生产方式。这方面现实的经验已经足以脱离理论直接证明这点^[2]²⁴⁵。

9. 一般与个别。

- (a) 马克思在《大纲》中提出，他写作《资本论》的目的为阐明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这就意味着《资本论》集中于阐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抽象和排除掉他称之为“个别的”分配（利息、租金、税收、甚至实际工资和利润，哈维认为如果对这些个别分配细致分析的话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论），因为它们都是偶然的、相关的和具体时空瞬间的。对供求关系也是做得平衡的假设。（详情请看读资本论第二卷）
- (b) 《大纲》中，马克思认为，消费是最难分析的，如同对使用价值的研究^①，消费“实际上属于经济学之外的领域。”。

哈维认为这导致我们需要超出马克思已经提出的见解，创造出新的理论，如信用、利率、城市化、经济危机等。

^① 在大卫·哈维另一本书《叛逆的城市》中文版中第 37 页译者注中，译者叶齐茂、倪晓辉认为哈维将“使用价值”和“消费”做了替换，两位译者不认同这种做法。

第三章 经典原文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8}

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53} (在^{[2]26}, 哈维将这里的劳动生产力与价值画了等号?)

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 (Note: 通过劳动加工自然物质), 作为有用劳动, 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 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56}

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 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 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 那么不用说, **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1]61} (Note: 哈维说, 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 实际上你无法直接看到、摸到或感觉到社会关系; 他们是非物质但却客观存在的。那么马克思是严格唯物主义吗?)

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 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Note: 在此不平等的生产方式基础上, 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存在没有平等的交换……也不存在不可通约的平等。”)

(哈维对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看法) 这三个不同的概念可以基本被内化于不同的时空中。使用价值存在于事物的物理物质世界, 交换价值包含在运动的相对时空和商品交换中, 而价值只能以世界市场的相关时空概念来理解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非物质的关联性价值存在于正在演变的、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时空中)。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 而对它的科学分析, 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 就是说, 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 **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 (人们已经把这些形式看成是不变的了) 以前, 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 **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 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 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 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 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1]93}

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1]93}

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物。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Note：资本论中，为数不多的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未来的描述。）^{[1]96}

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1]123}（Big Note）

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象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里面——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哈维 Note：价格是否可以在它们的价值之外附加其他的东西？它们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与价值无关、在所有范围内的量化波动，并且马克思为什么如此关注劳动价值论？……我认为马克思可能会求助于物质基础的概念：如果每个人都试图以瀑布的壮丽场景为生，或进行良心和荣誉的交易，那么将没有人能够生存。实际生产，通过劳动过程的实际自然变换，对我们的存在至关重要；而且正是这种物质劳动形成了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2]65}）（Big Note）

有些人喜欢将辩证法严格地理解为论点、对比和综合。但是马克思在这里所阐述的是没有经过综合的论点。这里只存在矛盾的内在化和更大程度上的适应。矛盾永远不能得到最终解决；它们只能在一个永恒运动的体系中（像椭圆），或者在更大范围内被复制。……这种矛盾存在一种永久扩张的趋势。

由于这一原因，我对将马克思的辩证法当成一种封闭的分析方法的人们有些不耐烦。他不是确定的，相反，他不断地扩大，而且在此它正在准确地解释它是如何扩大的。……这个论点的变化是一个持续的重塑过程，包括对矛盾陈述的重新措辞和扩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资本论》中会出现这么多重复的地方。马克思的思想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追溯到

前面所论述的矛盾，以便解释下一个矛盾将会在哪里出现。(Big Note)^{[2]67}

凯恩斯花费了大量精力研究他所称的“流动性陷阱”，在其中一些市场上发生，使那些持有货币的人感到紧张，所以他们更愿意持有货币而不是用于投资或花掉它，从而造成了对商品需求的下降。突然间人们不能卖掉他们的商品。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地困扰着市场，而且更多的人也都紧紧抓住他们手中的货币，这是他们安全的保证。其后，整体经济就呈螺旋状下降。凯恩斯的观点是，政府必须接入经济，并通过创造不同的财政刺激政策来扭转这一进程。随后私人储藏的货币将被引诱回市场。^{[2]72} (Big Note)

货币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甚至对黄金来讲都有问题，而且问题已经变得更加深入和令人难以捉摸了。……并不是说这个问题不存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混乱与不同国家经济体中的物质生产率的不同有关。马克思所提出的货币形式和商品价值之间存有问题的关系，目前仍伴随着我们，而且他率先提出的分析提纲是非常开放的，虽然当代的表现形式与当时完全不同。^{[2]75}

在质的方面，或按形式来说，货币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悖斯式的积累劳动。他们同世界征服者一样，这种征服者把征服每一个新的国家只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国界。^{[1]156} (Note)

我们可以说，商品交换的扩大必然导致货币形式的出现，而且，在货币形式之间存在内部矛盾，反过来，也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流通形式的出现，在其中货币被用于得到更多的货币这就是到目前为止可以粗略总结出的《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观点。(Note: 大卫哈维认为这是马克思**错误的历史决定论**：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不可避免的阶段，它的出现源于商品交换的逐渐扩大。哈维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合理的逻辑**，需用“可能”、“好像”、“也许”来替代“必须”)。

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①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销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来代替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Big Note)^{[1]162}

让我们回到 2005 年，那是存在一种共识，即在世界市场上游荡着**大量的流动性剩余**。银行家持有剩余的基金，几乎向所有人出借，甚至包括那些没有信誉没有足够钱的人……因为像房子这样的商品是一种安全的赌博。但是，后来房子的价格不再上升了，而且当债务到期时，有越来越多的人无力偿还。在那个时候，流动性突然枯竭。钱在哪里？美

① 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马克思在第 3 版上加的注)

联储突然间不得不向银行系统注入大量的基金，因为现在“货币是唯一的商品”。^{[2]85}

在一定的历史时刻，流动媒介的突然短缺，同样也会引起危机。从市场上收回短期信用，可能引起商品生产的萎缩。……但是银行收回了流动性，造成了经济衰退，能够存活的公司也倒闭了，它们由于缺乏获得支付手段的渠道而不得不出售公司。西方资本和银行随后进入并以几乎免费的成本全部收购了这些公司。^{[2]86} (Big Big Note)

国家的货币政策不会免除国家对跨越世界市场的商品交换的流动所起的规制性的影响。^{[1]88}

(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我已经对下述问题提出过多次质疑，即，马克思是在进行一种逻辑的论述(以对古典自由政治经济学的乌托邦主张的批判为基础)，还是对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演化做一个历史性的论述。总的说来，虽然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增长提供条件所必须的环境的考虑中(例如，国家的作用与不同货币形式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获得重要的历史洞察，但我更倾向于采取哪种历史性的逻辑阅读的方式。(Big Note: 可以参看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序言和其他部分)^{[2]94}

封建秩序、土地所有权和封建土地控制权的阶梯，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力量完成的。你也可以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对这一主题非常明确的论述。

(Big Note: 下面马尔萨斯、卢森堡、马克思的不同论述非常重要，我单独列出)

马尔萨斯证明了一种非生产的消费阶级会永久存在(资产阶级寄生虫)。马尔萨斯还通过提出这一消费者阶级也可能存在于国家之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他的观点，即对外贸易，甚至外国的供奉，也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这在后来成为罗莎·卢森堡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即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必须存在的有效需求，最终只有靠与外部建立某种联系来保证——简而言之，通过施加帝国主义者强加给她的对供奉的索取。

马克思的一些论点：

我们拿表现为单纯的商品交换的流通过程来说。……就使用价值来看，交换双方显然都能得到好处。双方都是让渡对自己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而得到自己需要使用的商品。……因此，就使用价值来看，可以说，“交换是双方都得到好处的交易”。就交换价值来看，情况就不同了。^{[1]183}

因此，商品流通就它只引起商品价值的形式变换来说，在现象纯粹地进行的情况下，就只引起等价物的交换。连根本不懂什么是价值的庸俗经济学，每当它想依照自己的方式来纯粹地观察现象的时候，也都假定供求是一致的，就是说，假定供求的影响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就使用价值来看，交换双方都能得到利益，但在交换价值上，双方都不能得到利益。不如说，在这里是：“在平等的地方，没有利益可言。”诚然，商品可以按照和自己的价值相偏离的价格出售，但这种偏离是一种违反商品交换规律的现象。商品交换就其纯粹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因此，不是增大价值的手段。

因此，那些试图把商品流通说成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的人，其实大多是弄混了，是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淆了。^[1]184-185

商品之间就只有一种区别，即商品的自然形式和它的转化形式之间的区别，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区别。

假定卖者享有某种无法说明的特权，可以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但是，他当了卖者以后，又成为买者。现在第三个商品所有者作为卖者和他相遇，并且也享有把商品贵卖 10% 的特权……商品的这种名义上的普遍加价，其结果就象例如用银代替金来计量商品价值一样。商品的货币名称即价格上涨了，但商品间的价值比例仍然不变。

我们再反过来，假定买者享有某种特权，可以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在这里，不用说，买者还要成为卖者。他在成为买者以前，就曾经是卖者。他在作为买者赚得 10% 以前，就已经作为卖者失去了 10%。结果一切照旧。因此，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货币的转化为资本，既不能用卖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来说明，也不能用买者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来说明。^[1]187

在流通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只是作为卖者和买者相对立。说生产者得到剩余价值是由于消费者付的钱超过了商品的价值，那不过是把商品所有者作为卖者享有贵卖的特权这个简单的命题加以伪装罢了。卖者自己生产了某种商品，或代表它的生产者，同样，买者也是自己生产了某种已体现为货币的商品，或代表它的生产者。因此，是生产者和生产者相对立。他们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买，一个是卖。商品所有者在生产者的名义下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在消费者的名义下对商品付出高价，这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①

因此，坚持剩余价值来源于名义上的加价或卖者享有贵卖商品的特权这一错觉的代表者，是假定有一个只买不卖，从而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从我们上面达到的观点来看，即从简单流通的观点来看，还不能说明存在着这样一个阶级。但是，我们先假定有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不断用来购买的货币，必然是不断地、不经过交换、白白地、依靠任何一种权利或暴力，从那些商品所有者手里流到这个阶级手里的。把商品高于价值卖给这个阶级，不过是骗回一部分白白交出去的货币罢了。（Note: 这不正是帝国主义吗？）

可见，无论怎样颠来倒去，结果都是一样。如果是等价物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物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②[1]190

① “利润由消费者支付这种想法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消费者又是谁呢？”（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 年爱丁堡版第 183 页）

② “两个相等的价值相交换，既不增大也不减少社会上现有价值的量。两个不相等的价值相交换……同样也改变不了社会上的价值总额，因为它给这一个人增添的财富，是它从另一个人手中取走的财富。”（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 年巴黎第 3 版第 2 卷第 443、444 页）这个论点是萨伊几乎逐字逐句地从重农学派那里抄袭来的。

从某些方面讲，上述关于有效需求的论述存在问题，而且罗莎·卢森堡在这一问题上，也向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强烈的挑战，她认为，**以帝国主义为主导的、与非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形成，为解决有效需求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从那以后一直存在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但是，在这些段落中，马克思只是关注剩余价值是如何生产的，而没有关注它可能通过消费，如果被支付和实现的。剩余价值必须在它被消费之前被生产出来，我们不能通过诉诸消费过程来了解他的生产过程。**

所以，这些关于有效需求的观点不能解释剩余价值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还是留在卖者也是买者、买者也是卖者的商品交换范围内吧。我们陷入困境，也许是因为我们只把人理解为人格化的范畴，而不是理解为个人。**”^{[1]188-189}

我想，正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马克思文本中的一个真正的对抗，即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对于乌托邦主义趋势批判的信任，和他为我们理解并描述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愿望之间的对抗。实际上，**马克思正在谈论的是，我们必须在一个地理意义上封闭的和完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去寻找剩余价值来源问题的答案；在这种理想的状态下，将剩余价值的来源归因于食利阶级、消费主义，或者对外贸易的观点，都必须被排除掉。……**在分析中，他没有将**有效需求**在一般意义上作为非相关的因素，因为在这里，在第一卷，他只关心生产问题。只有在第二卷，他才将着手研究价值在市场和消费领域的实现问题。^{[2]104}

必须要找到另一个方法去解决，在等价交换中，一个非等价物是如何产生的这一矛盾（例如，剩余价值）。（Big Note）

G—W—G 的形式，为贵卖而买，在真正的商业资本中表现得最纯粹。因而，商业资本只能这样来解释：**寄生在购买的商品生产者和售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人对他们双方进行欺骗。富兰克林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是掠夺，商业是欺骗。”**如果不是单纯用对商品生产者的欺骗来说明商业资本的增殖，那就必须举出一长串的中间环节，但是在这里，商品流通及其简单要素是我们唯一的前提，因此这些环节还完全不存在。^{[1]191}

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这样，就得到一个双重的结果。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必须取出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罢！^{[1]193-194}

要从商品的使用上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因此，它**

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1]194} (Note:)

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必须存在各种条件。……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

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劳动力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

可见，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1]194-195}

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是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体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1]199}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Big Note)

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1]208} (哈维 Note: 有些分析家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精神分裂了。因为存在两种马克思主义：一种是这一段的马克思，精神概念对于有意识的和有目的的活动起了重要作用。另一种是决定论的马克思，他实际上认为我们的意识和同时我们所想的和所做的，由我们的物质环境决定。哈维不认同这两种观点。)

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辩证理解，直接说明了人类的观念不可能没有任何出处。……认为观念来自物质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关系，而且一直带有那种起源的烙印的说法是不奇怪的。……当马克思提出精神的概念、意识、目的性和使命这些观点时，它们与社会演变和自然转变的动力之间是通过劳动发生联系的，所以这并不是超越常规的。相反，这是基本规律。

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1]210}

关于奴隶和工薪劳动之间关系的长篇幅脚注^{[1]229}……当这两种劳动体系相互碰撞并变得具有竞争性时，其产生的影响是特别有害的。在市场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竞争性鞭挞下，奴隶制会变得更加残忍，同时，相反地，奴隶制也对工资和工作条件施加了强大的负面压力。……在一个纯粹的奴隶体系中，不存在抽象劳动，……这一理论只在自由劳动的情况下才起作用。记住，对于马克思来讲，**价值不是普遍的概念，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工薪劳动的一个特殊概念。**（Big Big Note）

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①。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1]204}。

不变资本是已经凝结在商品中的过去劳动，它在目前的劳动过程中被用作生产手段。生产手段的价值是既定的。

可变资本，即出让的、用于雇佣的劳动者的价值。

死劳动被活劳动重新唤醒，并被转移到新商品的价值里。

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不同的量。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他的卖者所有。^{[1]225-226}

劳动价值论是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何通过劳动者被凝结在商品中的理论。这是由货币商品和一般货币代表的价值的标准。在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价值，只是在市场上作为劳动力被出卖的商品的价值。（Big Note）^{[2]149}

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

①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公元1748年2月15日—公元1832年6月6日）是英国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有用哲学即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他来说，个人的利益是一切行动的动力。然而，一切利益，如果正确加以理解，又处于内在的和谐状态中。各个人的正确理解的利益也就是社会的利益。

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但是这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伸缩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1]269}

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拜物教）。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吸吮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吸吮活劳动才有声明，吸吮的活劳动越多，他的生命就越旺盛^{[1]269}。。

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特殊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1]271}
(Big Big Note)

马克思指出，工作日长度的问题，不能通过诉诸权利和交换的规则和合法性来解决。这种问题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解决，即“力量”能够决定“公平权利”之间存在的问题。……许多政治力量已经投入这样一种观点，即，诉诸个体的人权是塑造一个更人道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途径。马克思在这里发出的信号是，如果不能重新塑造阶级斗争的含义，那么，在权力领域产生的许多重要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在平等的权力之间，不能进行公正的判决。(Big Big Note)^{[2]152}

如果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不过，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1]272-273}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76}

“分钟”和“秒”只是在17世纪后期才开始成为通用的计时单位，直到最近一段时期，像纳秒这样的概念才被发明出来。时间单位的发明，不仅有自然的，而且有社会的决定因素。^{[2]163}

我们看到，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详尽的规定，决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1]326}

工厂视察员的出现是有土地贵族促成的，是为了限制无情的产业资本家的权力。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劳动条件变得更加恶劣了。……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倾向以及部分劳工运动造成的权力的损失所带给我们的结果。悲观地说，马克思的分析与我们当代的情况也是戚戚相关的。

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1]312}

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成熟阶段上，是无抵抗地屈服的。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1]346}。

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像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1]194}

这一规律同一切以表面现象为根据的经验显然是矛盾的。每个人都知道，就所使用的总资本两个部分各占的百分比来说，纺纱厂主使用的不变资本较多，可变资本较少，面包房老板使用的可变资本较多，不变资本较少，但前者获得的利润或剩余价值并不因此就比后者少。要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还需要许多中项，就像从初等代数的角度来看，要了解 $0/0$ 可以代表一个真实的量需要很多中项一样。尽管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表述过这一规律，但是它却本能地坚持这一规律，因为这个规律是价值规律本身的必然结果。古典经济学企图用强制的抽象法把这个规律从现象的矛盾中拯救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李嘉图学派是怎样被这块拦路石绊倒的。“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的庸俗经济学，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各处一样，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它与斯宾诺莎相反，认为“无知就是充足的论据”。^{[1]355-356}

相对剩余价值……在历史上，还产生了由国家组织的干预劳动价值的策略。例如，为什么纽约州不对食品征收消费税？因为那是基本的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因素。一种情况是，产业资产阶级曾经支持控制租金、低廉的（社会的）住房、对租金和农产品的补贴，也是因为要将劳动力的价值降低。所以我们能够指出很多都是曾经并且现在仍是由阶级策略提出的，通过国家机器来降低劳动力价值的情况。^{[2]183}（Big Big Note）

无限制的竞争不是经济规律的真实性的前提，而是结果——是经济规律的必然性得到实现的表现形式。对于象李嘉图那样假定存在着无限制的竞争的那些经济学家们来说，这就是假定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特征的充分现实性和充分实现。因此，竞争不能说明这些规律，它使人们看到这些规律，但是它并不产生这些规律。^{[3]47}（Big Note）

工人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剥削率也可以提高。……不幸的是，马克思没有强调这一点，因为它会很容易地预先设置一个错误的、虚假的理论和历史批判的界限。……作为历史和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由生产率获得的利益是如何被分享的。……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将工人状况不能得到改进的阶段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的阶段区别开来，在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阶段，来自生产率提高的收益倾向于在资本和劳动之间更加均衡地分享。^{[2]188-189}

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称颂工场手工业分工，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局部

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把这些说成是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同时又同样高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1]412-413}

资本家喜欢在他们的工厂内部进行的生产的有计划的组织，而憎恶任何社会性的关于社会生产计划的观念。资本家在意识形态上的抱怨正在表现出来，即计划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特别是资本家要从根本上攻击它，因为这种社会生产计划将以对他们自己的可怕工厂的印象，来重塑世界。^{[2]203} (Big Big Note)

当然，集中计划的主张是不可行的，或是由于其复杂程度，或是因为它对私有产权关系的侵害没有被清除。不可置信的市场体系的无效性（特别是在环境方面），竞争的强制规律阶段出现的残酷性，同时还包括典型地产生于工作场所的这种日益增长的专制主义，都不能说是对市场机制协调功能优越性的良好宣传。^{[2]203} (Note)

马克思经常被他的朋友，也包括他的敌人描述成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即，他认为生产力的变化主导了人类历史进程，包括社会关系，精神观念、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其它方面的演化。……我并不完全赞同追随解释。马克思在总体上回避了带有因果关系的语言，在这一脚注中，他没有说技术是“引起”或“决定”，但是他提出，技术“揭示”，或者以另外一种解释，“揭开”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和组织形式在内化了精神观念、社会关系、日常生活和劳动过程的同时，也内化了人与自然之间一定的关系。凭借这种内化的优势，对技术和组织形式的研究，就一定会“揭示或解开”关于所有这些要素的许多问题。相反，所有这些其他的要素也内化了与技术相关的问题。^{[2]211-212} (Big Big Note)

所有这些要素共同演化，而且都服从于作为整体中的动力时刻的永久更新和转变。但是，它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的整体，即，在其中每个时刻都紧密地内化了其他所有时刻。它更像一个生态的整体，即，在其中每个时刻都紧密地内化了其他所有时刻。它更像一个生态的整体，即列斐伏尔所说的“整体”或德勒兹所说的“集聚”，在其中时刻是以一种开放、辩证的方式共同演化的。……这种共同的演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均衡发展，会带来所有情况的地方的偶发性，虽然这些偶发性受卷入演化过程中的集聚中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世界市场中经济发展过程的日益增长的空间（而且有时是竞争性的）整合的限制。^{[2]214-215} (Note)

在一种商品上只应耗费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表现为竞争的外部强制^{[1]400}。

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但是人口密度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交通工具的水平可以改变密度）^{[1]408}。

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1]427}。(Big Note)

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

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1]441}。（大卫·哈维：在机器帮助下的生产机器的能力，是羽翼丰满、动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Big Note）

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不是有用劳动）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1]451}。

但因为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把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1]457}。

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化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化或均等化的趋势，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1]457}。

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试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1]487}。

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1]519}。

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一个完整的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而同时，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又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1]557}。

现代工业从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1]560}。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1]579}。

然而实际上正好相反，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变化，或者是在工作日缩短以前，或者是紧接着在工作日缩短以后发生的^{[1]60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每一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而且也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智能^{[1]605}。（Note）

在商品市场上同货币所有者直接对立的不是劳动，而是工人。工人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

在“劳动的价值”这个用语中，价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转化为它的反面。这是一个虚幻的用语，就象说土地的价值一样。^{[1]615-616}

可变资本不过是工人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这种基金在一切社会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1]655}。

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势；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

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1]677}。

美国……经济发展中百分之七十的驱动力是依靠**负债刺激**的消费主义。……表明了分配条件（金融、信用、利息）实际上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动态变化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而不是辅助性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去工业化、持续的结构性失业、螺旋性的工作不稳定和高度的社会不平等。^{[2]267}

在生产巨流中，全部原预付资本，与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换为资本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近于消失的量。……全部现存的资本都是积累起来的或资本化的（全部原预付资本的）利息，因为利息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1]678}。

它们越是整个地被使用而只是部分地被消费，那么，它们就越是像我们在上面说过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气、电力等等那样，提供无偿的服务。被活劳动抓住并赋予生命的过去劳动的这种无偿服务，会随着积累规模的扩大而积累起来^{[1]702}。

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

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何可供储蓄的东西。……因为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它们所收入的一切……要使社会（当然是非劳动者的社会）幸福，使人民自己满足于可怜的处境，就必须使大多数数人既无知又贫困。知识会使我们产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满足^{[1]709}。

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的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那么，工资就会提高。而在一切情况不变时，无酬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但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这样一点，即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生：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1]716}。

不管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比并入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相对增长，这就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1]718}。

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

社会总资本这样分散为许多单个资本，或它的各部分间的互相排斥，又遇到各部分间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这已不再是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简单的、和积累等同的积聚（单个资本的表现）。这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转化为少数大资本。

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其次，我们记得，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较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在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1]722, 723}。

资本积累最初只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但是以上我们看到，它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而实现的^{[1]722, 723}。

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1]726}。

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他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1]728}。（Big Note）

每一个资本家的绝对利益在于，从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样低廉或甚至更为低廉的花费从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劳动。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支出会随着所推动的劳动量成比例地增大，在前一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增长则要慢得多。生产规模越大，这种动机就越具有决定意义。他的力量随资本积累一同增长^{[1]732}。

法国 1850 年 9 月 5 日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是临时政府 1848 年 3 月 2 日法令的资产阶级化的翻版；这个法令适用于一切作坊^{[1]319}。

“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1]306}

《1861 年爱尔兰面包业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委员会认为，把工作日延长到 12 小时以上，是横暴地侵犯工人的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这就侵犯一个男人的家庭，使他不能履行他作为一个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所应尽的家庭义务，以致造成道德上的非常不幸

的后果。12 小时以上的劳动会损害工人的健康，使他们早衰早死，因而造成工人家庭的不幸，恰好在最必要的时候，失去家长的照料和扶持。”^{[1]292}

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他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

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1]733}。

（马克思驳斥教条的经济学）可是，在真正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因工资提高而可能出现某种实际增长以前，已经一再经过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必然发生工业战，展开厮杀，并且决出胜负（马克思驳斥教条的经济学）^{[1]733}。

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1]736}。

工人数量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但同时又超过这种需要，这是资本运动本身的一种矛盾（少年、成年、中年、老年工人）。

这种社会需要，是通过早婚这一大工业工人生活条件的必然后果，并通过剥削工人子女以奖励工人生育子女的办法来满足的。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1]739}。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平台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1]742}。

那时人们被迫从事劳动，因为他们是别人的奴隶；而现在，人们被迫从事劳动，因为他们是自己需求的奴隶^{[1]745}。

英国经济学家艾伦·伯德（Alan Budd），记录了他作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期间的经历，他承认在后期与邻里相处时感到非常羞愧，因为“20 世纪 80 年代，

通过压缩经济规模和公共指出来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只是对打击工人力量的一种掩盖。提高失业率是政府非常希望的削弱工人阶级力量的措施。当时所构建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一危机再次造就了劳动后背大军，并保证资本家获得前所未有的利润”。与李根一样……其目的还是为了加强对工人的管制，以保证资本家获得利润和无边无尽的资本积累。^{[1]308}（Big Big Note）

新自由主义的规划，是以日益增长的财富积累和资本家阶级中的上流集团对剩余价值越来越多的占有为方向的……降低工资水平，并通过技术变化来取代工人，从而造成失业，集中资本力量，打击工人组织，同时干扰市场中的供求关系，通过外包和进出口将全世界所有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都调动起来，并尽可能地压缩福利水平。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真正含义。社会必要条件已经具备，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在第一卷中的分析是一致的，即，以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在一端的、巨额财富的积累。当然，问题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只有“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才能生存。……在自由市场的乌托邦条件下，日益增长的资本积累和集中将是不可避免的。（能源、制药、媒体行业，特别是金融行业日益增长的集中趋势）……朝着更严重的寡头垄断、甚至是垄断的方向发展。^{[2]309}

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1]745}。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底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而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1]842}。

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1]858}。

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

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因此，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断涨价。

随着国债的产生，国际信用制度出现了。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劫掠！）

因为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应付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有所感觉，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一笔接着一笔的积累而引起的增税，又迫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1]865}。

一定要看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特别是国际借款等章节!!!! 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是以这种动态关系为中心的,即持续的原始积累和贯穿于《资本论》所描述的扩大再生产体系的积累动力之间的动态关系。她提出,马克思将原始积累限制在某个上古的时点、某段资本主义的史前时期是错误的。如果它不参与新一轮的、主要是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手段的原始积累,那么,资本主义应该在很早以前就消失了。

通过将农业生产者从土地上驱赶出来建设“经济特区”,是资本主义发展可持续性的一个必要的先期行为,这就像对所谓的城市居民贫民窟的清理对开发商的资本扩张及其在城市的经营行为是必须的一样。这种通过国家的主导力量或一些相应地合法措施侵占土地的做法,在近期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传播的现象。^{[2]334} (Big Big Note)

信用体系可以保证将巨大的货币力量迅速集中到一起。在股份公司和其他公司组织形式中,巨额货币的力量就被聚集在少数指挥者和管理者的控制之下。兼容和并购一直是一种大型商业行为,这种商业行为能够引发新一轮的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同时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的伎俩。为大企业的发展让路而进行的对小经营者的剥夺通常会得到信用机制的帮助,这已经是一个长期惯例了所以,关于可以用于投资的货币资本的组织,整合和集中的问题从来都没有消失。^{[2]339}

马克思所展示的是,均衡远不能自动达到,如果资本总是流向利润率最高的地方,那么,螺旋式出现的比例失调会严重地干扰资本主义的再生产。

有越多的人持有货币,经济体系的情况就越糟糕。这就是凯恩斯所称的流动性陷阱。人们必须找出将处于隐藏状态的货币引诱出来的方法,答案之一是通过负债的政府支出以重振资本循环(另一个解决方法是发动战争)。另一方面,我认为,Andrew Glyn 和其他人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重重困难中存在一个强大的利润挤压因素是基本正确的,在哪里,劳动的稀缺和强大的劳动组织显然对积累的进程起到了阻碍作用。过度的垄断同时有助于减缓生产率的增长,而且,这与国家的财政危机一起酿成了一个长期的滞胀阶段,而且这种滞胀局面只能通过加强对劳动的管制和放松竞争的强制规律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危机就会从一个障碍节点传递到另一个障碍节点,然后再重新返回。^{[2]361} (Big Big Note)

第二部分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VOL2》读书笔记

第四章 导言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只能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统一**来理解。他是说，如果在市场上不能卖出劳动过程中生产的产品，在产品中包含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就不能实现。

生产和实现的统一，就像商品一样，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内在包含两个本质上不同的趋势。……生产和实现之间的矛盾导致危机频繁爆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还有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从来也不能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4]350}（Big Note）

市场上有效总需求的不足，会成为资本持续积累的严重阻碍，而工人阶级的消费是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中，这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要么最大化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结果是威胁到市场上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要么改善工人待遇，保持充足的有效需求，结果是影响生产中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资本（在与劳动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之后）转而倾向于**总供给管理**，与《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更相近，强调（通过降低实际工资、镇压工人阶级组织和一般性的削弱工人阶级力量等方法）为剩余价值生产创造条件。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解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燃眉之急，但代价是加剧了剩余价值实现的问题，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之后。信用扩张如何掩盖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并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达到顶峰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当然只是非常粗略的陈述，但也清楚说明了历史上生产和实现的矛盾统一运动。（Note: 之前是总需求管理）

然而，有一种办法能够缓解甚至有效地管理生产和实现的矛盾，那就是乞求于信用的帮助。这是因为，用扩大信贷供给来平衡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在原则上没有任何限制。最浅显的例子便是，金融家一面给开发商融资帮助其投机建造房屋，一面为消费者提供

抵押贷款让他们购买这些房屋。当然，问题在于这个过程太容易引起投机泡沫，正是这种泡沫的破灭引发了 2007-2008 年惊涛骇浪般的金融崩溃。

因为《资本论》第二卷是关于资本循环如何塑造自己的空间和时间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历史以生产加速和削减空间移动的成本与障碍为特征。

我创造并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时空压缩**这个短语。

除了理解上的困难，恩格斯对第二卷和第三卷文本的编写方法也存在问题。最近对马克思原始笔记和手稿的研究发现，恩格斯对原稿做了大量的改动，而且有时问题还不小。

为了纯粹地理解这些形式，首先要把一切同形式变换和形式形成本身无关的因素撇开。因此，这里不但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而且假定这种出售是在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也把在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动撇开不说。^{[4]32}

（笔者注：应当指第一二卷）“纯粹状态”也假设了一个封闭的体系，没有和外部的贸易——除非另作说明——这时资本在封闭系统中完全占据了支配地位。

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新自由主义者这样的声音：他们说，危机不是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内在的深层矛盾产生的，而是因为沒有正确地遵循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他们解决危机的办法是通过严厉的**财政紧缩**和**解除国家权力**让资本更加回归其“**纯粹状态**”。马克思试图揭示的是，危机内在于纯粹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是必然的和常见的。不仅调控措施不能解决问题，而且经济越接近纯粹状态，危机就越可能加深（欧洲在 2012 年采取的紧缩政策明显导致了这样的结果）。(Big Note)

要不是在流动的、偶然的和唯意志论的历史、政治作品的语调和严密的、科学的、强调规律的政治经济学语调之间存在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马克思著作的两种不同类型本不会如此令人困惑。这样看起来有两种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和唯意志论——它们本来没多大关系，除非在一些相当了无生气的争论中，比如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否是个科学的问题，或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否是历史理论的组成部分，这些问题很多是由恩格斯提出的并在斯大林那里变成了教条。(Big Note: 历史唯物和目的论的矛盾吗?)

他好几次将价值比喻为地心引力。更好的比喻是流体力学规律.....流体力学不能被不加任何改变而机械地用来预报天气或分析气候变化.....它没有也不能解释现行经济气候的所有方面，更不必说预测明天的经济形势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没有用。物理学领域中没有人因为流体力学规律不能准确预测明天的天气而无视它。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经济科学，而没有直接用到历史、人类学和统计调查归纳。这一方法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最为明显，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存在。

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

总生产	普遍性	自然规律	决定性	自然的新陈代谢规律	进化论 (达尔文)
社会生产	一般性(土地、劳动、资本、货币、价值)	社会规律	决定性的	资本的运动规律	政治经济学
分配	特殊性(地租, 工资利润, 利息, 商业利润, 税收)	偶然的, 不确定的	非决定性的	阶级和党派斗争的结果; 地理发展不均衡	历史, 地理, 地缘政治

图 4.1: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的“弱三段论”分析框架

总生产	普遍性	自然规律	决定性	自然的新陈代谢规律	进化论 (达尔文)
交换	特殊性(产权, 司法, 竞争, 个体, 集中化, 垄断)	偶然的, 不确定的	非决定性的	制度, 竞争与垄断, 资本与劳动间集体与联合的形式	国家形式, 历史, 地理, 地缘政治
消费	个别性	混沌的	不可预测的	人的激情, 信仰, 欲望, 动机, 社会性和政治主体性(感情)	文化和心理分析; 人类想法、需求和欲望的生产

图 4.2: 续图 1

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 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 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行为, 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 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5]26}

这里的一般是确定的、规律性的, 特殊是偶然的、视情况而定的(例如社会斗争的结果取决于双方力量对比), 个别在我看来是变化莫测的, 潜在地是混沌的。同样我们也要注意消费这一“个别”很大程度上在“经济学之外”(就像《资本论》第 1 页中写到的, 可能属于历史王国)。

尽管这个三段论“被公认为是一致的”, 马克思说它还只是“肤浅的”。所以他拒绝了这三个三段论, 而是用辩证法研究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怎样在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总体中结合起来。马克思对生产和消费、生产和分配、生产和交换的内在辩证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后得出了结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5]37}

马克思所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机整体(总体)并不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尽管它来自于对黑格尔概念的革命性改造, 而非仅仅是简单地颠倒过来使用)。它的结构是生态系统

的，由葛兰西和列斐伏尔所说的不同时刻“总体”或德勒兹所说的不同时刻的“组合”的关系组成。马克思抱怨道：“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5]31} (Big Note)

读者也许期待马克思用辩证法和有机的理论来构建他的替代理论。但是从《资本论》的写作实践来看，即使他使用有机的思维和辩证的——关系性的分析来建构他的批判和探索另一种理论，很显然他最后还是遵循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三段论架构框架。他始终尽可能地贴近资产阶级关于生产一般的规律层次的概念，排除了具有“偶然性”和社会特殊性的分配和交换（直到在第三卷的最后部分才进行了讨论），至于混乱的消费的个别性当然更是如此。

在这里我要提出一点警告，这个排除有时是过分的（马克思应该做出说明）。（笔者注：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在第三卷中“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信用货币等），在我们的计划之外。在这里，只着重指出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特征所必要的少数几点。”^{[6]350}

我最好的假设是，马克思根本的意图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古典政治经济学自己的术语批判它本身。所以为了说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矛盾和不足，他不得不接受了这些术语的一般性质。因此如果资产阶级理论家事先假定了一个非强制的自由市场，那么马克思也需要这样做（就像他在第一卷第2章中所做的那样）。如果一般、特殊和个别之间的区别是资产阶级思维模式的基础，那么马克思也需要使用这个基础。这是我能给出的唯一答案，但还是不能完全让人满意，因为马克思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术语而拒绝了其他的。比如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没有涉及供给和需求或效用的问题（我们不久将看到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从不对自己选择的逻辑进行解释。很明显他通篇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一般、特殊和个别这三个层次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还有第四个层次——普遍性——涉及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生产视作“包裹在独立于历史之外的永恒的自然法则中”的做法表示了强烈反对。马克思反对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然化”，从不放弃任何抨击这种自然主义观点的机会（包括李嘉图学派和马尔萨斯学派认为利润率注定会下降是因为自然资源的缺乏和地租上涨的观点）。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性不能用自然法则的普遍性解释。虽然马克思同意“资本主义生产”是规律般的一般性，他还是拒绝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将其理解为纯粹“自然”的东西。资本主义虽然具有规律性的，但是这些规律（包括那些关于私人财产关系的）是人类行为的产物。

为什么要赋予生产以优先权呢？马克思认为“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这句奇怪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把支配自身的生产解释为产品和服务的物质生产，或是具体的劳动过程，甚至是商品的生产都是错误的。**非常不幸的是，这是个十分常见的误读，导致了对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思想、人类欲望等是由物质资料生产决定的说法的误解。这是生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误读，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Big Note)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主导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是社会性的，而不是

物质性的关系。，在马克思宏伟的计划中，这意味着为他人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需要扭曲和支配了人的感觉器官通过劳动过程所能获得的解放的潜能。这个结果是对人类自身潜在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普遍异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一些最有说服力的章节再三强调了这点。（笔者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同样强调了这点。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是后来人对恩格斯这句话下面部份的演绎，且过于决定论和片面化。）（Big Note）

简言之，通过资本循环进行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规律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做出的根本性突破。马克思继续写道：

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5]36-37}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事实上采取了以下形式：各种各样可能的、偶然的分配和交换结构和多样化的消费体制在原则上都是可能的，只要它们不会过度限制或破坏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从剩余价值生产的一般规律并不能直接推演出唯一的分配模式、交换体系或特定的消费文化体制。但是——这是个很重要的“但是”——它的可能性不是无限的。在任何时刻，包括与自然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过分地限制或破坏剩余价值生产能力的情况，那要么资本将不复存在，要么总体关系必须作出全面调整。这就是“决定”的含义。

供给和需求还有价格的波动对经济达到均衡状态很重要，但是均衡在哪里可以达到并不能用它们来解释。马克思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假设把这种扭曲排除在外，但有时因为系统的相关性他还是会把这些因素加入到思考中，比如在劳动价格问题上。

“竞争一般来说是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竞争使资本的内在规律得到贯彻，使这些规律对于个别资本成为强制规律。但是它并没有发明这些规律。竞争实现这些规律”。^{[3]271} 其他力量建立起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竞争仅仅是执行者和实施者，就像供给和需求那样。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1]683}

当垄断和寡头组织占据支配地位时，资本运动规律（甚至价值本身）会发生改变。这反映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还有法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中。

但是，垄断阶段之后通常会进入另一个阶段，这时竞争的强制规律的恢复成为主要的政治关切。20 世纪 70 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普遍经历了这个过程。毕竟，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中心议程。资本家经常抱怨竞争是“破坏性的”，但是垄断很容易产生“滞胀”，就像巴兰和斯威齐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经常试图在垄断（通过对经济“制高点”实行国有化）和竞争（通过反兼并、反垄断立法，以及或情愿或不情愿地走向私有化和全球化竞争）两者之间保持平衡。(Big Note)

操纵和调动人的欲望一直处在资本主义历史的中心，但马克思把它排除在了政治经济学之外，认为这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不过，它并非完全处于理论思考之外。(Big Big Note)

例如劳动者可以选择怎样花钱和用钱买什么，因此知道他们的想法、需求和欲望就变得非常重要。马克思认为，为了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保持必要的均衡，资产阶级必须操纵大众消费，以使工人的消费相对于资本主义积累是“合理的”。资产阶级的博爱于是经常体现为教导劳动者的消费习惯，使之有利于积累。奢侈品和工资品之间的差别也变得很重要。(Big Big Note)

因此，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一部分工作是对当代的消费主义找到比目前更好的解释。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在解释消费方面不太有效（马克思反对把太多消费的例子加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这同样适用于生产性消费——在商品生产的劳动过程中用劳动消费原材料。控制劳动者在工作中的个性的困难已经被认识到了（尤其是在马里奥·特隆蒂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作品中），正是这种个性蕴含着巨大的革命性潜力。

马克思认为消费是个别性而不是一般性也是因为这个道理。但是，马克思的历史著作的最终目的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演进的有机整体来理解（与强调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相反），因此任何对当代形势加以理解的尝试，都要求我们把消费、政治主体性和个体的审美、文化、政治偏好加入到研究框架中——作为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和补充，而不是作为替代品。

在一般性方面的严格限制让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的历史特殊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至今仍能阅读马克思著作的原因——即使是第二卷——而且还能够理解很多他想要表达的内容。另一方面，很难将这个框架直接用于分析我们的现实状况，这也是我们将要进行的工作。

第五章 资本循环（第二卷第 1—3 章）

在货币形态，资本可以像蝴蝶一样到处自由地“飞翔”；在商品形式上，资本就像毛虫一样，到处寻找想要、需要或是渴望得到它，有支付能力并最终消费它的人；作为劳动过程，资本植根于“生产的隐秘之处”（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提到），在这里，物质活动将自然要素转化为商品的生产。

资本在不同形态下进行的空间和地理运动的差异，对于理解我们统称为“全球化”的过程有重要启发。

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有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制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来代替的。

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惟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1]161-162}（Big Note）

使劳动力的使用权归属于买者。而使用这种劳动力的界限，和劳动力本身价格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的界限，又决不是一致的。资本关系所以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只是因为这种关系在流通行为中，在买者和卖者相互对立的不同的基本经济条件中，在他们的阶级关系中本来就已经存在。不是由于货币的性质产生了这种关系；相反，**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单纯的货币职能才能转化为资本职能**。^{[4]39}

要使资本能够形成并且能够支配生产，需要商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因此也需要商品流通从而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生产才表现为生产的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性质。^{[4]40}（Note）

那些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的情况，也促使一切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成商品的每一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4]43}

我们在重商主义体系的辩护人那里，发现了这样冗长的说教：资本家个人只应该和工人一样消费，资本家国家应该把它们的商品让给其他比较愚昧的国家去消费和进行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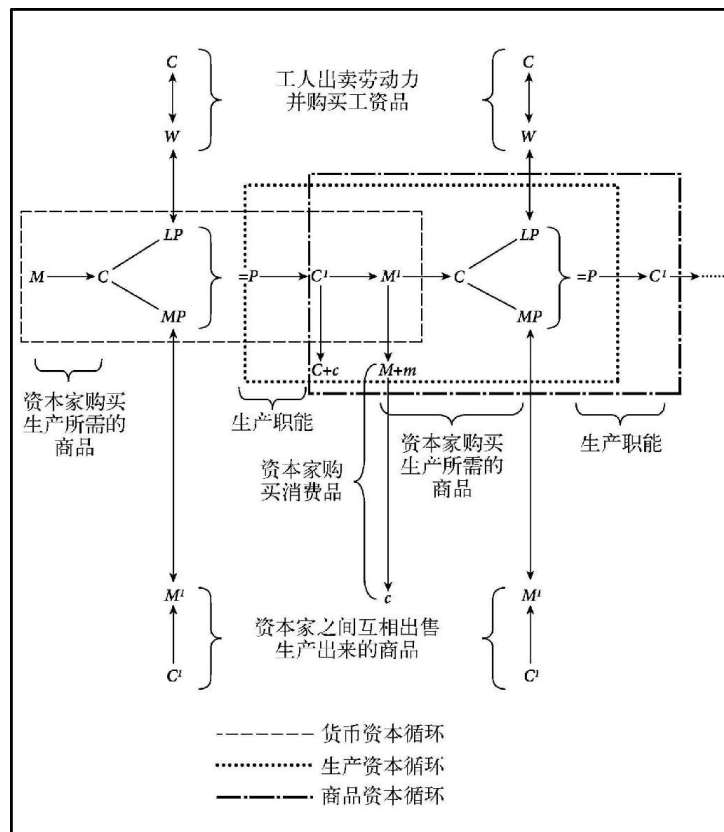


图 5.1: 产业资本循环的总公式, 三个不同循环

过程，而相反地应该把生产消费当作自己的终生事业。这种说教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往往使人想起教父们类似的禁欲诫条。^{[4]70}（Big Note）

有一些人，例如凯文·菲利普斯，相信我们在过去十几年里经历了重商主义阶段，而美国担当的正是最愚昧的国家的角色（进行债务支撑的消费主义），中国人和德国人则以美国消费者为代价储蓄和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奥巴马当局在出席 2010 年秋季在首尔举行的 G20 峰会时，提议减少全球体系中的贸易不平衡，中国和德国是反对这个提议的主要国家。所以，某种形式的重商主义确实存在，而且状况良好——美国似乎仍然乐于担当最愚昧的国家的角色。（Big Note）

只要把这种形式（货币资本循环）不是当作循环形式的一种，而是当作惟一的循环形式，它的虚幻的性质以及与它相适应的虚幻的解释就会存在。但是，它本身已经指出其它的形式。^{[4]72}

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为生产商品而购买商品。只有消费是这种生产消费（剩余价值），它才进入资本本身的循环。……这样一种由剩余价值的生产所决定的用商品代替商品，和本来的产品交换（只是以货币为中介）完全不同。可是，经济学家们竟以此证明生产过剩是没有可能的。^{[4]87}

需要着重指出一点，如果工人将收入用来赌博（甚至是储蓄），而不是用来购买商品，那么循环过程的连续性就会遭到破坏。因此第二卷最后关注建立工人阶级的“合理消费”，将之作为稳定积累的条件的问题

商品的潮流一浪一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入的潮流只是表面上被消费吞没……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有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给价就卖。这种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绝对无关。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需求**，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于是危机爆发了。**它不是表现在消费需求，即个人消费需求的直接缩减上，而是表现在资本对资本的交换，即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缩减上。**^{[4]89}（Big Big Note）

在个人消费领域表现出来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有效需求不足，事实上可能是由于生产资料的购买和售卖的循环过程出现了问题。（Big Big Note）

关于工人阶级的有效需求和消费，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有两处看似非常矛盾的论述：

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还有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从来没有能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4]350}

2.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

除了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须提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4]456-457}

第二个论述与第 2 章的精神更为一致，所以很明显，马克思认为从生产资本的角度展开的论述具有更普遍的重要性。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难题：该追随哪个观点？我自己的想法是（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这种情形可以出现，正如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那样，劳动所得占国民产出份额的上升，即便不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也至少是其先兆。但是，不可能用这个观点来分析 2007—2008 年的经济崩溃。工人阶级的分配份额，无论是过高还是过低，虽然有重要影响，但还不足以解释资本的危机倾向。

在 $P \cdots P'$ 中， P' 所表示的，不是剩余价值被生产出来，而是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已经资本化，就是说，资本已经积累。^{[4]93} (Big Big Note)

一个在资本循环之外完成的、为使剩余价值转化为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所进行的职能上确定的预备阶段……只要它停留在贮藏状态中，它就还不是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而是闲置的货币资本；不是像前面所说的那种职能中断的货币资本，而是还不能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4]97}

在将特殊形式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转化成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困难之外，我们现在再加上另一个困难：在市场中寻找必要的商品以**满足特定劳动过程中的生产性消费的需要**。资本家必须依靠其他资本家生产自己所需的生产资料。因此，主要是在商品资本的循环中，我们面临资本家之间特殊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的难题。随着第二卷内容的展开，越来越明显的是，这种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充足供应 (adequate supply) 危机**的可能性的困扰，更明显的问题可能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危机。

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撇开对外贸易）只有在剩余产品的待资本化的部分已经包含追加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时才能进行。^{[4]114}

正因为 $W' \cdots W'$ 循环在进行中要以另一个在 $W (=A + P_m)$ 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为前提（并且 P_m 还包括各种其他资本，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包括机器、煤炭、润滑油等等），所以，这个循环本身就要求我们不仅把它看作循环的**一般形式**，即能够用来考察每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第一次投资的场合除外）的社会形式，因而不仅看作一切单个产业资本共

有的运动形式，而且同时看作各单个资本的总和即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的运动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每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运动，都只表现为一个部分运动，和其他部分运动交织在一起，并且受它们制约。^{[4]112}（Big Big Note）

商品资本的循环很特别，它允许我们着眼于整体经济中的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总的流动。……这种思维模式的先驱是魁奈。

在其他循环中，我们可以只关注个别的产业资本，而不必关心加总的情形。加总的情形只在商品资本的循环中出现。

第六章 循环的三个公式和资本流动的连续性（第二卷第 4—6 章）

在一个不断回环的循环中，每一点都同时是出发点和复归点。……不仅每一个特殊的循环都把其他的循环作为前提（包含在内），而且一种形式的循环的反复，已经包含着其他形式的循环的进行。因此，全部区别表现为单纯形式上的区别，或者说，表现为单纯主观上的、只对考察者才存在的区别。

资本在它的任何一种形式和任何一个阶段上的再生产都是连续进行的，就像这些形式的形态变化和依次经过这三个阶段是连续进行的一样。可见，在这里，总循环是资本的三个形式的现实的统一。^{[4]117}

这里强调的是资本在这三种循环运动中的连续性、继起性、并存性和流动性。问题的反面则是阻碍和可能的中断。“资本的循环过程是不断的中断，是离开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是抛弃一种形式，存在于另一种形式；其中每一个阶段不仅以另一个阶段为条件，而且同时排斥另一个阶段。”^{[4]118}（Big Big Note）

“那些把价值的独立化看作是单纯抽象的人忘记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实现”。^{[4]122}“独立化”暗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价值可能是一个抽象概念，但是它却有真实的影响（或者用第一卷的话来说，价值是“幽灵般的对象性”）。（Big Note）

如果社会资本的价值发生**价值革命**，他个人的资本就可能受到这一革命的损害而归于灭亡，因为它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价值运动的条件。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独立化的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的运动，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风险**。因此，这些周期性的价值革命证实了它们似乎应该否定的东西，即证实了价值作为资本所经历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持和加强的独立化。（Big Big Note）

这完全可以算是对我们现在所谓的“去工业化”导致的资本贬值危险的理论再现。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一股巨大的工厂倒闭浪潮冲击了底特律、匹兹堡、巴尔的摩、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埃森、里尔和都灵等老工业城市。这种现象不只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孟买的

传统纺织业区和中国北部的老工业基地同样遭受了猛烈的冲击和损失。所有集中于工业生产的社区几乎都在一夜之间被摧毁了。比如谢菲尔德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三年时间内，失去了大概六万个钢铁生产的工作岗位，到处是荒凉的景象。当人们寻找原因时，却被告知，这一切都是由一股被称为“全球化”的神秘力量引起的。当工会和社会运动抗议并寻求遏止工作和谋生手段流失的途径时，却被告知这种神秘的力量是无法避免和不可阻挡的。（Big Big Note）

更正式的表述就是：个别的资本家为了追求相对剩余价值而组织价值的生产，但这样做产生的新的价值关系反过来会摧毁他们自己。资本不仅生产自身统治的手段，还生产毁灭自己的手段。……但是他们不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愤怒，反而对外国生产者、移民者、投机者和其他一些仅仅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中秘密的、隐藏的当事人感到愤怒。（Big Big Note）

只有各种干扰在循环反复中被排除，过程才能够在事实上正常进行；**干扰越大，产业资本家就必须持有越是大量的货币资本**，才有可能等到干扰被排除；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每一个单个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会随之增加**，所以除了其他情况外，又加上这个情况，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4]124}（Big Big Note）

（产业资本的循环）是和各种极其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中国人，印度的佃农），还是公社的产品（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如在俄罗斯历史早期出现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国家生产），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等等，它们都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货币和商品相对立。^{[4]126}

资本家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小于他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这是因为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大于他以商品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既然他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只是作为产业资本家执行职能，他供给的商品价值，总是大于他需求的商品价值……资本家的供给和需求的差额越大，就是说，他所供给的商品价值越是超出他所需的商品价值，资本家的资本增殖率就越大。他的目的，不在于使二者相抵，而是尽可能使它们不相抵，使他的供给超出他的需求。就单个资本家来说是如此，就资本家阶级来说也是如此。^{[4]133}

过剩资本的处置或吸收问题（卢森堡提法比较重要，马尔萨斯、卢森堡、马克思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也可参考上一卷的笔记）：购买剩余价值的需求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这只是寻找更多货币的问题，那么在某处的某人（例如我们时代的联邦储备系统；对马克思来说是黄金生产者，他随后考虑了他们潜在的作用）能简单地满足这个要求。**但是我们必须从价值而不是货币的范畴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剩余价值在交换中实现，那么我们必须解释最终与剩余价值交换的等量价值是从何而来的。从理论上说，我们得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不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外寻求答案（例如马克思在本章前面提到的需求和供给的非资本主义来源），也不能假设存在一个专门进行挥霍性消费的阶级。

对于马克思的看法，这里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在这一章的开头，他说“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每一个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4]116} 或者，像马克思一开始说的那样，前提（资本家的有效需求）现在表现为结果（剩余价值的占有）。在简单再生产中这可能会起作用，但是，由这些章节的主要观点可知，这个过程不太可能不受任何干扰和中断地顺利进行下去。

但是，如果资本家如此行事，那么他就成了“非资本家”，“他作为非资本家花掉的，不是花在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上，而是花在他的私人需要或享受上”。马克思还说：“这个假定等于假定资本主义生产不存在，从而假定产业资本家本身不存在。因为只要假定发挥作用的动机是享受，而不是发财致富本身，资本主义就从根本上被废除了。”享受和发财致富的区别似乎对马克思的推理很重要。说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个人自身的享受欲望的基础上的，就违背了马克思在第一卷第 24 章中论证的观点。在那里，他认为资本主义基于“为了生产而生产和为了积累而积累”，是独立于资本家的个人欲望之外的。尽管总存在消费和享受的欲望与追加投资的必要性相互冲突的“浮士德时刻”，但是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资本家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后者。所以，把资本家假定成贪恋消费品的个体，并将其作为资本积累的驱动力，是不充分的；假定资本家的驱动力是通过攫取货币占有更大的社会权力，也是不充分的（尽管我们以后会看到，与这个动机有一定的关系）。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资本家不仅必须形成一个准备资本，以应付价格的变动并等待买卖上最有利的行情；他必须积累资本，以扩大生产，并把技术进步合并到他的生产机体中去”。^{[4]137}

当部分剩余价值被再投资于扩大再生产时，上文提出的解决有效需求问题的办法就更不可行了。资本家不仅要为购买和实现最初循环的剩余价值提供必要的资金，而且得寻找更多的资源来实现再投资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因此，问题将会一直存在。

我宁愿大略说出我对马克思论点的理解。资本家的消费分为两种类型：个人消费（必需品和奢侈品）和生产性消费。后者要求将初始资本收回，用于另一轮的剩余价值生产，并追加投资于扩大再生产，这意味着对更多的生产资料和额外雇佣的劳动力所需的消费资料的需求（假设没有劳动节约型的技术改进）。竞争的强制规律推动了扩大再生产（因此，重点是发财致富，而不是享乐）。所以，来源于**明天的**扩大生产的需求（加上资产阶级消费），为今天生产的过剩商品提供了市场。

实际上，需要用出售明天的产品得到的货币支付今天生产的剩余价值。资本家的供给和需求间暂存的缺口只能在信用货币（马克思在第二卷中刻意回避这个问题）的帮助下填补。实际上，资本家没必要向别人借钱。他们只需要打个欠条，先买后付——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了。因此，**资本积累和债务积累紧密相连，谁也离不开谁**。遏制债务进一步发展（像共和党在 2011 年做的那样），实际上是一场终结资本主义的战斗。这就是为什么紧缩政策，如果无限期执行的话，不仅会阻碍经济增长，而且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Big Big Note）

马克思也指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必须按“生产一般”的方式进行，并且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没有任何特殊的物理属性上的差异。

资本是生产——理解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是物质生产）**，它支配着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所有环节，更重要的是，支配着生产的物质过程本身。**资本的再生产总是被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在第一卷第 23 章中解释得很清楚）。（Big Note）

在所谓的“部分无产阶级化”的情况下，全球劳动力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拥有一些土地和其他家族或血缘资源，当他们遭遇失业、生病或残疾时就会回到这种状况。例如，在当代中国就是这种情况，很多社会再生产的成本都是由农村地区承担的。更为冷酷无情的是，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就是以这种方式把社会再生产的成本转嫁到墨西哥身上的：雇用非法移民来从事有致癌作用的杀虫剂的喷洒工作，直到他们病入膏肓，从而不得不返回墨西哥农村，在那里接受照顾或者死去。

资本的特性存在于有利于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的阶级关系之中，其一般性存在于由货币、生产和商品资本循环构成的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之中。

因此，认为在不对其他循环的运行进行根本变革的条件下，就可以在生产领域实现深刻变革的想法只能是妄想。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不仅需要通过激烈的斗争去消灭生产中的阶级关系，还需要逆转或者重建其他循环，以表明货币化、商品化和劳务的交换是怎样实行变革，为生产中的联合劳动提供支持的。（Big Big Note）

这个结论在这些漫长而往往自负的历史中找到了支持：尝试在非资本主义方式的基础上重新改造资本主义生产，特别是在联合劳动的口号下。工人控制、自我管理、工人自治和合作工厂的尝试（20 世纪 70 年代在欧洲和 2001 年经济危机后在阿根廷兴起的那种）一直受到怀有敌意的商人和金融资本的控制力的威胁，在某些情况下一度被摧毁了。工人控制和工人自治的梦想，经常在货币和商品资本力量，以及规训它们的交换价值规律的岩石上撞得粉碎。价值增殖从而榨取剩余价值的驱动力难以阻挡。显著的例子是 1956 年西班牙法西斯专政时期巴斯克县的工人合作社蒙德拉贡，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部分是因为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信用机构和市场机制，从而在三个循环中贯彻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它继续存在并且繁荣发展着，其两百家企业中的大部分仍把参与者的回报差距控制在 3:1（相比之下，美国公司是 400:1，甚至更高）。有人批评蒙德拉贡越来越依赖外包合同，因此是通过剥削其他地区而生存）。（Note）

联合劳动形式面对的困难主要来自一直存在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价值规律支配并常常摧毁个别资本。一旦进入由价值规律支配的世界，企业就得服从这些规律的规训力量。远离这种规训力量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为了生存，蒙德拉贡和那些在阿根廷复兴的工厂不得不寻找与价值规律相妥协的方式。这使我们得出了一个至少表面上令人气馁的一般性结论，马克思已经在他对资本贬值和去工业化的分析中使我们为这个结论做好了准备：不废除资本的运动规律和支撑这些规律的价值规律的无形却客观的力量，就不能废除生产中的劳资阶级关系。但是马克思经常被历史转变的协同演化理论所吸引。如果我们在这里加入协同演化理论的轮廓，那么一种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策略就浮现出来了。尽管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关系处在资本定义的核心，它被深深的嵌入到了循环过程的其他方面之中，以至于不废除或者取代它旁边的支撑物就很难消除它。尽管我们仍然相

信联合劳动、工人自治和自我管理的原则，也为尝试实行这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漫长的斗争史感到光荣，我们还是得面对社会变革的所有其他方面，它们是把全社会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所必需的。

对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分，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核算上的解决方案时，我们面对的难题就是：如果既要保留马克思的直觉洞察力，又要承认实施这种区分的困难性（不可行性？），我们该怎样继续研究下去？

如果连续性是唯一的顾虑，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生产、流通和实现过程的所有劳动（也可以延伸到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家庭劳动）都是维持并再生产资本的总体劳动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所有参与产业资本循环的劳动者都算生产性工人。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将会粉饰和掩盖一些重要的东西。

反过来，我们可以推知，如果施加在这些扣除额（或者不能促进资本循环运动加速）上的权力过大的话，危机可能会发生。如果所有权力都在货币资本家（金融家）和商业资本家（商人）手里，那么它会对这部分资本最终依赖的价值生产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例如，2007年后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可能是因为非生产性的资本和商品循环（例如高盛和沃尔玛）攫取了过多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绝大部分是虚拟的）利润，吸干了生产活动的能量；相反，也可能是因为生产循环的状况严重恶化，刺激资本涌入了非生产性资本和商品循环中，通过掠夺而不是生产来进行资本积累。（Big Note）

显然，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越吻合，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生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价值增殖就越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不过，资本的生产时间虽然可以和它的劳动时间不一致，但前者总是包含后者，而且超过的部分本身就是生产过程的条件。^{[4]141}

流通时间的延长和缩短，对于生产时间的缩短或延长，或者说，对于一定量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规模的缩小或扩大，起了一种消极限制作用。资本在流通中的形态变化越成为仅仅观念上的现象，也就是说，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例如，假定有一个资本家按订货生产，因此他在提供产品时就得到支付，又假定支付给他是他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那么，流通时间就接近于零了。^{[4]142}

因此，生产资料供给的地理和空间条件给资本主义生产施加了限制，因为把生产资料运输到劳动进行的生产地点需要耗费时间。……为了获得生产所必需的使用价值，资本家要面对各种潜在的供给约束和成本。他们还得面对由其他资本，以及具有地缘政治雄心的国家权力所施加的约束。

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生产过程的监督和观念上的总括的簿记就越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重要。^{[4]152}

表面上是流通的过程也可以创造一些价值。这种互相掺杂的情况使核算噩梦变得更糟：把商品放在容器中会增加它的价值，而它待在货栈里的时间则要从价值中扣除（例如，货栈的租金）。

我自己的结论是，放弃会计核算，转而集中于分析加速运动、库存费用管理等做法的实质影响。马克思已经说明，这些做法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来说都是极端重要的。当我们把交通运输和通讯的问题，及其暗含的空间生产问题纳入进来时，这些问题就更加重要了。

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即实际的移动，就是商品的运输。运输业一方面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而形成生产资本的一个特殊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如下的特征：它表现为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4]170}

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生产过程。因此，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恰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另一方面，就固定资本被束缚在自己一定的使用价值的存在中这一点来看，它是不符合资本的概念的，因为作为价值来说，资本对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都是无所谓，它可以把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来加以采用或者抛弃。从这方面来看，从资本对外部的关系来看，流动资本同固定资本相比表现为资本的适当形式。^{[3]210}（Big Note）

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连续性、流动性和加速**是资本流动的本质特性，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一个范畴：固定资本的目的是促进流动，但是它本身是固定而不是流动的。

我认为矛盾是这样的：资本在一个时点创造了一整套适应其需要的景观，而在未来的某一时点，为了适应资本积累永恒的扩张的力量，会破坏它并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景观。资本或者在别处，或者在旧的废墟上建立新的地理景观；留下的是去工业化的或废弃的景观，它们是孤立和破败的。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这一过程周期性地使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地理景观发生贬值和变革——以惊天动地的方式。（Big Big Note）

原则上（尽管实际中并不总是这样），固定资本一直是永远对立的资本—劳动关系之外的一个常见的危机来源。危机在固定性不能适应扩张性的运动时发生。后者不得不打破已经固化的那部分资本所施加的限制。随着高度流动的货币资本流向别处，结果是大量固定资本的贬值。（1970 年以来的去工业化留下了很多荒废的工厂、仓库和破败的基础设施——甚至衰退的城市，比如底特律）。（Big Big Note）

只被生产地消费，不能进入个人消费……在它完全损耗以前一直保持独立的形式。运输工具则例外。运输工具在它执行生产职能、从而停留在生产领域时产生的那种有用效果即场所变更，同时可以进入个人消费，例如旅客的个人消费。这时，旅客使用运输工具就像使用其他消费资料一样，也要支付报酬。^{[4]178}

我对这种例外情况很感兴趣，它意味着“场所变更”（从而，空间关系的生产）的有用性不仅适用于生产过程（原材料的移动），也适用于消费（人的移动）换句话说，“场所变更”的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商品，不论谁使用它，也不论是为了什么目的（进一步的生产或者最终消费）。

同一物品可以时而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时而属于直接的消费基金。例如，一所房子，用作劳动场所，是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用作住宅，就根本不是资本的形式，而只是一所住宅。在许多场合，同一些劳动资料，可以时而充当生产资料，时而充当消费资料。^{[4]227}

一个没有飞机起飞的机场是没有价值的。但是，没有机场的飞机也是没有价值的。注意，在这个例子中很明显的是，可移动的固定资本形式（包括它们所携带的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资本）在地理上的移动模式，受到另一些固定资本的增殖要求的限制——这些通常数额巨大的固定资本被固定在了某个地方。不可移动的固定资本价值的收回，取决于运动中的资本对特定地点的不可移动资本的使用。这产生了诸如城市间竞争的现象——将高度流动性的资本吸引并保留在城市中（往往以对私人企业大量的公共补贴告终）。

可以利用的空间。有些建筑物可以加高几层；有些建筑物必须横向扩张，这就要有更多的地皮。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方面有许多资财被浪费掉；另一方面，在企业逐渐扩大时，又有许多这种**不恰当的横向扩张（部分地说对劳动力有害）**，因为一切都不是按照社会的**计划**进行的，而是取决于单个资本家从事经营活动的千差万别的环境、资财等等。由此就产生了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货币准备金（即再转化为货币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再投入企业，在农业中实行起来最容易。在这里，有一定空间的生产场所，能够最大限度地逐渐地吸收资本。在进行自然再生产的地方也是这样，例如畜牧业。^{[4]193}（Big Note）

再从另一方面看，**固定资本的发展也表明一般财富发展的程度，或者说资本发展的程度**。直接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以及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其对象都是供消费用的产品本身，生产固定资本的那部分生产既不生产直接的消费品，也不生产直接的交换价值，至少**不生产可以直接实现的交换价值**。因此，越来越大的一部分生产时间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这种情况取决于已经达到的生产率水平，取决于用一部分生产时间就足以满足直接生产的需要。这就要求社会能够等待；能够把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从直接的享受中，也从以直接享受为目的的生产中抽出来，以便（在物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把这一部分财富用到非直接生产的劳动上去。这就要求已经达到的生产率和相对的富裕程度都有高度水平，而且这种高度水平是同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成正比的。正如相对剩余劳动的大小取决于必要劳动的生产率一样，用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劳动时间——活劳动时间和物化劳动时间——的大小也取决于直接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时间的生产率。**过剩人口（从这个观点来看），以及过剩生产，是达到这种情况的条件。**

这就是说，用在直接生产上的时间所取得的成果相对说来必定很大，超出了这些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的再生产的直接需要。固定资本带来的直接成果越少，越少参与直接生产过程，这种相对的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应该越多；因而，修建铁路、运河、自来水、电报等场合，同制造直接用于直接生产过程的机器的场合相比，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应该多些。由此（我们以后将回过头来谈这一点）就产生出——通过现代工业中经常生产过剩和经常生产不足的形式——这样一种状态：流动资本向固定资本的转化有时过多有时过少，这种不平衡状态经常波动和痉挛。^{[3]220-221}

固定资本投资——包括初始购买和补偿——的“团块结构”（lumpiness）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它在货币方面的影响是决定了在特定时刻有多少货币资本应该从流通中撤出或回归流通：

此外，在再生产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使已经损坏的部分在较短时间内换新的地方，在这种补偿能够实行之前，必须根据生产部门的特殊性质，事先积累一笔或大或小的货币。为了这个目的，不是拥有随便一个货币额就行，而是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额。^{[4]202}

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这种变革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又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也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这种由一些互相联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住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4]206-207}

加速折旧引起了现有固定资本的贬值，它的价值还没有通过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而全部回流。如果这种情况大规模地发生，显然会引发危机。正如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所说的，它对工人的影响就是以换班和夜间工作的形式来劳动，以在无形损耗还没有冲击自己时就尽可能快地收回固定资本的价值。但是第二卷一点也没有强调“无形损耗”或者其他社会力量（比如那些使固定资本陷入困境的位置变化）导致的固定资本大规模贬值的普遍意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提到了这一问题。所以我们要靠自己来探索这些意义。

马克思说，普遍的危机（显然，资本遭受了价值损失）也许是更新、补偿现存的固定资本的好时机。这个观点需要进一步的论述。危机中，很多现存的固定资本处于闲置、贬值的状态（资本利用率非常低），所以有货币贮藏的资本家或许就会抛弃现存设备来进行更新（尤其是因为新固定资本的花费比较低）。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一个近期的实例是由联邦政府在 2008 年启动的所谓“旧车换现金”计划。消费者在旧车还没废弃时被给予现金，让他们买新车、弃旧车。这样做的目标是活跃汽车市场，促进汽车产业的繁荣。对加速折旧的税收减免是另外一个影响固定资本的更新和再投资的公共政策因素。20 世纪 80 年代罗纳德·里根总统在位时实行过。这是对大量现存的和新的固定资本进行加速折旧的公共补贴。事实上，这

实际上补贴了资本向美国南部和西部的运动以及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去工业化。当然，这样做是否具有更普遍的“有效性”，取决于新的技术可能性和区位可能性的存在。在美国，20 世纪 30 年代是技术和制度更新在危机条件下发生的显著时期，结果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固定资本投资模式（以汽车、电气化以及加州的开发为基础），它在二战后为美国带来了繁荣。它“也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在当前萧条的情况下，是否存在相似的固定资本投资环境的重组过程呢？如果存在，那在哪里？中国吗？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马克思危机形成和解决理论的这些方面的普遍意义，很少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尽管有很多相关历史证据：商业周期与新技术浪潮，商业周期与大规模的“无形损耗”浪潮，都以马克思概述的方式出现。生产能力利用率（主要是固定资本）被看做是经济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人们只要看看中国应对 2008—2009 年危机时的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就可以明白这些关系是如何重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点是多么必要，“必须不断地有超额生产，也就是说，生产规模必须大于单纯补偿和再生产现有财富所必要的规模——完全撇开人口的增长不说——以便掌握一批生产资料，来弥补偶然事件和自然力所造成的异乎寻常的破坏”。^{[4]198} 尽管马克思这里主要考虑的是地震、海啸的影响，但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个见解扩展到分析中国 2009 年经历的出口市场萎缩的情况。中国有大量的剩余资本（就像英国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末那样），所以不需要紧缩（如罗斯托和美国现今的共和党所鼓吹的那样）就能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投资浪潮提供资金。然而，就像马克思如此有预见性地指出的那样，这里也有“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的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领域，各式各样固定资本（包括固定在土地上的大量基础设施）的“无形损耗”能够也确实周期性地通过无数种方式演变成严重的破坏和危机（尤其是资产价值）。马克思指出了这种一般的可能性，但没有深入阐述，这在我看来是个遗憾。马克思提供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想法，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要做的工作。

“马克思经常为了方便把社会必要劳动等同于凝结劳动，但是后者并不包含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价值的所有方面。价值，我们回想一下，‘只存在于某种使用价值中’，所以，‘使用价值丧失，价值也就丧失’。这是因为‘商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因此，‘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

我认为“价值不是一个用来描述变化着的世界的固定标准，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其核心体现了矛盾与不确定性。因此，在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和固定资本流通的‘独特性’之间不存在什么矛盾。矛盾内化于价值本身的概念之中”。（Big Big Note）

第七章 商人资本（第三卷第 16—20 章）

从马克思的许多论证中重现总体思路，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有些地方可以做到，但在其他地方，我觉得最好还是从冗长的文本中摘录出似乎是核心观点和想法的内容，来看看是否能提炼出更一般的分析框架——例如，除了投机性地阅读关于投机的材料外别无选择。

“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分为两个形式或亚种，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6]297}

马克思也清晰地表达了不会偏离他集中于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任务（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里描述的）的决心，甚至当他处理分配的特殊性的时候也是如此。……问题是，马克思并不总是肯定什么和一般规律有关，什么和一般规律无关。我们阅读的时候，要对此保持一种批判的眼光。

既然像读者已经感到遗憾地认识到的那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内部联系的分析，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既然把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么，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商人、交易所投机者、银行家的观念，必然是完全颠倒的。工厂主的观念由于他们的资本所经历的流通行为，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而被歪曲了。在这些人的头脑中，竞争也必然起一种完全颠倒的作用。^{[6]348}

在某种意义上，银行家和金融家是最不应该相信的人，不是因为他们都是诈骗犯、说谎者（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很明显是），而是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沦为自己的故弄玄虚和拜物教观念的牺牲品。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在国会面前宣称，他的银行——高盛——只不过是做了上帝该做的工作而已。如果有机会对他加以评论的话，不难想象马克思会怎样讽刺他。

这几章正是要尝试纯粹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内”^{[6]362} 解决这个问题。

“在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时，即在产品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时，商业的规模扩大了，达到“自己的最大限度”。商人资本“只是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但是“商人为许多人而进行买卖。买和卖都集中在他手中；因此，买和卖就不再与购买者（作为商人）的直接需要联系在一起了”

不论以商人为中介进行商品交换的各生产部门的社会组织如何，商人的财产总是作为货币财产而存在，他的货币也总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这个资本的形式总是 $G-W-G'$ ；货币，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是出发点，而增加交换价值是独立的目的。^{[6]363}

要理解商人资本为什么在资本支配生产本身以前很久就表现为资本的历史形式，这丝毫也不困难。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1. 因为这种存在和发展是货币财产集中的先决条件；2.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是大规模的销售……另一方面，商人资本的一切发展都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6]364}

“资本作为商人资本而实现的独立的、优先的发展，意味着生产还没有从属于资本”，所以“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16]换句话说，处于霸权地位的商人阶级将试图压制产业资本的发展，因为他们剥削弱小的、易受伤害的生产者榨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将受到这种发展的抑制。

“纯粹商业民族的优势的衰落和这些民族的以这种转运贸易为基础的商业财富的衰落”，反映了“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进程中从属于产业资本”。（笔者注：资本主义之前社会）

马克思评价了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荷兰人经营的转运贸易的实质，以此阐述了这种规律的力量。这些地方都严重依赖“纯粹的商人资本”，而且通过作为汇兑的中介和积累货币资本，以及通过贱买贵卖，有效地积累起了他们的财富。尽管所交换的商品是人类劳动的表现，因而具有价值，但“它们不是相等的价值量”。但是正如他之前所说的，商人越是把商品交换的世界转变成一个交换成为“正常的社会行为”的世界，那么价值度量标准就越来越处于支配地位。（Big Note）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阶段中，商业支配着产业；在现代社会里，情况正好相反。当然，商业对于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它增进了货币流通。它已经不再是仅仅掌握生产的余额，而且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使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依附于它。^[20]

一开始，商人资本从“侵占和欺诈”中获得它的大部分财富。当它占“主要统治地位”时，它“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21]我们应该注意，这种掠夺制度完全违背了《资本论》中通常假定的自由公平的市场交换规则，并且让我们回到了第一卷中描述的原始积累的世界。但是它越来越规范，所以越来越受到规则的限制。而且至少在理论上，这些规则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设定的，商业的发展满足了这些需要。

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和世界化，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因此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到处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

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6]370}(Note)

因此，并不一定会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用相当长的篇幅详细地阐述了货币如何“瓦解”了古代的共同体并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然而，

毫无疑问……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倍增，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宝藏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23]

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动力的不再是商业和世界市场的扩张，驱动力转换为资本主义生产，使得工业化国家（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取代商业强权（荷兰）夺得霸主地位。……正是资本主义生产驱使着商人成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先锋，摧毁了印度的手工业，为英国生产的商品创造了市场。

“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25] 马克思后来增加了第三种途径，“商人把小老板变成自己的中介人，或者也直接向独立生产者购买；他在名义上使这种生产者独立，并且使他的生产方式保持不变”。

这里有两点富有洞见。第一，商人资本压倒性的力量和它的组织形式，经常既促进又抑制了成熟的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相当多的历史证据支持这个观点。但是第二个更现代的观点是，当商人保持着控制权时，他们经常保存和保留按照传统方式组织的古老的、落后的生产形式。这种做法

到处都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消灭。它不变革生产方式，只是使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把他们变成单纯的雇佣工人和无产者，使他们所处的条件比那些直接受资本统治的人所处的条件还要坏，并且在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同样的情况在伦敦一部分手工家具制造业中也可以看到，不过略有变化。这种制造业，特别在陶尔哈姆莱茨区，经营的规模非常大。^{[6]373}

这种生产体制在资本主义历史中长期存在，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急剧扩散了（尽管拥有了现代的外观）。贝纳通、沃尔玛、宜家、耐克等商业资本家组织，几乎必定把来自于他们转包的生产者的“剩余价值的最大部分装进了自己的腰包”。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说“生产占主导地位”呢？(Note)

我发现陶尔哈姆莱茨区的组织类型在增加而不是缩小（笔者注：陶尔哈姆莱茨区的生产，按马克思说法来说，是向合并组织成大工厂方向发展）。不过，马克思正确的地方在于

他评论了这种劳动组织形式下的残酷剥削。左拉在他的小说《小酒店》中，对一对夫妻的悲惨生活有着入木三分的描述，他们在公寓里制作金链，商人按月提供金子并收回产品。在当代世界，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过度剥削是许多由商业资本动员和组织起来的分包网络的特点（因此丑闻不断出现在主流媒体上，包括丽诗加邦的服装、耐克的鞋、童工制作的毯子和足球——踢这些球的球员可以赚到数百万——以及可可豆的收割）。(Note)

不同劳动体制间的竞争仍然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反过来意味着生产者和商人相对作用的差别。全球经济中存在特定的部门和特定的场所，在那里生产者似乎的确支配着商人；然而在其他地方和部门，情况则恰好相反。例如，在汽车工业，生产者倾向于支配着分销商；但是现在纺织品行业几乎总是完全相反。然而，在通用汽车的案例中，一种叫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混合形式出现了，这个公司成为通用汽车组织汽车信贷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分支（最终在 2008—2009 年经济危机中取得了银行资格）。

既然它有助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它就能间接地有助于产业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既然它有助于市场的扩大，并对资本之间的分工起中介作用，因而使资本能够按更大的规模来经营，它的职能也就提高产业资本的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资本的积累。既然它缩短流通时间，它也就提高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就是提高利润率。既然它把资本的一个较小部分作为货币资本束缚在流通领域中，它就增大了直接用于生产的那部分资本。^{[6]312}(Note: 需批判接受。)

商品经营资本——撇开可以和它结合在一起的一切异质的职能，如保管、发送、运输、分类、散装等，只说它的真正的为卖而买的职能——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它只是对它们的实现起中介作用，因而同时也对商品的实际交换，对商品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让，对社会的物质变换起中介作用。^{[6]314}

正如我们一直以来看到的，资本必须保持运动的**连续性、平稳性和流动性**。商品经营资本在这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在这儿借助了第三卷第二篇中详细考察的利润率平均化原理。既然我们还没有考虑这个原理，我在这里简要说明一下它的含义。马克思说，资本倾向于流向利润率最高的地方（尤其是在竞争条件下）。从直觉上看，这是讲得通的。结果所有部门的利润率都趋于均等——从纺织业到农业再到石油开采。问题是这种趋势不会引导资本流向生产剩余价值最多的地区。资本密集型部门（资本的价值构成或者有机构成高的部门）从劳动密集型（资本的价值构成或者有机构成低的部门）部门获取剩余价值。这种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相关的投资错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复杂后果（包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因为在既定的市场力量下，资本家对利润率而不是剩余价值生产做出反应）。后面的章节偶尔提到了这个趋势的效果。然而在这儿，马克思仅仅断言商人资本的利润率与产业资本的利润率趋于相等。他后来在别的地方说，如果一般利润率趋向于下降，那么商人资本的收益率必定也会下降。货币资本的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利润率是否趋于相等呢？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进行讨论。(Note)

“商人的出销售价格之所以高于购买价格，并不是因为出销售价格高于总价值，而是因为购买价格低于总价值”。^{[6]319} 换句话说，“在平均利润率中，总利润中归商业资本所有的部分已经计算在内了”。^{[6]318}

“商人资本虽然不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参加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平均化。因此，一般利润率已经意味着从剩余价值中扣除了属于商人资本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产业资本的利润作了一种扣除。”^[48] 结果，“同产业资本相比，商人资本越大，产业利润率就越小。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6]319}(Note)

一旦承认产业资本利润和商人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因情况而异的，那么不均衡的力量关系便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从而扭曲和干扰马克思假定的通过利润率平均化而实现的均衡。这也意味着对产业资本和商人资本之和的投资得到的利润率，低于只对产业资本投资时得到的利润率（后一种计算方法在第三卷前面的章节中用过）。

因为商人资本决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一部分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的独立化的形式……问题首先要在这样的形式上提出，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各种现象还没有独立地表现出来，而是还和产业资本直接联系在一起，作为产业资本的一个分支表现出来。^{[6]333}

对单个商人来说，他的利润量取决于他能够用在这个过程中的资本量，而他的店员的无酬劳动越大，他能够用在买卖上的资本量就越多……这些店员的无酬劳动，虽然不创造剩余价值，但能使他占有剩余价值；对这个资本来说，就结果而言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这种劳动对商业资本来说是利润的源泉。否则，商业就不可能大规模地经营，就不可能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了。正如工人的无酬劳动为生产资本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一样，商业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也为商业资本在那个剩余价值中创造出一个份额。^{[6]327}

但是有一个遗留的难点：如何解释商人资本为购买劳动力而花费的可变资本呢？即使它不生产剩余价值，也应该把它包括在总资本所使用的总可变资本中吗？它是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呢？马克思承认对于这个主题还有许多东西需要研究，并且以他一贯的一丝不苟的态度试着加以解释，在这儿我不打算重复了。他尝试性的结论是

商人用〔他的可变资本〕购买的，按照假定，只是商业劳动，即只是对资本的流通职能即对 $G—W$ 和 $W—G$ 起中介作用所必要的劳动。但商业劳动是使一个资本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对从商品到货币和从货币到商品的转化起中介作用所必要的劳动。这种劳动实现价值，但不创造价值。并且，只是由于一个资本执行了这些职能……这个资本才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才参加一般利润率的规定，也就是说，才从总利润中取得它的份额。^{[6]332}

(哈维注：结果，商业工人的工资)并不与他帮助资本家实现的利润量保持任何必要的比例。资本家为他支出的费用，和他带给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同的量。他给资本家带来利益，不是因为他直接创造了剩余价值，而是因为他完成劳动——部分是无酬劳动——的时候，帮

助资本家减少了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6]335} (Big Note: 机器、商业资本在马克思看来都是不创造剩余价值的，但是却对实现剩余价值、减少剩余价值费用起中介作用。这种说法是否具有矛盾?)

对于商业工人阶级后来的遭遇和它现在的处境，显然需要更细致地研究。从马克思的时代以来，现实条件明显改变了。

当然，商人资本对生产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但这只是就它缩短生产资本的流通时间来说的。它不会直接影响生产时间，而生产时间也是对产业资本周转时间的一个限制。这对商人资本的周转来说是第一个界限，第二……商人资本的周转**最终要受全部个人消费的速度和规模的限制**。^{[6]338}

最后提示的这一点在后面基本被忽略了，大概是因为消费对马克思来说属于政治经济学范围外的“个别性”，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论证的那样（我想不到其他原因了）。但是，历史上，商人资本对消费的作用恰恰是：**刺激消费者的欲望，用产业资本家提供的商品挑逗公众，尽可能地确保潜在的消费者拥有足够的可支配货币（通常是信用）来迅速吸收产品，并使消费动力的增长和产业资本寻求的无止境的积累同步进行。但是马克思将消费的周转时间所造成的限制描述为“决定性的”，我很惊讶他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个观点。** (Big Big Note)

利润率平均化，然而利润率平均化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不同周转时间很敏感。商业资本的周转能够同时或者连续地“对极不相同的生产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6]340} 另一方面，产业资本的周转，是由生产和再生产的周期性设置的，这里流通时间也“形成一个界限……它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或多或少起着限制的作用，因为它对生产过程的规模发生着影响……从而参加决定一般利润率的形成”。^{[6]344} 通过减少流通时间来减少产业资本的周转时间可以提高利润率。不管周转时间是多久，商业资本（理论上）能获得一般利润率。那么，尽管商业资本不能通过加速它的周转时间来提高自己的利润率，却可以影响一般利润率，因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的商业资本减少了。“商人资本的绝对量和它的周转速度成反比。”而且，“各种会缩短商人资本平均周转的情况，例如，运输工具的发展，都会相应地减少商人资本的绝对量，从而会提高一般利润率”。^{[6]345}

作为这一章的结束，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了拜物教的观念和信条是怎样轻易地从商业和生产活动的复杂交织中建构起来的：“一切关于再生产总过程的表面的和颠倒的见解，都来自对商人资本的考察，来自商人资本特有的运动在流通当事人头脑中引起的观念。”^{[6]348} 他进一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商人、交易所投机者、银行家的观念，必然是完全颠倒的”。他甚至断言，“在这些人的头脑中，竞争也必然起一种完全颠倒的作用”。

“因此，从商人资本的观点来看，周转本身好像决定价格。另一方面，虽然产业资本的周转速度，由于它会影响一定量资本所剥削的劳动的多少，所以会对利润量、从而会对一般

利润率起决定和限制的作用，但对商业资本来说，利润率是外部既定的，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的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已经完全消失。”^{[6]349} 当我们进入分配领域时，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在处理生息资本流通的时候会再次遇到这个现象。与剩余价值生产相关的一切联系都在社会的表面上抹去了，这是各色拜物教信条的来源。

不过，个别的商业资本家的确能通过加快周转速度，使其超过社会平均水平，而在竞争中获得额外利润，这强化了表象世界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赚到超额利润，正像在必平均条件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产业资本家会赚到超额利润一样。”（这不就是在第一卷提出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吗？）而且，“如果那些使他能加速资本周转的条件本身是可以买卖的，例如店铺的位置，那么，他就要为此付出额外的租金，也就是说，把他的一部分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这将我们带到了商人资本和地租的关系领域，以及这种关系在城市环境下建构的方式（看看麦迪逊大道或者牛津街，你就明白马克思的意思了）

从总资本中有一定的部分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分离出来并独立起来，这种货币资本的资本职能，是专门替整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完成这些活动……所以，这种货币资本的运动，仍然不过是处在自己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的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

这种资本形式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术语是至关重要的，对后面的分析有许多提示。

第八章 利息、信用和金融（第三卷第 21—26 章）

但是，首先我必须提醒你们，接下来所要讨论的这部分文本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付出巨大努力后重新整理撰写的。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恩格斯在做这项工作时已经尽力遵照马克思的原意，但后来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研究却表明，恩格斯的取舍可能并不完全正确。比如说，每一个章节都由恩格斯从连续的手稿中分离出来并拟定标题——正因为如此，并不奇怪，这些章节之间的联系才会如此紧密。你也会注意到恩格斯在原文中插入了一些自己的长篇论述，为的是完善、改正和更新马克思的工作。在这里，我不会详细阐述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会把原文看做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准确概述，尽管不是很完整。

货币资本（定义为用于生产剩余价值的货币）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它既有交换价值（价格）也有使用价值。它的使用价值即它促进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它的交换价值（价格）就是利息。这和马克思在第二卷中的阐述差异很大。在第二卷中，马克思说货币作为资本只能执行货币的职能，也就是被用于买和卖。这种概念的转换非常重要。我并不认为这是马克思改变了他的想法或是前后不一致。这更不是关系性概念的含义随着研究内容的展开发生变化的例证。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认为，当遇到这类问题时，从整体上考察马克思论述的变化是非常明智的。这些章节之间的重要线索是马克思再一次明确提出了拜物教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第一卷的第 1 章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那里，他提出资本的真正基础（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埋藏在了真实存在却有误导作用的表面现象之下。的确，我们会去市场用货币购买商品（包括劳动力）。但问题在于，这些市场关系掩盖了凝结在商品生产和将商品带入到市场的整个过程中的劳动的**社会性和官能性**。马克思所做的工作就是深入到表面现象背后。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这一位置回头讨论表面现象的拜物教性质。这里他宣称：“**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听起来，他为这一结论感到兴奋并对其抱有必胜的信念。他宣称，生息资本为“**资本神秘化的最显眼的形式**”。（Note）

我认为这里有一个马克思分析的重点。他在第二卷中不愿意（甚至达到强迫性拒绝的程度）讨论特殊性，和在这里他为理解生息资本流通而研究这种情况的必要性形成了对比。

这就提出了这些特殊性和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只有在这个语境下，从第二卷中对根本事实的考察转向第三卷中拜物教性质的表面现象才是有意义的。……马

克思对此的可能回答是，表面运动所展示出来的强烈矛盾只有通过研究内在动力才能被预见和理解；这一内在动力不仅生产出拜物教的形式，而且巩固了拜物教对资本运动规律的干预。因此，我们阅读这些章节的目的就是去揭露内在规律和表面形式之间的这些关系实际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马克思认为利息同时具有“**自主的和独立的**”（马克思的原话）的性质，但是又把它包括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世界之中。他所说的“包括在”的意思即必须被确立的东西。换句话说，利息率和生息资本的流通可以以自主的、独立的方式运动，因为它们是由不断变化的供给、需求以及竞争所决定的特殊性。借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能使这些特殊性反过来以决定的而非偶然的方式来影响生产的一般性？如果存在，那么当这些特殊性自由运行时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又是如何作用的呢？或者说这些特殊性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吗？** (Note)

如果生息资本的流通执行“**阶级共有资本**”的职能，那么我们怎么有可能把它从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特定情形中排除出来？我尽可能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不管答案为何，一般来说它都会对我们如何理论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形成机制，尤其是对我们如何利用马克思的观点去分析近来发生的事件，产生巨大影响。

第一步就是要考察与通过产业资本循环产生的剩余价值（利润）相比，生息资本是如何获得它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马克思首先区分了货币资本家（那些拥有货币权力的人）和产业资本家（那些组织剩余价值生产的人）。利息率是由这两类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竞争所决定的。于是，从历史角度——如果不是理论角度的话——来看，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就被放到了中心位置。

这一关系的历史有时候被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解释：相对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自 1980 年左右起就不可避免地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这一事实催生了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比如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相比，金融资本有迥然不同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并没有（尽管在一些段落中看起来有）对其做一般性的论证。我也不打算这么做。但毫无疑问的是，同一阶级的这两个派系之间（也包括他们和这一阶级的其他主要派系，比如地主和商人之间）的**力量平衡从未达到一种稳定状态。霸权的转换肯定已经发生了**。例如，在乔万尼·阿里吉的著作中，有一个貌似有理的观点：世界经济霸权的转变（比如 20 世纪上半叶从不列颠到美国的转变）是在金融化阶段（在 20 世纪早期由希法亭、霍布森和列宁所描述的那种阶段 [4]）之后发生的。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确定无疑的金融化浪潮似乎预示了又一次的霸权转移（从美国到东亚？）。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我们需要理解不同阶级中的不同派别之间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实际的力量平衡，以及他们之间的竞争所带来的一系列结果。

但是马克思走得更远。起初表现为阶级派系之间关系的东西事实上内部化到个别资本家的人格特征中去了。所有的资本家都同时扮演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产业资本家必须总

是以货币的形式持有一定量的资本。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随时选择把自己的钱用于扩大生产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或者仅仅为获取利息将其借给他人。这一决策的逻辑为资本家提供了诱人的可能性。你会如何选择呢？是选择遭受实际生产剩余价值的一切麻烦（和爱闹事的工人、不靠谱的机器或变化无常的市场打交道），还是选择将货币借出去，一边在巴哈马群岛上享受生活一边吃利息？根据马克思的记录，英国的许多产业资本家的野心是不断进行生产，直至他们的财产足以使他们成为食利者或者金融家，那么在退休后，他们单靠利息就可以在田庄里过上舒适的生活。但马克思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试图做靠利息或者租金生活的食利者而没有人愿意去生产剩余价值，那么**利息率就会降到零**，与此同时，再投资于生产的潜在利润会涨到一个无法预计的高度。^{[6]424} 在这里，我们至少碰到了这样一种情形，即生息资本的流通必须服务于并且服从于剩余价值的生产。(Big Note)

货币的积累是可以没有限制的。简单来说，生息资本好像拥有以复利（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比喻道，它就像一只会下金蛋的鹅）速度增长的神奇（拜物的）力量。

复合增长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幻象——马克思在这里通过引用 1772 年出版的一个小册子里描绘的美妙景象而强调了这种幻象——“一个先令，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 6% 的复利放出（大概是投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会增长成一个比整个太阳系所能容纳的还要大的数目”。^{[6]445} 顺便提一句，这或许解释了为何我们不得不放弃金本位制度，直到最后纸币的发行不再需要任何的商品基础。于是，世界货币的供给是无限的，因为它们仅仅是数字而已。**美联储可以转眼之间立即增加约一万亿美元的货币供给（但增加金块就另当别论了）**。虽然无限积累的观点“胜过一切信仰”，但马克思表明，它实际上促使了 1847—1848 年和 1857—1858 年两次金融和商业崩溃的发生。借贷关系能够脱离控制并产生越来越多的信用货币（欠条数目的增加）。这必然会带给所有的信用市场一种虚拟的性质。

因此，在这里，马克思使用了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又不成熟的概念：虚拟资本**。这给了货币资本的拜物教性质一个更为形象可感的形状和形式。……我再次强调，拜物教正如在第一卷中定义的那样，是真实和客观的，即使它掩盖了深层的价值关系。超市里的商品的确是用来交换回货币的，但却是以掩盖创造了它的劳动（价值）的信息的方式。虚拟资本的概念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它并不是因为嗑了药而精神错乱的华尔街银行家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一种真正的资本形式——以有价格的商品形式存在的货币。虽然这种价格可能是虚拟的，我们也不得不回应它（不管是支付抵押，为我们的存款寻求利息，还是借钱去做生意）。

在马克思对借贷资本（为扩大生产而借的货币）和扩展到贴现票据（促进市场上价值的实现）范围内的货币之间区分的讨论之中，有一个重要且简洁的说明。**货币资本从完全不同的两方面介入了产业资本的流通——即循环的开始阶段和结束阶段**。同一个金融家可以一面借钱给开发商建造住宅，一面借钱给买方购买那些住房来保证市场需求。因此货币资本同时增加了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很容易看出这是怎么成为一个封闭循环的（比如，**在住房的生产和实现过程中产生的资产泡沫**）。这便是利息率和利润率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极为重要且经常是投机性的方式。(Big Note)

实际上，马克思表达的是，在利息率的决定中存在某些不能比较的东西，所以才是不

合理的、矛盾的。

接下来，有必要提出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首先，马克思的坚决主张——即对作为虚拟资本范畴基础的利息的拜物教性质的观点——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资本运动一般规律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解？虽然商业资本分配范畴似乎可以纳入到**马克思之前建立的一般理论框架之中**，但相比于产业资本的流通，**生息资本流通**的影响似乎是另外一回事。在我看来，马克思理论中另一个重要的“无理数”——**地租**——**也不能纳入到他的理论框架中**，尽管他已经做了相反的说明。和利息一样，地租也是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一种真实存在并产生了实际影响的形式。当你到曼哈顿定居时，你不能说因为地租和房价是虚拟的，你就不需要为一个虚构的东西支付任何费用。大多数人通过为房屋抵押贷款支付利息而买到了房子——这种利息也是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

那么，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使利率服务和服从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力量来自哪里呢？……某种规训力量在起作用——它把投机性金融活动的所有幻象和谎言拉回到了实际生产的尘世之中。但是，马克思的分析中同样存在令人不安的迹象——**金融和生产之间的权力关系可能反过来**。

其中一个迹象来自于对马克思分析的附加说明，看起来相当有趣。当一个产业资本家以货币形式积累资本并将其存到银行中获取利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涉及固定资本流通时，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因为资本家必须贮藏货币资本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换代）时，利息就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对所有权的回报率。**这种纯粹财产所有权的消极回报与通过对生产的组织和监督进行的积极的剩余价值创造形成了对比**。那么，为什么资本家不愿意给某些人支付监督工资来照看生产，自己获取纯粹的财产所有权的回报？这就引出了一个资本主义历史中非常有趣和至关重要的区别——**所有权与监督管理**。记住这些要点，让我们开始讨论文中的细节部分吧。

生息资本却不是这样。它的特有性质也在于此。要把自己的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来增殖的货币占有者，把货币让渡给第三者，把它投入流通，使它成为一种作为资本的商品；不仅对他自己来说是作为资本，而且对他人来说也是作为资本；它不仅对把它让渡出去的人来说是资本，而且它一开始就是作为资本交给第三者的，这就是说，**是作为这样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具有创造剩余价值、创造利润的使用价值**……它既不是被付出，也不是被卖出，而**只是被贷出**；它不过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转让：第一，它过一定时期流回到它的起点；第二，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流回，流回时，已经实现它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种使用价值。

作为资本贷放的商品，按照它的性质伙食作为固定资本贷放，或是作为流动资本贷放。^{[6]384}(Big Note)

马克思把以商品形式进行的借贷归为生息资本循环的一般形式。然而，这样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含义。如果财产（比如房屋）和土地都可以被借出，那么租金和生息资本的循环之

间就一定存在一种内在联系。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我在其他地方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而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深入，我就越觉得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缺失环节。(Big Note: 可以联系现实中的出租房屋)

借贷资本的出发点和复归点，它的放出和收回，都表现为任意的、以法律意义上的交易为中介的运动。……作为独特的商品，资本也具有它的独特的让渡方式。因此在这里，回流也不是表现为一定系列的经济行为的归宿和结果，而是表现为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一种**特有的法律契约的结果**。回流的时间取决于再生产的过程；而就生息资本来说，它作为资本的回流，好像只取决于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协议。因此，就这种交易来说，**资本的回流不再表现为由生产过程决定的结果，而是表现为：好像贷出的资本从来就没有丧失货币形式。当然，这种交易实际上是由现实的回流决定的。但这一点不会在交易本身中表现出来。**^{[6]389-390}

这种贷放就是把价值作为资本而不是作为货币或商品来让渡的适当形式。(Note)^{[6]392}

就其余的商品来说，使用价值最终会被消费掉，因而商品的实体和它的价值会一道消失。相反，资本商品有一种特性：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不仅会保存下来，而且会增加。^{[6]393}

因此，“借贷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也表现为这种资本生产价值和增加价值的力量”。并且，“这个使用价值与普通商品不同，它本身就是价值，也就是由于货币作为资本使用而产生的那个价值量超过货币原有的价值量所形成的余额。利润就是这个使用价值”。^{[6]394} (Note)

它通过使用才自行增殖，才作为资本来实现。但借入者必须把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即作为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利息）来偿还；而利息只能是他所实现的利润的一部分。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6]395}

货币，商品也一样，自在地，潜在地，在可能性上是资本，它们能够作为资本出售，并且以这个形式支配他人的劳动，要求占有他人的劳动，因而是自行增殖的价值。

其次，资本所以表现为商品，是因为利润分割为利息和**本来意义的**利润是由供求，从而由竞争来调节的，这完全和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它们来调节的一样。但是在这里，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一样的明显。**如果供求平衡**，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和它的生产价格相一致，也就是说，这时它的价格就表现为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规律**来调节，**而不是以竞争为转移**，因为供求的变动只是说明市场价格同生产价格的偏离。^[31]

(哈维注：这是一个第一卷中常见的论点——在均衡时，供给和需求解释不了任何东西。甚至连工资也是这样的：)

如果供求平衡，供求的作用就会相互抵消，工资就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但货币资本的利息却不是这样**。在这里，竞争并不是决定对规律的偏离，而是**除了由竞争强加的分割规律之外，不存在别的分割规律**，因为我们以后会看到，并不存在“自然”利息率。相反，我们把自然利息率理解为自由竞争决定的比率。利息率没有“自然”界限。在竞争

不只是决定偏离和波动的场合，因而，在它们的互相起反作用的力量达到均衡而任何决定都停止的场合，那种需要决定的东西就是某种本身没有规律的、任意的东西。^{[6]398}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资本积累的动态变成了无规律的和任意的。这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建立起来的，目前为止在整部《资本论》中用来研究资本运动规律的一般性的交战规则（rules of engagement）的大厦似乎都要被瓦解了。这座大厦倒塌与否取决于接下来几章的内容，因为马克思说：“在下一章，我们要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这显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框架产生了背离。马克思发现他无法把生息资本的流通放到迄今一直指导他研究的假设框架里面。……我不由得想到，面对这种背离的未知结果，马克思一定感到非常困难，压力巨大。一方面，在这几章中蕴含的紧张情绪说明把框架限制抛于脑后的激动；但是，对生息资本的解释失去控制（这种不确定性和独立性）威胁到了他之前所建立的整座理论大厦。

在这些段落中隐藏着另一个重点。马克思使用了“生产价格”这个术语，而不是“价值”。这一术语上的改变有深刻的含义，但是我不打算在这里对其进行解释，因为在第三卷前面的几个章节（第 9 章和第 10 章）中，在分析有着不同价值构成的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如何使利润率平均化时，这一问题已经出现过了。简单地说，**利润率平均化的作用就是：使商品按照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平均利润率的价值形成的生产价格（ $c+v+p$ ），而不是更早的公式 $c+v+m$ 所决定的商品价值进行交换。利润率平均化的结果就是，低价值构成（劳动力比例较高）的部门中的剩余价值会向高价值构成（不变资本比例较高）的部门移动。** (Big Note)

那么，当竞争从一个资本运动内部规律的纯粹执行者变成一个资本积累的无规律特性的积极决定因素时，事情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马克思一开始批评了吉尔巴特关于“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的观点。这一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利息率是一种**法律契约**而不是一种商品交换。在马克思看来，正义是“生产关系”的“自然结果”。虽然，这种“法律形式”表现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但正义的内容“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因此，奴隶制和商品质量上的弄虚作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都是非正义的，而雇佣劳动却不是。^{[6]379} (Note)

他并不完全信奉柏拉图在《对话录》中赋予塞拉西马柯（Thrasymachus）的观点——正义由社会中最有权威的人说了算（这是柏拉图为了说明更完美的正义理想而尽力去证伪的一个观点）；然而，马克思坚决反对柏拉图式的普世理念。正义是嵌入到由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关系中的（随着资本逐渐主宰了社会关系，自由主义的正义论产生了）。“正义的”利息率是和资本的持续再生产相一致的利息率。它明显区别于高利贷。这并不意味着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资产阶级的正义观念中不存在矛盾。但是马克思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存在一些阿基米德的支点，某种完美的正义形式和道德规范可以用这些支点评判世界。他认为，这是蒲鲁东论证的主要缺陷。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工业在其中运动的周转周期——沉寂状态、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崩溃、停滞、沉寂状态等等，对这种周期做进一步分析，则不属于我们的考察范

围——我们会发现，**低利息率多数与繁荣时期或有额外利润的时期相适应，利息的提高与繁荣转向急转直下的阶段相适应，而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6]404} (Big Note)

然而，**这仅仅是一种经验性的概括，而不是理论上的论述。**马克思也假设在危机的高潮时期，国家对货币供给的干预无法使利息率下降到接近零的地步（而这正是美国自 2007 年以来的情况）。我提到这点是因为，很明显，马克思试图掌握货币资本供求波动时的供求状态，但是除了对利息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变动关系做经验概括以外，似乎没有其他方法了。

不过，利息率即使完全不以利润率的变动为转移，也具有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

- 1，在老的富有的国家，不愿亲自使用资本的人所占有的国民资本部分在社会全部生产资本中所占的比例，比新垦殖的贫穷的国家大。在英国，食利者阶级的人数是多么多啊！随着食利者阶级的增大，资本贷放者阶级也增大起来，因为他们是同一些人。（拉姆塞）
- 2，以银行家为中介，产业家和商人对社会各阶级一切货币储蓄的支配能力也跟着不断增大，并且这些储蓄也不断集中起来，达到能够起货币资本作用的数量。这些事实，都必然会压低利息率的作用。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金融系统在集中用于流通的初始资本中所起的作用（像以往一样，他保证“这一点以后还要详细说明”）。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金融系统扮演的调动社会各个阶级的储蓄，并将这些储蓄作为货币资本进行重新配置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但是，问题在于，“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平均利息率**——不同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在这方面，像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利润率和自然工资率那样的自然利息率，是没有的”。因此，“当竞争本身在这里起决定作用时，这种决定本身是**偶然的，纯粹经验的**，只有自命博学或想入非非的人，才会试图把这种偶然说成必然的东西”。但**“习惯和法律传统等等都和竞争本身一样，对它的决定发生作用”**这一事实也削弱了竞争的影响。^{[6]406-407} 而“这两种有权要求享有利润的人〔产业资本家和放贷人〕将怎样分割这种利润，本身是和**一个股份公司的共同利润在不同股东之间按百分比分配一样，纯粹是经验的、属于偶然性王国的事情**”。这和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关系大不相同（按马克思的说法，地租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在利息上……质的区别相反地是从同一剩余价值部分的纯粹量的分割中产生的，”而工资和地租的情况则是刚好颠倒过来。地主提供有形商品——土地，劳动者提供劳动力，但是货币资本家只提供货币资本——它只是一种价值的表现形式，对实际生产没有什么看得见的贡献。(Note)

一般利润率当然是由决定剩余价值的因素（剩余价值量，预付资本量以及竞争的状况）所决定的。这与利息形成了对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利息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但是，存在着

在我们着重指出利息率和利润率的这种区别时，我们还撇开了有利于利息率固定化的以下两种情况：1. 在历史上是现有生息资本，并且有一般利息率流传下来；2. 世界市场不以一个国家的生产条件为转移而对利息率的确定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比它对利润率的影响大得多。^{[6]412}

根据我之前提到的，货币，尤其在信用的形式下，是资本可以自由飞翔的“蝴蝶形式”。证券市场上的利率变动报告就像“气象报告”一样，但借贷资本的价格仍然收敛于一个一般值：

在货币市场上，只有贷出者和借入者互相对立。商品具有同一形式——货币。资本因投在特殊生产部门或流通部门而具有的一切特殊形式，在这里都消失了。在这里，资本是以独立价值即货币的没有差别的彼此等同的形态而存在的。特殊部门之间的竞争在这里停止了；它们全体一起作为借款人出现，资本则以这样一个形式与它们全体相对立，在这个形式上，按怎样的方式使用的问题对资本来说还是无关紧要的事。如果说产业资本只是在特殊部门之间的运动和竞争中表现为**一个阶级的自在的共有资本**，那么，资本在这里则是现实地充分地、在资本的供求中表现为这样的东西。^{[6]413}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想法。在不理解货币资本是如何作为一个阶级的自在的共有资本运作的情况下，我们究竟如何能揭示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呢？

另一方面，货币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也实际具有这样一个形态，在这个形态上，它是作为共同的要素，而不问它的特殊使用方式如何，根据每个特殊部门的生产需要，被分配在不同部门之间，被分配在资本家阶级之间。并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即越来越不由市场上现有资本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的所有者来代表，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个量和实际的生产完全不同，是受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制的。因此，就需求的形式来说，和借贷资本相对立的是一个**阶级的力量**；就供给来说，这个资本本身作为**群体**表现为借贷资本。^{[6]413}（Note）

利息对他（货币资本家）来说只是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果实，表现为抽掉了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资本自身的果实，即不进行“劳动”，不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果实；而企业主收入对他来说则只是表现为他用**资本所执行的职能**的果实，表现为资本的运动和过程的果实，这种过程对他来说现在表现为他自己的活动，而与货币资本家的不活动，不参加生产过程相对立。^{[6]420}

总利润的这两部分硬化并且互相独立化了（注意此处关于独立化的主题）……好像它们出自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源泉。这种硬化和互相独立化，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资本来说，现在必然会固定下来。

资本的使用者，即使是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也具有双重身份，即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和资本的使用者；他的资本本身，就其提供的利润范畴来说，也分成**资本所有权**，即处

在生产过程**以外**的、本身提供利息的资本，和处在生产过程**以内**的、由于在过程中活动而提供企业主收入的资本。^{[6]421}

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这种分割，一旦转变为质的分割，就会对整个资本和整个资本家阶级保持这个质的分割的性质……

“不管产业资本家是用自有的资本还是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都不会改变这样的情况，即货币资本家阶级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家，货币资本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利息是作为一个与这种特别资本相适应的独立的剩余价值形式，来同产业资本家相对立的。”^{[6]422}但是，“不管他的资本在起点上已经作为货币资本存在，还是要先转化为货币资本”。（Note）

假如大部分的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么，结果就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地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会不可能靠利息来生活，因而会被迫再变为产业资本家。^{[6]424}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点：生息资本的循环服从于剩余价值生产，并由剩余价值生产支配。

因此，虽然“自然利息率”并不存在，但是这里也暗示着货币资本家和剩余价值生产活动之间必须保持力量平衡（或者在个人层面来说，保持一些情绪上的平衡）。目前，我们仍无法获知这一个平衡点在哪。（它仅仅是失常的和偶然的吗？）但是，这种相对于货币资本的长期的不均衡的结果将会是它的贬值——这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日本于 1990 年开始，而美国于 2007 年开始盛行的超低利率是预示这种不平衡的信号吗？（Big Note）

在利息的形式上，这种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却消失了；因为生息资本就它本身来说，不是以雇佣劳动为自己的对立面，而是以执行职能的资本为自己的对立面；借贷资本家就他本身来说，直接与在再生产过程中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相对立，而不是与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相对立。生息资本是作为所有权的资本与作为职能的资本相对立的。但是，资本在它不执行职能的时候，不剥削工人，也不是同劳动处于对立之中。^{[6]425}（Big Note: 联系当前产业不振，从而金融资本疲软外逃）

怎么强调从阶级斗争的动态过程来思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虽然在劳动过程中和劳动力市场上工人与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关系是很清楚的，工人和作为所有权的货币资本之间的关系则显得非常的抽象和不透明。发动工人去反抗货币资本的权力及其流通方式存在更多的问题。小企业比工人群众看上去更有可能反抗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权力。这些斗争**一般很难整合到通常所说的阶级斗争里**。从历史上看，反抗货币资本家权力（更为一般地反抗食利者）的斗争倾向于采取（并继续采取）民粹主义形式。最近，我们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能直观感受得到的民粹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Big Note）

生息资本给生产资本施加了生产剩余价值的压力；利息率越高，这种压力就越大。于是，生产者就对工人们说，他们所遭受的高剥削率反映了高利息率，从而把他们的注意力从生产资本家身上转移到银行家的贪婪和权力上。阶级斗争的动力因此被错放甚至是扭曲了。

然而，有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货币资本家和生产资本家这两个不同角色被内化在同一个人身上自然而然地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把自己的企业家收入当作

同资本所有权无关的东西，宁可说是他作为非所有者，作为劳动者执行职能的结果。因此，在资本家的脑袋里必然产生这样的观念：他的企业主收入远不是同雇佣劳动形成某种对立，不仅是他人的无酬劳动，相反，它本身就是工资，是监督工资，wages of superintendence of labour，是高于普通雇佣工人工资的工资，1. 因为这是较复杂的劳动，2. 因为是资本家给自己支付的工资。^{[6]427}（Note: 拜物教）

这个利息形式使利润的另一部分取得企业主收入，以至监督工资这种质的形式。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要执行的**特殊职能**，并且恰好是他在同工人相区别和相对立中具有的特殊职能，被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职能。他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是因为他除了具有作为资本家的属性以外，他也进行劳动。因此，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与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因为资本异化的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被转移到现实的剥削过程之外，即转移到生息资本上，所以这个剥削过程本身也就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因此，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二者作为劳动成了同一的东西。^{[6]429-430}

这样一来，“利润的一部分事实上能够作为工资分离出来”。在以更为复杂、更为细化的分工为特点的大规模生产企业中，这种工资实际上付给了经理人。

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和指挥的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厂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

另一方面，——完全撇开商业部门不说——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活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隶制度下所起的作用达到了最大限度。^{[6]431}（Big Big Note: 强烈对立！）

目前，已经有许多文献证明了在不列颠被广泛运用的工厂管理技术，事实上是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园中为管理大批奴隶所率先使用的。

“尤尔先生早已指出，”马克思继续写道，“‘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无论事实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进行了”。^{[6]434}

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随着信用而发展起来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占有权相分离……[6]⁴³⁷

企业主收入和监督工资或管理工资的混淆，最初是由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所采取的同利息相对立的形式造成的。由于一种辩护的意图，即不把利润解释为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把它解释为资本家自己劳动所取得的工资，这种混淆就进一步发展了。针对这种情况，于是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要求：要把利润实际地缩减为它在理论上伪称为的那种东西，即单纯的监督工资。

但是，非技能化使得监督工资也倾向于下降，所以这一错误理论承受了更大的压力。随着工人合作社的形成和股份公司的发展，“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也站不住脚了，利润在实践上也就表现为它在理论上无可辩驳的那种东西，即表现为单纯的剩余价值”。（Note: 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对资本家不创造价值的一种解释。监督工资。我感觉此处应该批判。）

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一种涉及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6]⁴³⁸

马克思借用尤尔先生的观点，预言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潜在意义，以及管理阶级出现的可能性。他并没有预测到它的全盛状态，部分是因为股份公司形式那时才刚刚起步。但是，他确实预见到了后来被称为“货币管理资本主义”下产生的各种新的“欺诈”方式的可能性。

在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形式——合作社中（就像罗伯特·欧文所做的社会主义实验那样），管理者报酬的问题也出现了。坦率地说，如果今天所有的机构和公司都以“蒙德拉贡模式”（在前面讨论过）运作，那么我们将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美国大学校长的年工资不会超过十五万美元，而不是超过一百万美元；而助理教师将不会只赚两万美元（如果他们足够幸运的话），而是能赚五万美元一年。

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G-G'$ ，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

拜物教的极端形式——信用货币——控制了资本运动规律。它产生了虚拟的形式，这些形式神秘化、扭曲并最后破坏了马克思迄今为止所关注并将之理论化的资本积累的运动规律。这里的语言振聋发聩：（Big Big Note: 破坏！）

资本表现为利息的即资本自身增殖的神秘的和富有自我创造力的源泉。现在，物（货币、商品、价值）作为单纯的物已经是资本，资本表现为单纯的物；总再生产过程的结果表现为物自身具有的属性……因此，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

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下面这一点也是颠倒的：尽管利息只是利润即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利息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原初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和增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在 G-G' 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生息形态，资本的这样一种简单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具有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

对于要把资本说成是价值即价值创造的独立源泉的庸俗经济学来说，这个形式自然是他求之不得的。^{[6]441}

更重要的问题是：资本家对这种拜物教形式的颠倒扭曲已经迷信到何种程度，以至于他们不能理性地安排自己的再生产？如果说竞争的强制规律和他们所能获取的全部市场信号给他们指明了错误的方向，那么资本除了给自己挖下更深的陷阱——即便没有自掘坟墓那么严重——还能做什么？（Big Note: 资本自掘坟墓的必然）

资本作为生息资本，占有所能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而资本迄今已经获得的一切，不过是对资本的无所不吞的食欲的分期付款。按照资本的天生固有的规律，凡是人类所能提供的一切剩余劳动都属于它。这个摩洛哥赫！（Big Big Note）

只有当利润（剩余价值）中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即被用来吮吸新的剩余劳动的那部分，可以叫作利息的时候，资本的积累过程才可以看作是复利的积累。^{[6]447-448}

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完成了。按照这个观念，积累的劳动产品，而且是作为货币固定下来的劳动产品，由于它天生的秘密性质，作为纯粹的自动体，具有几何级数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6]449}（Note）

当在没有界限的货币系统内流通的生息资本上下盘旋，到达复利资产和虚拟资本价值的最上层时，实际剩余价值生产的量的界限很快就被抛在脑后了；只有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这种限制力量的存在才被承认。（Big Note）

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的利润一般地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6]453}

在获得货币的愿望之后，下一个迫切的愿望是，按照某种会带来利息或利润的投资方法，再把货币投放出去；因为，作为货币的货币是什么也生不出来的。因此，如果在过剩资本不断涌来的同时，投资范围得不到逐渐的充分的扩大，那么，**寻找投资场所的货**

币就必然会周期性地，在不同情况下多少不等地积累起来。多年来，国债一直是英国过剩财富的一个大吸收器……在经营上需要巨额资本并不时地吸引多余的闲置资本的各种企业……至少在我国是**绝对必要**的，以便为在普通投资部门找不到地盘的社会过剩财富的周期积累打开出路。^{[6]468}（Big Big Note）

第九章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第 27—37 章）

几经尝试后，恩格斯放弃了重建马克思《混乱》中的观点，最终他将自身的努力仅限于复制马克思的笔记，并强调了一些他临时做出的批判性补充。……我想先对我所理解的总体脉络做一个综述。必须澄清的是，我这样做并非是要声称我的解读是唯一可能的，更不用说是唯一正确的。

它将货币资本循环看作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引导了实现总体资本再生产的资本流动。此外，它意味着一种资本的社会化——标志着资本特征的一些根本改变。例如，股份公司有利于集体、联合资本的出现，一方面允许了资本主义在规模、范围以及形式上的巨大扩展，另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市场的道路，在世界市场里联合劳动和集体产权会得到更快的发展。马克思甚至认为股份公司会由于其联合的特性而成为向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基础。这个观点在现在看来即便不是错误的，也是很奇怪的，但在他那个时代确实存在一些有趣的原因使人考虑这种可能性。（Note）

圣西门想要给国王提供建议，于是他给国王寄了很多书信，提出了改善集体生活的各种途径，以避免他所极度厌恶的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力变革。圣西门大概是最早提出欧盟之类想法的思想家之一。假如人们听从了他的建议，两次世界大战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他提出政府应该具有合理性和代表性，从而在仁慈的君主制度下可以通过立法保证所有阶级的利益。他还强调了将资本和劳动力（包括手工艺人和资本主义企业家）结合起来以建造有助于提高每个人福利的大规模（一定程度上是有计划的）项目和市政工程的重要性。为了使之变为现实，就需要将分散在社会中的以浪费形式存在的小量货币资本以联合的形式集中起来。

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各个生产当事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6]670}（Note）

正是信用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使所有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阶段，使金属准备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执行它应该执行的职能。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引起了整个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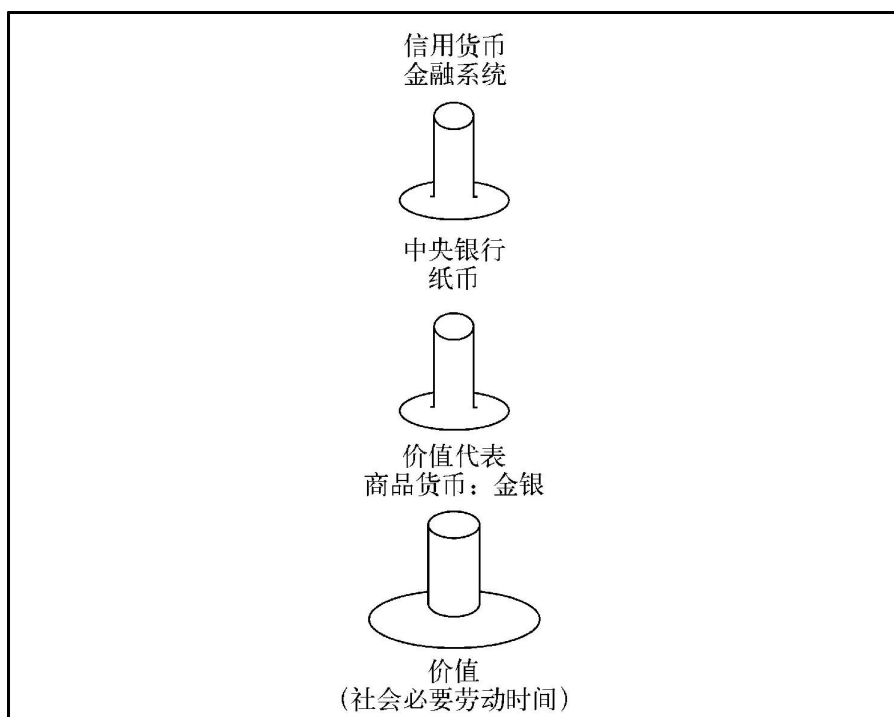


图 9.1: 马克思的等级制货币体系

体的这种过敏现象。^{[6]648}（Big Note）

尽管连全球信用和货币体系中徒有其表的金属或商品基础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就被废除了（虽然所谓的主张回归金本位的人还很多），全球金融体系枢纽（以美元为中心）的等级制结构设想貌似依旧是合适的。我们比马克思活着的时候更接近这样一种现实：

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和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像的东西。

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而应当能够满足这种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银，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6]650}（Big Big Note）

那么当信用货币和信用业务取代了商品货币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第一，“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会突然作为惟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就是说，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它们自己的纯粹幻想的形式”。这里确切体现了拜物教理论。第二，“信用货币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当金流向国外时，信用兑换成货币的可能性，即它和现实的金的一体性，就成问题了。为了保证这种兑换的条件，就采取各种强制性的措施，提高利息率等等。……信用货币的贬值（更不用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

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6]584-585}（Big Big Note）

这就是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中发生的事情吗？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努力去纠正的“不可避免的”的问题吗？

这种情况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表现得最为尖锐，并且以矛盾百出、荒唐可笑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 1.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为直接的使用价值，为生产者本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已经完全废止，因此，财富只是作为社会过程而存在，这个社会过程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错综交织；2.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企图突破对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在这个限制面前碰破头。**^{[6]650}（Big Big Note）

马克思认为，纯粹基于商品货币的货币体系将会成为资本进一步积累的障碍，这是因为金的数量满足不了需求。我们现在所谓的“金融抑制”是一个明显的、持续的危险，当货币（任何种类）的数量不足以支撑资本积累带来的持续扩大的商品量流通时，这种“金融抑制”就会出现。因此信用货币不但对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是必需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有初步的证据表明（虽然据我所知还没有经验研究）资本积累的历史是和信用货币的积累以及与其共存的债务积累同步进行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资本才能“**没有限制地**”进行积累。但是如果资本积累取决于同时进行的信用货币和信用票据的积累，那么必定会产生一种基于信念、信任和预期且会周期性突然失控的拜物教信仰。信用货币不是简单地代替贵金属货币：他们会把货币体系和货币的概念带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上，**会欢迎而不是揭穿在信用制度中所隐含的拜物教**。信用“泡沫”，资产泡沫，以及投机性的繁荣和萧条都是资本为了将自己暂时地从货币—商品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而必须付出的代价。（Big Big Note）

对信用制度至关重要的是，它具备冲破一切资本积累的货币障碍而无限增长的能力。纸币（欠条）的创造会导致无限的可能性。美国 2001 年之后的房地产泡沫就是这样出现的。价格在上升，每个人都从房价上涨中大赚一笔，而且他们赚得越多，价格就涨得越多。房子就像 ATM 机一样，没有提取的限制，**直到人们意识到房地产的价格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他们收入的支付能力**。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接踵而来。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土地投机热潮破灭之后发生了相同的事情。当崩溃来临时，所有者（掌控着硬通货）的资产流动性才是最重要的。当人们发现**流动性不足的时候，止赎、损失和资产贬值就越积越多**。（Big Big Note）

但是，如果整个货币体系中的贵金属“枢纽”消失了，那么什么会取代它成为枢纽呢？答案就是**世界央行和国家监管当局两者的结合体（我把它称作“国家—金融联合体”）**，它们共同形成了全球货币和信用制度的枢纽。对于马克思而言，这种枢纽就是英格兰银行，而对

我们而言，就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和世界其他央行及监管当局，比如英国、日本和欧盟的央行。然而**它们的效果是，用人造的制度取代依赖于实际商品生产（金和银）的调节机制。人们的判断是信用创造的唯一规则。**但是，人造的制度能正确发挥作用吗？我们必须转而关注央行的组织和调节，以及政策是如何由国家机构制定出来以应对信用制度的周期性过剩的。（Big Big Note）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管制失灵影响了最近的几起事件，也有人鼓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危机的解决之道就在于建立一个更好的监管机制。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样的一个欧洲央行呢？**它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唯一目标而不顾失业**，它面对希腊债务危机时束手无策，仅仅推行紧缩政策使得希腊元气大伤并日益衰退。人造的制度是不可靠的，受制于各种社会势力和矛盾意见。他们创造了一个大不相同的调节机制，和商品货币依然作为枢纽时的央行相去甚远。

即便在马克思的时代，金融机构及其政策的不可靠性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马克思把“错误的”1844 年英国银行法案作为最好的例子。这项立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了“一个发行部和一个银行部”。[12] 前一个部门持有政府债券和金属储备，以此为储备金发行银行券。该部门用银行券（对贸易极为便利）换取金，并承诺如果需要的话，银行可以“支付给持券者”金（在英国的银行券上，依旧可以找到答应支付给持券者的语句）。因此，在任何时候，我拿着银行券去银行就可以换金。简而言之，银行券是可兑换的（停止兑现往往是那时候的政治选择，实际上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就曾经中止兑现金）。另一个部门则贴现票据，承兑支票，发行债券并参与其他传统的银行业务。1844 年的立法在银行的两部分之间创造了一堵防火墙。但是在 1848 年，一场信用危机打击了银行部。人们对已贴现商业票据和债券失去了信心，发生了银行挤兑。银行部用光了金，而发行部门却拥有大量的金：

左拉的小说《金钱》以萨加尔（贝列拉兄弟）和甘德曼（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第二帝国时期的斗争为中心，描写金融投机中人们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下面是萨加尔说的一番话，他想要说服他严肃、高尚、好沉思的侄女卡洛琳娜夫人，改变她瞧不起他的投机活动的想法：

“看这儿，”萨加尔喊道，“你将会看到这些无人区和荒芜道路的彻底的复兴，我们的铁路将会穿过这些地方——是的！当我们把新的血液注入到这个体系的干涸的血管里时，土地将被清整，道路和运河将被建造起来，新的城市将会破土而出，生活也会好起来的。是的！这就是货币带来的奇迹……”

“你一定要明白，投机、赌博就是核心，是心脏。是的，它从各个小支流中吸引、收集了血液，然后再在河流中把血液输送到各个方向，于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货币流通**，这正是大企业的生命所在。”

“投机——为什么是我们所必须经历的刺激物？因为投机是强迫我们生活、奋斗的永恒的欲望。没有了投机，噢我亲爱的朋友，什么类型的买卖都会没有……投机和爱情是一样的。相爱和投机都充满了肮脏；相爱时人们也仅仅考虑他们自己的喜悦；但是没有爱情就没有生命，那么世界就将终结。”

读了这段文字，你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提到贝列拉时会说起他“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信用制度看上去是混乱和不受约束的，它酝酿投机热潮和周期性崩溃的能力不受限制。这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利息，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的话来说，属于特殊性，并且由其他特殊性调节（如果可能的话）——比如货币的供给和需求，还有不同资本派系之间的竞争。因此，利息注定是偶然、不受约束和失常的。利息也取决于信念。

对于这种阶级关系的永恒存在来说，资本“白手起家”的神话可以有效地巩固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地位，同时使资产阶级得到更新和保持活力。因此缺乏向上的流动性（或是向上的流动性减小，正如美国近期那样）往往被看作是不利于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就现代信用制度促进了这种向上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来说，它也有积极的一面。（Note）

这种反高利贷的激烈斗争，这种让生息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要求，只是这样一种有机创造物的先声，这种有机创造物以现代银行制度为形式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条件。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6]682}

但是，绝不要忘记，第一，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第二，**信用制度以社会生产资料（以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形成）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6]685}

马克思显然把话说得太死了，因为我们现在的货币体系就不是以贵金属为基础的。我们也许要用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列宁一个世纪前提出的目的论观点，即**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采取的最高级也是最后的可能形式**。虽然毫无疑问金融资本在一些历史阶段上变得更为突出，甚至拥有霸权地位，但是我认为资本各部分之间的力量均衡不会注定只向一个方向演变的。（Big Note）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样一个阶段，货币和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已经变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很难想象一个可以从外部对金融化进行调控的国家力量。证据便是美国最近的多德—弗兰克金融管制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基本上是由银行家写的，不仅实施得不清不楚，而且每条每款都主要遵循了银行业游说集团的意志。但是，如果我的观点——国家—金融联合体在资本主义历史中发挥了长期的作用——是对的，那么这种“内在关系”不过是使资本回到了它的起源。那么，这究竟是意味着国家仅仅是资本的一种工具，还是意味着近年来国家和金融（注意，只是金融，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的融合已经变形成了某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确实，债券持有人现在对国家政策的公开影响力似乎比以前更大了。但是我还记得哈罗德·威尔逊（20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工党首相）曾经抱怨“苏黎世侏儒”决定其经济政策的力量，正如他让步于伦敦金融家的需求而牺牲英国生产资本的利益一样。这和比尔·

克林顿著名的失意的感叹相同。在他的首次就职典礼前，克林顿对他的经济顾问们说：“你们的意思是说，我的经济政策和连任前景都要取决于一群该死的证券交易员的观点？”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的确如此！”我认为，我们对国家和金融的力量交织历史的了解，还没有精细到足以判断我们现在是否处在不同的处境的地步，尽管我们确定地知道金融管制和金融制度改革的问题现在已成为了国际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解决。

但是马克思特别讨论了信用制度内部的“内在力量”将把我们引向哪里。“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从而自在地，但仅仅也是自在的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叙述，但是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在其他地方会重复提起。“银行业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

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6]686}

第十章 信用和银行系统的作用（第三卷第27章开始）

第27章，马克思列举了许多金融部门发挥的重要作用。总结如下：

1. 它促进了货币资本在部门和产业之间的顺畅流动，这样利润率到处都被平均化了。马克思在此之前把信用的功能归为“阶级的共有资本”，我认为主要就是这个意思。资本的“蝴蝶”形式不停地移动，使不同产业、活动和地区的收益率标准化。

2. 它显著地减少了（a）流通费用——通过免除商品货币的使用，用纸币取代黄金和降低了为适应商品交换的波动而持有准备金（窖藏）的必要性，同时（b）减少周转时间（或者“加速商品形态变化的速度”和加速“货币流通的速度”）。这种流通的加速通常会延伸到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总之，它促进了资本的加速（周转时间的分析很清楚地表明了这点）。

3. 它允许股份公司的成立，使可能的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允许以前的政府职能私有化，并有助于集中资本（正如第一卷中提到的）。这意味着许多资本主义企业现在取得了和私有、个人相对立的社会特征。马克思有些令人惊讶地推断：“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它加强了这种转化——“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6]495}

因为利润在这里纯粹采取利息的形式，所以那些仅提供利息的企业仍然可以存在；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6]496}（Big Note）

保罗·博卡拉（Paul Boccara），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认为这是这些年中阻碍利润率趋于下降的主要力量。投资于大规模基础设施的资本（不论是由国家还是股份公司融资）的确可以，而且一般也是以这种方式流通的——只要求利息，事实上补贴了其他地方的利润。个别资本家也可以选择租用他们的大部分不变资本（比如叉式升降车和其他形式的机械），从而节约了大量不变资本的费用（对他们而言）。他们只支付了以商品形式借贷的资本的等值利息，而不是支付商品的全部价值（利息加利润）。（Big Big Note）

现在，固定资本的物理量（physical mass）嵌入建成环境（这个物理量证明了生产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比率极大提高的观点）中，这种固定资本的绝大部分主要不是通过相关商

品的直接买卖而是作为获取租金的生息资本进行循环。地租的榨取和生息资本流通（巨额的抵押贷款市场的存在就是绝好的例证）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资本主义动态中的重要特征。这是一个马克思几乎没有涉及的话题（尽管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抵押贷款被定义为“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Big Big Note: 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策略是不是也这样呢？）

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6]497}

第二帝国时期巴黎风趣的评论者们说，资本和商业变成了“其他人的钱”，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这就是贝列拉兄弟构想的世界：圣西门的乌托邦成为反乌托邦。马克思指出的“金融贵族”在今天更加显要。

“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马克思认为这里涉及的社会化有巨大的潜在重要性。“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结果，“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变成荒唐的了，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6]498}（Big Big Note）

在资本主义生产很不发达的阶段还有某种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里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6]498}（Big Big Note）

他考察货币经营资本历史时要阐明的一般主题是，高利贷和利息必须被规训并服从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特殊的产业资本循环的要求。然而这些段落意味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完全不受控制，以致它现在反而以有害的、扭曲的方式威胁到资本和剩余价值生产的世界。它以掠夺式积累而不是在生产领域剥削劳动力为中心。它在经济中再次引入高利贷业务，尽管和很久以前的高利贷完全不同。这会威胁到资本积累的持续性吗？马克思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确实暗示了这种可能性。

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

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6]499

马克思完成这一章的草稿后，恩格斯插入了几页来描述公司资本的力量的演化。可以推断出，恩格斯认为从这一切中建立任何进步事物的时机都早已过去了。恩格斯在其他地方写到，马克思非常尊敬圣西门的思想，即为了进步的目的运用联合起来的资本的力量。在这里，马克思美化了这个思想，并提出了通过工人的协同控制来管理联合起来的资本的前景。尽管他承认这些工人合作社注定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许多缺点，但它们至少为通过合作运动和实践的传播来征服一个国家提供了一个依据。（Big Note）

这一问题很重要，因为当代许多正在进行的运动相信这一时机已经再次来临了——通过接管工厂进行的生产的民主化，可选择的“团结经济”（Solidarity Economy）的发展，物物交换网络和其他合作形式——它们本身就是一条通向一个彻底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重建的道路。尽管许多参与者意识到，在合作社形式里，不仅自我剥削十分困难，而且不可避免地再生产出了他们寻求取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很多缺陷，这条道路还是经常被描述为民主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唯一选择。似乎信用制度的兴起和资本社会化提供了合作社和工人控制可能兴盛的“自然”基础。然而，这里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中把所有信用集中于工人控制的国家手中的要求。

但是也有许多引人警戒的故事。前些年，皮奥里和萨贝尔写了一本颇有影响力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他们提出，弹性专业化和小批量生产的新劳动实践，为工人控制的小规模合作生产（如第三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区所展示的）开辟了空间（和 1848 年存在的相似）；这种形式将打败公司主导的工厂生产形式，并提供转化到分散的社会主义的机制。[15] 皮奥里和萨贝尔发起了一场相当有效的运动（特别是在欧洲）来说服组织起来的工人放弃对新技术和新组织形式的敌意，让他们像拥护自由解放一样拥护弹性专业化（他们非常迷恋蒲鲁东的观点，当然这些观点是马克思不能容忍的）。皮奥里和萨贝尔没有意识到的是，弹性专业化促进了灵活积累下的恶意剥削的实践，而灵活积累居于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核心。弹性专业化成为所有采用它的生产场所中规训和压制劳动力的主要手段。现在再没人亲切地说它能带来解放了。**历史上很多事物看似蕴含着解放的可能性，结果却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支配性实践的回归，这的确很令人悲哀。所以，当心你自己的愿望。**

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更有意义的区别是货币被资本家用来购买用于生产的商品，还是被借来购买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这个区别是“收入的货币形式和资本的货币形式之间的区别”。[6]503 两种货币的使用都包含在产业资本的流通中。马克思有时把流入生产的信用称为“货币资本”，与流向消费者支持市场中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的“货币经营资本”相对立。

马克思仔细考察了当银行资本为了利息的回报而借出时会发生什么。他指出，利息可以看作任何收入流的等价物。如果利率是 5%，那么“每一笔固定的二十五镑的年收入，都可以看作五百镑资本的利息”。但马克思评论这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收入流的后面不一定要有任何实际的货币资本。比如，许多美国公民每月都会收到社会保险支票，但认为这笔货币流是某些国家持有的资本的利息的想法是一种幻觉。然而，社会保险接受者如果承诺

把每年收到的二万五千美元交给银行，就可以获得五十万美元的货币资本来买房子。二万五千美元的年收入被资本化为五十万美元，**即使社会保险金后面没有初始的货币资本量（只是国家提供每月收入的一种承诺，它以对工资征税的方式获得资金）**。这使我们考虑马克思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虚拟资本。

但在这一切场合，这种资本，即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这个金额从来不是要作为资本支出的，不是要作为资本投下的，而只有作为资本投下，它才能转化为一个自行保存的价值。……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一旦债券不能卖出，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然而，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种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6]527}

生息资本一般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资本家们思考方式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6]528}

马克思提到的“独特的运动”是那种我们看到的股票和债券市场每天甚至每小时的价值波动。当资产阶级理论家把工资流归于劳动者并且创造出物化在工人身上的虚拟资本时，这种颠倒错乱更显著地表现出来了。工人的价值就被计算为年工资的资本化价值。所以根据这个理论，如果工人投资教育和获得技能，人力资本价值就可以提高，他将以更高工资的形式得到回报。按照人力资本理论，工人是资本家！

所有这些背后有一个简单却关键的原则，即资本化：“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式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这笔收益流的所有权证书可以按照这个资本化的价格交易。“因此，和资本的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即使在债券——有价证券——不像国债那样代表纯粹幻想的资本的地方，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我们上面已经讲过，信用制度怎样产生出联合的资本。这种证券被当作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权证书。铁路、采矿、轮船等公司的股票代表现实资本，也就是代表在这些企业中投入的并执行职能的资本，或者说，代表股东所预付的、在这些企业中作为资本来用的货币额。这里决不排除股票也只是一种欺诈的东西。但是，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不过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

这些所有权证书的价值独立运动，加深了这样一种假象，好像除了它们能够有权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形成现实资本……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6]529-530}

事实上，它是对可能产生剩余价值的未来劳动的索取权，其中的一部分是利息（对纯粹的所有的回报）。

危机中财富和权力加速集中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2007—2012 年的金融危机证实了这一点）。（Big Big Note）

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在这里，不要忘记，银行家保险箱内的这些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债券），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要求权，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要求权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此外，还要加上这种情况：这种虚拟的银行家资本，大部分并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不论有利息，或者没有利息。^{[6]532}（Note）

我认为，这是马克思将信用制度解释为“自主的”和“独立的”但仍包含在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之中的理由。……我最喜欢的类比是它有点像青少年：一方面他们永远要求并声明他们独立和自主的权利，同时另一方面，他们的资金和法律保障锚定在家里，所以当事情出问题他们就跑回家找妈妈和爸爸。某种程度上这看起来是一种恰当的类比，这是货币和信用制度发挥作用的总体方式，每一层枢纽都由永远喧闹的青少年构成，而顶层运行的“宇宙之王”则最为混乱（见图9.1）。当体系坠毁时，他们都冲回到家中去找父母般的政府，希望得到救助，而政府作为一位宽容慈爱的家长，总是会救助他们。（Big Big Note）

但是，尤其是在危机时期，似乎有某种位于价值关系世界中的规训力量，恢复了体系的秩序。然而，马克思也承认，信用制度内的信任危机和预期危机，会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造成严重破坏。

货币借出的形式：

1. 借贷资本

货币借给生产者，用来购买从事剩余价值生产所需要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些借出的货币用来进行实际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其中没有任何虚拟的东西（尽管所有这种投资从定义来说无疑都具有投机性）。然而，当货币以发行股票的方式取得时，事情看起来有些不同。股票实际上是一种附属于纯粹的货币所有权的财产权。它实际上是对未来剩余价值生产的一个份额的法定索取权。

股票与证券是一种虚拟资本的形式，但是它们的虚拟特征因为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依然保持的宽松联系而得到缓解（用货币术语来说，企业收益支撑了股票价值）。然而，像安然那样的公司，虽然股票价格很高，并没有剩余价值被实际生产出来。它公布的收益是欺骗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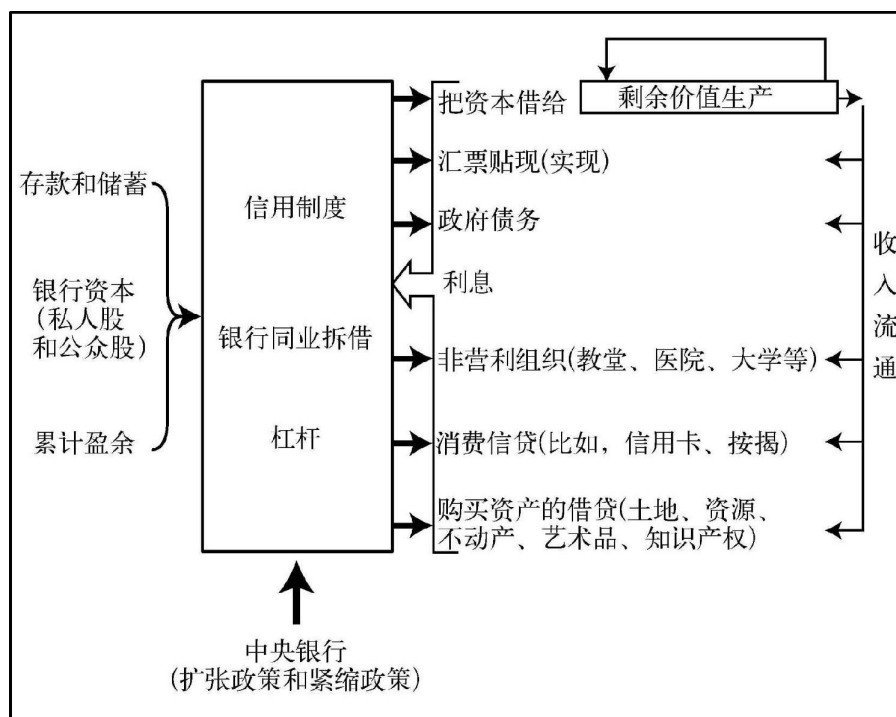


图 10.1: 生息资本的横向流通

2. 用于价值实现的借贷

货币可以被借出去实现已经生产出的商品的价值（甚至是还没生产出的，正如还没收割的农作物或将要建的房屋）。贴现率等同于那些将来某天到期的汇票的利息率。

3. 政府借贷和国债

政府可以凭借它获取收入（通过税费）的能力借到资本。它承诺将预期未来收益的一部分作为一笔资本的回报。政府债务的证书在借到的货币花光很久以后都能交易。大部分政府花费的货币与剩余价值生产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直接的关系（尽管它经常通过形成一个可行的市场而发展出间接的关系，比如，军事装备）。这是**最卓越的虚拟资本**。政府一般不生产价值或剩余价值（例如，它维持君主制和打仗）。收入税被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利息支付，它可以被资本化为一个总额，从而作为对未来收入的索取权进行交易。政府支出的一些类别确实和剩余价值生产相关。存在政府运营的企业（这些企业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很重要，直到大约 1980 年后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浪潮的兴起，但它们在中国仍然很重要）。尽管这些企业不一定要获得利润，但它们以更低的成本向其他企业提供投入，这影响了整体的利润率。政府也投资于生产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公共设施、排污和供水等等）。**它可以提供这些不变资本投入，只要求利息作为回报，因此有助于缓解任何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比如，债务融资的“生产性政府支出”这个范畴早在豪斯曼男爵重建第二帝国巴黎的基础设施时就变得极为重要了。但是大多数的政府债务是纯粹虚拟的。（Big Note）

4. 非营利组织的借贷

包括私立医院、大学、教堂、博物馆和各类文化机构。对它们的借贷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因为他们多半不生产价值或剩余价值（尽管一些大学和医院的分支机构通过创新和研究直接涉及剩余价值生产）。用于支付借贷利息的收入有各种来源，但在我们的时代主要是依靠**使用费和捐赠**。

5. 消费者信贷

迄今为止，美国最重要的消费者信贷形式是房地产抵押贷款，马克思明确将其列为虚拟资本形式的一种。尽管家中没有发生直接的价值或剩余价值生产，家务劳动在确定劳动力价值方面的作用显著影响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消费者信贷现在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它在管理经济中的总需求和为“**第二级的剥削形式**”提供充足机会中起了关键作用。马克思偶尔承认这种“第二级的剥削形式”，但一般将其作为边缘形式而不考虑。（Note）

6. 为了取得和购买资产及其他索取收入的纸质证书而进行的借贷（比如自然资源的特许权、专利、土地和房产的租金）

资产市场（从艺术投资到土地和资源买卖的所有事物）的扩散已经成为近来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显著特征。大量过剩的货币经营资本涌向这些市场。

银行家一般不歧视（尽管他们可能会专门化）这些不同的借贷选择。他们的资本会流向任何需求、回报率 and 安全性最有利的地方，以及任何未来前景看起来最光明的地方。**预期**——对未来的信念——在这些市场的运转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也存在这种可能，即一些投资可能性被其他需求（和预期）更高的投资所“挤出”。（这是常见的对大规模政府借贷或资产泡沫的批评：**它们挤出了对生产性活动的投资并增加了其他投资活动的利息成本。**）（Big Note: 不理解这句话）

在生息货币资本的流动中，不平衡会频繁发生。恰恰因为这些资本是独立的、自主的，它们可以影响总体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规律，同时自己周期性地单独酝酿一场危机。例如，如果大量过剩的货币经营资本流入土地和房地产市场（正如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以及 2000 年后的美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的情况），那么，就会造成信用流通的巨大扭曲和资产价值的投机性繁荣，直到崩溃发生并进行强制纠正。（Big Note）

即使在泡沫状况还不明显的时候，美国采取了许多措施把信用扩张到房屋所有权。这是资本从一般消费者，特别是从劳动者那里重获财富的主要方式。（Big Note）

资本的现实积累的标志，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标志，又在什么程度上不是这种标志呢？所谓资本过剩（plethora），一个始终只用于生息资本即货币资本的用语，仅仅是表现产业生产过剩的一个特殊方式呢，还是除此以外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现象呢？这种过剩即货币资本的供给过剩，是否与停滞的货币总量（金银条块、金币和银行券）的存在相一致，从而现实货币的这种过剩，是否就是借贷资本的上述过剩的反映和表现形式呢？

货币紧迫，即借贷资本不足，又在什么程度上反映出现实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不足呢？另一方面，它又在什么程度上与货币本身的不足，即流通手段的不足相一致呢？^{[6]539}

再一次用当代的说法，货币供给收缩和银行间信贷的冻结是由中央银行和国家权力机关施加的金融收缩的信号吗？还是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的信号？（Big Note）

这背后有一个更一般的问题：债务的积累和财富的积累在什么程度上是有关联的？这是虚拟资本形式的增殖所提出的问题。比如，“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因此，“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6]540}但是，像往常一样，“表现”这个词标志着在拜物教面具的背后很可能有别的事情正在发生。发生了什么呢？问题是国债（虚拟资本）积累可以转化为实际的货币资本，从而使虚拟资本变成现实资本。但这假定了国债是可以交易的。这反过来意味着虚拟资本继续和以前一样流通。股票和有价值证券也是如此，它们是“不存在的资本的名义代表”：

当这些证券的积累表示铁路、矿山、汽船等等的积累时，它们也表示现实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就像动产征税单的扩大表示这种动产的增加一样。但是，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6]540-541}

当按揭贷款打包成为债务抵押债券时，它们似乎以过去的两倍的虚拟状态存在；但是当对冲基金经理把它们卖给毫不怀疑的、轻信的投资人并出色地赚了十亿时，很遗憾，他获得了一点都不虚幻的实际货币权力。

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这种想象的货币财产，不仅构成私人货币财产的很大的部分，并且正如我们讲过的，也构成银行家资本的很大的部分。（Big Big Note）

……整个信用制度的惊人的扩大，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这些人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或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这类人的财产的积累，可以按极不同于现实积累的方向进行，但是无论如何都证明，他们攫取了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6]541}

只要再生产过程顺畅地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障，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产业资本就会过剩，不过这种过剩是在产业资本不能执行自己的各种职能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卖不出去。有大量的固定资本，但由于再生产停滞，大部分闲置不用。（Note: 马克思对周期的一个描述）^{[6]546-547}

一旦新的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在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

借贷资本的积累可以从正常资本的积累中“沉淀下来”。“在现实积累不断扩大时，货币资本积累的这种扩大，一部分是这种现实积累扩大的结果，一部分是各种和现实积累的扩大相伴随但和它完全不同的要素造成的结果”——比如，生产性公司的股票和证券价值上升——“一部分甚至是现实积累停滞的结果”——过剩商品没有卖出去，但是它的贴现价值通过汇票实现了。但“这种积累可以表示各种和现实积累很不相同的要素”——比如，资本化后上升的资产价值、政府虚拟资本的形成或消费信贷。总结果就是“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6]574}

随后信用就收缩，“（1）因为这种资本闲置不用；（2）因为再生产过程顺畅进行的信念已经遭到破坏；（3）因为对这种商业信用的需求已经减少。”^[43] 信用的缺乏使得

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在危机中，因为每个人都要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所以，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停滞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最大。这时，由于再生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地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作为商品充斥市场。因此，如果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生产资本的缺乏，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无论就正常的、但是暂时紧缩的再生产规模来说，还是就已经萎缩的消费来说，都是如此。^{[6]574}

“我们假定整个社会只是由产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构成”——撇开其他所有特征，比如价格波动和信用制度所助长的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这样，

危机好像只能由各个不同部门生产的不平衡，由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之间的不平衡来说明。然而实际情况是，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时才能被雇佣。**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6]574-578}（Big Big Note）

这当然是最有名的论断之一（第二卷第 351 页也有），和利润率下降是“现代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规律”这一断言一样，也需要结合上下文语境来理解。对产业周期的研究表明，这两种陈述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立。由于群众消费受到限制，利润率在短期内可能会下降。这和第三卷前面章节中通常用来解释利润率下降的机制是非常不同的。但是解雇工人会减少市场需求，使得商品卖不出去和生产能力闲置，从而诱发资本家减少工资并解雇更多的工人。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产业周期中这种螺旋式下跌的可能性。这是否形成了一个长期趋势

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信用制度允许资本摆脱这种直接的消费限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不顾消费界限”。在大约 1980 年以后的工资压制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私人消费主要是通过扩展消费信贷来维持的。

马克思也观察到这种螺旋式下降在信用的帮助下如何可能**反转**过来。大量的闲置借贷和货币资本——伴随着低利率——在危机后形成，并成为复苏的关键。“在危机以后的复苏时期，人们要求借贷资本，却是为了购买，为了把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或商业资本。所以，这时，要求借贷资本的，或者是产业资本家，或者是商人，产业资本家把借贷资本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6]580} **低利率使对固定资本的长期投资和开启全新的事业看上去更有吸引力。**^{[6]553} 在扩张的初始阶段利率通常维持在较低水平，这时宽松信贷发挥着其最具有建设性的作用，而这有助于进一步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一体化，正如我们所见的。（Big Note: 当前的中国，是否是低利息率呢？）在他第一次试图解释周期性运动如何开展时，马克思写道：

如果再生产过程再一次达到过度紧张状态以前的那种繁荣局面，商业信用就会大大扩张，这种扩张实际上又是资本容易流回和生产扩大的“健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利息率虽然已经高于最低限度，但是仍然很低……由于资本回流容易并且具有规则性，加上商业信用扩大，这就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虽然需求已经增长），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到这时，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靠货币信用进行操作的冒险家们，才引人注目地涌现出来。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和新型大企业的大批开张。现在，利息提高到它的平均水平。一旦新的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在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这种产业周期的情况是，同样的循环一旦受到最初的推动，就必然会周期地再现出来。^{[6]553-554}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投机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种强行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全部人为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并且，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在任何地方显现出来的都不是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而只是金银条块、硬币、银行券、汇票、有价证券。在全国金融中心，例如伦敦，这种颠倒表现得尤为明显。全部过程都变为不可理解。^{[6]555}

一切国家都会先后卷入危机……那时就会发现，一切国家，除了少数例外，出口和进口过多，以致**支付差额对一切国家来说都是逆差**，所以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支付差额的

方面。例如英国正苦于金的流出。它进口过多。但同时，所有别的国家堆积着过多的英国商品。所以它们也进口过多或被输入过多。[6]556

危机也许首先是在英国，在这个提供信用最多而接受信用最少的国家爆发，因为支付差额……对它来说是逆差，尽管总的贸易额对它来说是顺差。……在英国以金的流出作为开端并且伴随着这种流出而发生的崩溃，使英国的支付差额所以得到结清，部分地是由于英国进口商人宣告破产……部分地是由于在国外廉价抛售一部分英国商品资本，部分地是由于出售外国有价证券，买进英国国券等等。现在轮到另一个国家了。……1857 年，美国爆发了危机。于是金从英国流到美国。但是美国物价的涨风一停止，危机接着就在英国发生了。金又由美国流到英国。英国和大陆之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是像排炮一样，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6]556-557（Big Big Note）

在马克思看来，“这个现象的普遍性恰好证明：（1）金的流出只是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2）金的流出现象在不同各国发生的顺序只是表明，什么时候会轮到这些国家算总账，什么时候会轮到这些国家发生危机……”尽管马克思强调了普遍性，但这种集中于“金的流出”的连续发生的事件只是现在危机采取的一种可能的地理形式。在我们的时代，特别的是迅速增长的主权债务，比如希腊——部分产生于希腊为支付德国生产的商品而向德国和法国银行进行的过量借贷。欧元的创造促进了这个过程。欧元使更有效率的生产者（德国）受益，而破坏了南欧低效率的经济体的生产。结果是德国和法国银行持有的虚拟资本价值受到威胁，这反过来威胁到法国的主权债务，甚至最终威胁到德国，除非整个欧元区协调行动。结果证明在欧洲中央银行的“错误”章程下，协调行动特别困难。排炮，确实如此。（Note）

所有这些与信用市场相关的运动是容易察觉的。但是马克思不相信这些运动是危机的根源。根源在于资本过度积累的基本倾向和独立自主产生的过剩货币资本这两者的结合，而后者是出于自身利益堆积起来的。回想一下，

仅仅由于这些和现实积累相独立、但和它相伴随的要素扩大了借贷资本的积累，就总会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并且这种过剩会随着信用的发达而发展。因此，驱使生产过程突破资本主义界限的必然性，同时也一定会随着这种过剩而发展，也就是产生贸易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同时，这种现象必然总是在引起反作用的各种形式上出现。[6]574

我通常将这些组合称为“**过剩资本的处置问题**”。资本过剩的趋势，特别是货币形式的资本过剩的趋势，是所有危机的根源——这个论点值得探究。过剩资本很容易被吸收到虚拟资本形成和流通的通道这个事实，成为既不能逃避也不能压制的中心问题——考虑到资本的货币形式在货币资本家的绝对权力的支持下，在克服贮藏的必要性上发挥的积极作用。（Big Big Note）

第二三卷风格的差异，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它和写作的年代是不一致的。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是在完成第三卷的草稿后写的。因此，为什么马克思在写完关于商人资本和金融的激动人心和十分迷人的（尽管令人沮丧的是它不完整，而且有时前后不一致）材料后，在第二卷的论证中又回到枯燥的、技术性的叙述风格呢？

在这个背景下，他回到第二卷中资本内在本性的问题就说得通了。马克思寻找的是这种内在本性的某种 X 射线，它能说明信用制度充满矛盾的颠倒错乱现象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必然产生。为什么资本根本的、潜在的矛盾总是采取金融和商业危机的形式呢？为了揭示所有问题的答案，他在第二卷研究资本积累与流通时抛开了信用制度和生息资本的流通，以便于理解为什么资本的流通和积累必然要求信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资本来发挥作用。总之，从第二卷中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资本在缺乏信用制度时无法生存，为什么财富积累和债务积累必然是同步进行的，以及在一个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体系里，为什么价值和它的货币表现之间的中心矛盾内化为供给和需求永远不会也必然不会相等的矛盾。在我看来，上面从第三卷第 554 页引用的冗长段落，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我理解得没有错，第二卷的一个关键目标是深入剖析第三卷的金融章节中展现出来的恶毒的拜物教，那么第二卷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的地位就重新确立了，理应得到更细致深入的研究。马克思清楚地明白，他需要从流通的角度构建一个和他在第一卷中从生产的角度构建的一样的，关于资本运动规律的有说服力的模型。悲剧的是他没有完成这项工作，并且他在把生产和流通这两个视角综合为一个可行的整体之前，便过早离世了。

第十一章 资本的时间与空间（第二卷第 12—14 章）

总周转时间等于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但是，生产时间分为劳动期间——生产价值的劳动实际上被用于商品生产的时间——以及完成商品生产过程所需要的不需要劳动投入的时间（例如，像大部分农业生产一样）。

为寻找减少处于闲置状态的资本数量的方法而产生的压力不断增加。这样，像加快周转时间和库存管理那样的技术，以及像信用制度那样的制度安排就开始发挥作用。缩短劳动期间和生产时间的竞争动力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连续生产的情况下，即使生产停止，流动资本也没有受到重大损失；而在机车制造的情况下，所有已经对象化在产品中的流动资本不是被搁置就是被白白耗费掉了，因此这意味着从事这种形式的生产具有更大风险。

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只能大规模经营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或者完全不是资本家经营，而由地方或国家出资兴办（至于劳动力，在较早的时期，多半实行强制劳动）。或者那种需要较长劳动期间才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靠资本家自己的财产来生产的。^{[6]260}（Note）

在给私人建造房子时，私人分期付款给建筑业主。因此，事实上他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支付房屋的代价。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一方面大量资本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里，另一方面，除了单个资本家，又有联合的资本家（股份公司），同时信用制度也发展了，资本主义建筑业主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为个别私人定造房屋。他以为市场建筑整排的房屋或市区为业，就像单个资本家以作为承包人从事铁路建筑为业一样。^{[6]260}（Note）建筑业主不再是为顾客，而是为市场从事建筑……以前，一个建筑业主为了投机，也许同时建筑三四栋房屋；现在，他却必须购买大块地皮……在上面建筑一二百栋房屋，因此他经营的企业，竟超出他本人财产的 20 倍到 50 倍。这笔基金用抵押的办法借来；钱会按照各栋房屋建筑的进度，拨给建筑业主。一旦发生危机，分期垫款就会停止支付，整个事业通常就会停顿；最好的情况，是房屋停建，等情况好转再建；最坏的情况，就是半价拍卖了事。^{[6]261}

举办劳动期间相当长而规模又很大的事业，只有在资本积聚已经十分显著，另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又为资本家提供方便的手段，使他可以不用自己的资本而用别人的资本来预付、来冒险的时候。

问题在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散或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中，也就是，资本的积聚已达到什么程度。信用会引起、加速和扩大资本在个人手中的积聚，就这一点来说，它会促使劳动期间从而周转时间缩短。^{[6]262}

在 YouTube 上搜索标题“九十小时内在中国建一座十五层的宾馆”就可以看到它。现在又有一个标题为“十五天内在中国建造一幢三十层高楼”的视频。当然，在这两个例子中，零部件是预制的，但是观察和思考劳动过程的性质也是十分有趣的。重点不仅在于协作、机械化以及对分工的协调，也在于劳动强度，这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逐渐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一个主要贡献者。当然，工人仅仅获得九十小时（轮班工作）的工资。

直白地说，将生产时间缩短到技术上可能达到的最小程度的动机，是十分强烈的。马克思因此引用了炼钢史上的进步，“炼钢法由 1780 年前后发现的搅拌炼钢法，变为现代贝氏炼钢法和以后采用的各种最新方法”。虽然“生产时间大大缩短了，不过固定资本的投资也相应地增加了”^{[6]267}——再一次强调了减速和加速之间的潜在矛盾。

非常不幸，到目前为止，空间的生产、空间关系以及地域形式（“位置”）的问题，在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不是被极大地忽视了，就是被视作显而易见从而是不值得研究的问题。

所以，流通时间只有从它是利用劳动时间方面的自然限制这一点来说，才决定价值。……可见，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程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过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更多地消灭空间。^{[3]33}（Big Big Note）

在运输工具发展的同时，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4]278}

交通运输工具的创新和投资持久地变革着资本所创造的地理景观。空间—经济的相对空间在不停地变换。在资本家竞争的整体景观里，由于相对区位优势的改变，整个城市的资本主义活动都将走向衰落。大量固定资本的价值都被嵌入到了土地上，随着其他地方那些激励资本活动的新的通讯线路和运输设施的建设，它们的价值要么得到增强，要么将受到威胁。马克思没有详细考察这个问题，但这些固定资本资产价值所面临的价值重估或贬值的永久威胁，是资本主义历史中不稳定性的重要来源：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由于历时已久的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彻底转变了方向，随着生产大规模地、主要但不是唯一地向东亚转移，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许多核心地带——诸如底特律、巴尔的摩、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埃森、里尔及其他老牌制造业城市——经历了极其艰难的去工业化过程。国内的地理转移——从美国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到南部和西南部——在制造不稳定和不均衡的资本主义地理发展方面，与国际转移同样重要。（Big Big Note）

首先是运输工具的运行次数有或大或小的增加，例如，一方面，一条铁路的列车次数，随着生产地点生产的增加，随着它变为较大的生产中心而增加，而且这种增加，是面向现有的销售市场，也就是面向大生产中心、人口中心、输出港等等的。另一方面，这种交通特别便利的情况以及由此而加速的资本周转（就资本周转取决于流通时间来说），反过来既使生产中心又使它的销售地点加速集中。随着大量人口和资本在一定的地点这样加速集中，大量资本也就集中在少数人手里。^{[4]278}

马克思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一个我们地理学者称之为**相对空间关系**的理论。这一空间的确定不是根据物理距离，而是**根据距离间的摩擦力，这个距离间的摩擦力用穿过物理空间所需的变化着的费用和时间来衡量**。物理空间本身与资本并无关系。资本所关心的是运动的费用和时间，它会尽其所能地寻求费用和时间的最小化，并且减少运动的空间障碍。为此，必须不断地从根本上变革空间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用时间消灭空间”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减少空间障碍和距离摩擦力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创新的历史令人叹为观止。但是**障碍不仅是物质的：它们同时也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减少资本运动（不一定是人的运动）的关税壁垒及其他政治障碍已经成为国际资本主义新秩序（一个充满矛盾并频繁成为政治冲突和社会斗争的焦点的过程）的“圣杯”的一部分**。但是很难想象，如果 20 世纪 50 年代左右欧洲的贸易壁垒没有被逐步打破，资本积累会受多大的抑制。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整个欧洲滞留在边境海关检查点的卡车长队已经让人无法容忍。（Big Note）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会缩短一定量商品的流通时间，那么反过来说，这种进步以及由于交通运输工具发展而提供的可能性，又引起了开拓越来越远的市场，简言之，开拓世界市场的必要性。运输中的并且是运往远地的商品会大大增长，因而，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处在商品资本阶段、处在流通时间内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也会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4]279}

经济学家总爱忘记，企业所需资本的一部分不仅不断交替地通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种形式，而且这一资本的各个部分不断地同时具有这三种形式，尽管这些部分的相对量是不断变化的。^{[4]284}（Big Note）

但马克思的发现中的“奇怪”之处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反驳李嘉图的观点，马克思有时不得不将自己的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与一个事实相协调，即周转时间不同将导致年剥削率的明显不同，而且缩短周转时间确实能够提高年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的答案是，必须区分预付资本和所用资本。

预付可变资本，只是在它被实际使用时，在它被实际使用的时间内，才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而在它没有被使用，仅仅被预付，充当储备的时间内，不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但是，一切会使预付的可变资本和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发生变化的情况，总起来说，

就是周转期间的差别。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是：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执行职能的等量可变资本生产等量的剩余价值。^{[4]332}

$$M' = m'n$$

这里，我们发现了个别资本家下述行为的一个额外动机：进一步**用时间消灭空间**；在商业策略中积极追求时空压缩。因为一旦成功缩短了劳动期间和（或）流通时间（例如，通过寻找让自己的商品更快推向市场的方式），他的预付资本就能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即便所用资本的利润不变），只要新的生产和流通策略的相关成本不会抵消掉他们更高的利润率。

但还有一种间接的方式能够解决流通和周转时间的问题，即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的发展，这是本章的伏线。

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存在大量的、随时可得的过剩货币资本，以支持生产活动的连续性。他多少附带性地提到，正是这一点使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对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来说非常必要。

在第一个周转期结束时收回的五百英镑已经由工人生产出来。所以，资本家为第二期的可变资本预付的五百英镑，事实上是工人自己生产的产品的等价物。

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4]349}（Big Note）

直到此时，共产主义的观念主要局限于联合劳动者为了社会的目的而自由地控制和组织自己的劳动。但这里隐约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协调问题——长期中发展生产力和扩大基础设施将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提供直接好处。

它提出了一些问题，“社会”可能怎样合理地协调和“计算”总劳动分工，同时怎样在缺乏市场信号的情况下，以鼓励而不是阻碍联合劳动者自由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的方式来管理长期发展计划。这里的分析在《资本论》中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地表明，在共产主义事业的核心有一个核心矛盾。只有当建立在严格的私人财产基础上的规训机制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个别资本家的自由和解放才成为可能。同样的道理，共产主义也必须在一个估计、协调、计算的总体框架下，找到一条重新定义和保护联合劳动者的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这个总体框架限制并规训必要的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的生产，使它们能增加人类解放的前景。（Big Big Note）

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一方面，货币市场受到压力，反过来，货币市场的缓和又造成大批这样的

企业的产生，也就是造成那些后来对货币市场产生压力的条件。货币市场受到压力，是因为在这里不断需要大规模地长期预付货币资本。这里完全撇开不说产业家和商人会把他们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投入铁路投机事业等等，并通过在货币市场上借贷来补偿这种货币资本。

（这个过程给第三卷中分析的金融资本和信用制度一切“颠倒错乱的形式”和“疯狂的”行为提供了技术基础：）

另一方面，社会的可供支配的生产资本受到压力。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地从市场上被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替它们的只是货币等价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会增加，而这种需求本身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的价格都会上涨。此外，这个时候，通常是欺诈盛行，资本会发生大规模转移。**投机家、承包人、工程师、律师等一伙人，会发财致富。**他们引起市场上强烈的消费需求，同时工资也会提高。至于食品，那么，农业当然也会因此受到刺激。但是，因为这些食品不能在一年内突然增多，所以它们的输入，像一般外国食品（咖啡、砂糖、葡萄酒）和奢侈品的输入一样，将会增加。因此，**在进口业的这个部分，就会发生输入过剩和投机。**另一方面，**在那些生产可以急剧增长的产业部门（真正的制造业、采矿业等等），由于价格的提高，会发生突然的扩大，随即发生崩溃。**这同样会影响到劳动市场，以致把大量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甚至已经就业的工人，吸引到新的产业部门中去。一般说来，像铁路建设那样大规模的企业，会从劳动市场上取走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来源仅仅是某些只使用壮工的部门（如农业等等）。甚至在新企业已经成为稳定的生产部门以后，从而，在它所需要的流动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以后，这种现象还会发生。例如，在铁路建设的规模突然比平均规模大时，情况就是这样。工人后备军一寸主种后备军的压力使工资保持较低的水平——有一部分被吸收了。现在工资普遍上涨，甚至劳动市场上就业情况一直不错的部分也是这样。这个现象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溃再把工人后备军游离出来，再把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压低到这个限度以下。（Big Big Note）^{[4]349}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还有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从来没有能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Big Big Note: 消费不足危机论）^{[4]350}

然而，棉纱可能在印度再赊卖出去。以此在印度赊购产品，作为回头货运回英国，或把一张金额相当的汇票汇回英国。只要这种状态延续下去，就会对印度的货币市场造成一种压力，而对英国的反作用可能在英国引起一次危机。这种危机，即使在它伴随着向印度输出贵金属的情况下，也会在印度引起一次新的危机，因为曾经从印度的银行取得贷款的英国商行和它们的印度分会陷于破产。因此，**出现贸易逆差的市场和出现贸易顺差**

的市场会同时发生危机。这种现象还可以更加复杂化。例如，英国把银块送往印度，但是，印度的英国债权人现在会在印度索债，于是印度随后不久又要把它银块送回英国。

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差额，看起来是平衡的，或者只是显出偏向这方或那方的微小的摆动。但是，危机一旦在英国爆发，就可以看到没有卖出去的棉纺织品堆积在印度（就是商品资本没有转化为货币资本，从这方面说，也就是生产过剩）J 另一方面，在英国，不仅堆积着没有卖出去的印度产品的存货，而且大部分已经卖出、已经消费的存货还丝毫没有得到货款。因此，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4]352}（Big Note: 顺差、逆差、平衡均可爆发危机）

论第二卷第 17 章：剩余价值的流通。本章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而在于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作为卓越的货币商品，金的生产能否提供实现剩余价值所需要的额外货币？如果不能（很明显马克思拒绝了这种可能性，尽管他并不否认金生产者的独特作用），我们就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有效需求从何而来，以实现不断被抛向市场的剩余价值？**（Big Big Note）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信用制度也同时发展起来。资本家还不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使用的货币资本，会被别人使用，而他从别人那里得到利息。对他来说，这种货币资本是作为特殊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就是作为一种与生产资本不同的资本执行着职能。但是它在别人手里却作为资本起作用。很明显，当剩余价值的实现更加频繁，剩余价值生产的规模更加扩大时，新的货币资本即作为资本的货币投入货币市场的比例也会增加，其中至少有一大部分会重新被吸收来扩大生产。^{[4]356}

让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的结构。纵观《资本论》，马克思假定（至少在分析关于货币资本和金融的章节之前）供给和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不同，不仅供求不均衡，而且资本家使出浑身解数来扩大供求之间的缺口。简单地说，**资本家的需求是生产资料（c）和劳动力（v），但他提供给市场的商品价值是 $c + v + s$ ，从而商品价值的供给系统性地超过了需求。**此外，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的欲望则把这种不一致推向了极限。对剩余价值的额外有效需求从何而来？如果剩余价值不能实现，资本流通就会停止。

在我们又面临这样的情况，必须分清接下来到底是马克思的一般答案，还是政治经济学家的“似是而非的遁辞”的一般答案：“当一个 $x \times 1000$ 镑的商品量要流通时，不论这个商品量的价值是否包含剩余价值，不论这个商品量是否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这个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决不会因此有所改变。**可见，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如果这里存在什么问题，那么，它和总的问题是一致的，一个国家的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额从何而来？”问题于是被简化为调节一个国家的货币供给，使之足以满足所有商品交换需要的层次。我认为马克思的意思是说，这种观点是一种最厉害、最似是而非的遁辞：它等同于马克思在第一卷中严厉地斥为“幼稚的胡言乱语”的萨伊定律。（Big Big Note）

不过，除此以外，资本家就不再是处在流通中的货币量的起点了。可是，现在只有两个起点：资本家和工人。所有第三种人，或者是为这两个阶级服务，从他们那里得到货币作为报酬，或者是不为他们服务，而在地租、利息等形式上成为剩余价值的共有者。^{[4]368}

至于扩大再生产的情况，马克思没能找到一条明显的研究路径，这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必须投资于生产性消费（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增加），**从而削弱了资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如果资本家不得不放弃个人消费以进行更多的生产性消费，那么他就必须得再次深入挖掘自己的货币储备，否则就不可能清除掉已经生产出的多余的剩余价值。**认为这种储备是无底洞的想法显然是荒谬的。扩大的总需求的来源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但马克思做的还不够。**

我能找到的最明确的答案是资本家通过**先买（从而实现剩余价值）后付（剩余价值已经货币化后）**这个简单和长期存在的做法解决困难。换句话说，他们用**债务支撑扩张**。这涉及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在整个第二卷不愿意（尽管他承认了它的绝对必要性）从事这个研究。这可能就是解决方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在第三卷对货币市场、金融资本和信用制度的作用的探究中已经作出了暗示。把这一观点推向极致，这个论点表明，**通过剩余价值生产进行的资本积累必定与市场上实现剩余价值的债务积累同步进行。**（Big Big Note）

马克思近乎暂时性地承认了这一点。一部分剩余价值被投资于生产扩张，这就减少了可利用的作为收入来流通常用于产品实现的数量。这样就生产出了追加的剩余价值。“这里又出现了和上面一样的问题。用以实现现在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追加剩余价值的追加货币从何而来？”^{[4]381} 马克思和以前一样，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的许多解决方案，它们试图通过对货币流通的考察来解决问题，最终都诉诸金生产者的活动。除了求助于信用的方案外，马克思对所有解决方案都心存怀疑，尽管它们至少有一些技术上的可能性：“只要那些和信用制度一起发展的辅助工具发生这种作用，它们就会直接增加资本主义的财富……这样也就解决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生产按它现在的规模，没有信用制度，只有金属流通，能否存在。显然，不能存在。**相反，它会受到贵金属生产的规模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信用制度在它提供货币资本或使货币资本发生作用时所具有的生产力，也不应该有任何神秘的观念。”不幸和令人沮丧的是，他补充道：“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不属于这里的范围。”^{[4]383} （Big Big Note）

前面已经指出，必须有作为“流通基金”来发挥作用的“货币基金”，它不同于扩大再生产需要的“潜在的货币资本”。马克思考虑了潜在的货币资本可能存在于哪里，他认为有银行存款、公债券和股票。但是用于实现剩余价值的流通基金在哪里呢？当货币不得被用于这个目的，甚至为此而进行贮藏时会发生什么？不幸的是，马克思没有给出答案。

第十二章 资本的再生产（第二卷第 18—20 章）

在第二卷的第三篇中，马克思设想了一个分成两大部类的经济。第一部类为其他资本家生产生产资料（原材料、半成品、机器和包括生产的建成环境在内的其他固定资本项目）。第二部类生产供工人和资本家个人消费的消费资料（也包括消费的建成环境）。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必须从第一部类购买其生产资料。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必须从第二部类购买其消费资料。这种经济要想平稳运行，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就要互相平衡。在简单再生产（没有扩张）的情形下，流向第二部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必须与流向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的价值相等。

用代数形式，这可以表达为：

第一部类 $c_1 + v_1 + m_1 = w_1$ （生产资料的总价值）

第二部类 $c_2 + v_2 + m_2 = w_2$ （消费资料的总价值）

生产资料的总需求是 $c_1 + c_2$ 。消费资料的总需求是 $v_1 + v_2 + m_1 + m_2$ 。如果我们假定，需求和供给是均衡的，那么 $W_2 = c_2 + v_2 + m_2 = v_1 + v_2 + m_1 + m_2$

在等式两边消去同类项后，得到 $c_2 = v_1 + m_1$

如果这个能够确保连续、平衡的再生产的必要的价值比例能够实现，那么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必须等于第一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说，“在简单再生产中，第一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 $v+m$ 价值额（也就是第一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与此相应的比例部分），必须等于不变资本……也就是第二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分出来的与此相应的部分。”^{[4]446}

马克思所设计的图式包含了**各类假设**——只有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在第 17 章中简略陈述过）；只有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的两个部门（尽管在某些时候他确实又将消费资料分成必需品和奢侈品）；需求与供给是均衡的；所有产品的周转时间都是一年；没有技术变革；所有产品按其价值进行交换——这还只是提到的一些主要的假设。尽管马克思最初承认，他应该“既在价值又在物质”（使用价值）形式上考察再生产过程，但事实上他仅仅在价值形式上解决了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因此要假设再生产物质上的数量需求会自动得到满足。从这些假设中会引出很多问题，而放松这些假设会引起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Big Big Note）

在这些图式中，应该要注意，工人的消费占有“在比例上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因此如果这个图式有一点政治指向性的话，那就是稳定工人收入的必要性，这是为了协调生产资料的总产出和对消费资料的总需求之间的关系。这与第一卷中的发现相矛盾，在那里马克思把工人阶级日渐加剧的贫困化视作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但是，因为第二卷并没有与“一般规律”等价的一章，马克思仅仅是暗示了这个矛盾。（Big Note）

相反地，我们需要想象一下，第二卷中与“一般规律”那章等价的章节，可能是什么样呢？例如，为了使市场上价值实现的条件保持稳定，在很多地方，会有数量庞大的工人日益被卷入到无止境的、越来越盲目的消费主义浪潮中去吗？再者，考虑到他们痴迷于诱人的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的程度，这些工人是如何对社会主义革命失去兴趣的？反消费主义（这类运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时候在许多地区确实很活跃，而且它如今是很多环境政治学的核心）在革命运动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呢？当然，很难想象，马克思竟然会写下这么一章，并且对于多数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想法几乎肯定会被谴责为具有诽谤性。（Big Note）

但是，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很有趣的一点是，它们决不拒绝这些可能性（举个例子，这几乎就是罗莎·卢森堡对它们的内容感到如此失望的原因）。并且，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70% 的经济活动，都是由消费主义驱动的（相反中国只占一半，可能更接近于马克思所处的年代盛行的情况），而且许多所谓的“富裕的”工人，确实深深地醉心于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和所有明显的缺陷）的消费主义之中。因此，在这里我们手头就有些工具可以用来分析这一类政治经济形势。显然，这与第一卷第 25 章中**工人日益贫困化的论点**之间的矛盾，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然而，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它是严重的和棘手的，就避开这个矛盾。

但是，确实存在巧妙处理这个核心矛盾的方法。马克思在某些地方提到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存在。在当代条件下，那个阶级的主要作用是作为消费的中坚分子，并且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运行提供广泛的政治支持。

马尔萨斯首先指出了这个社会阶层在提供必要的有效需求方面的重要性（尽管他观念中的消费者阶级更纯粹地是贵族化和寄生性的，现在不具有政治可行性——除了海湾各国中）。由于我们早已接受了这个观点——一个主要充当经理层、管理层和服务角色，有着稳定且足够工资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可以认为，我们目前遇到的矛盾源自马克思的两阶级模型的假定，而不是任何现实情况。三个阶级情况下的矛盾可能表现为第一卷中设想的对更低下的工人阶级（例如，在中国）的工资压制，以及第二卷中设想的，收入向中产阶级（包含富裕的工人阶层和非生产阶级）消费者（例如，在美国一些工人拥有房屋所有权，且实现了郊区化的生活方式）的流动，它足够提供必要的有效需求。当然，在马克思的图式下，中产阶级的收入最终都必须来自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尽管在现代情况下，这毫无疑问会由**以债务驱动为基础**的国家在消费基金上的支出和促进**中产阶级消费主义（尤其是与住房需求有关的）的信用扩张**来补充。有意思的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北美和欧洲很多地区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是岌岌可危的——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过度负债——并且这与对支撑经济的有效总需求不足的大声哀叹有着直接联系。通过中国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形成而可能实现的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作为一种补偿运动被抱以厚望。现在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很强的内外压力，采取积极措施来刺激国内市场。我们也能听到一些贸易盈余国家中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的要求，例如德国，要求放松工资压制的倾向（第一卷中的）并且刺激消费（第二卷中的）以帮助总体经济增长（迄今为止德国拒绝了这样的要求）。我发现，倘若我们能够灵活地、广泛地加以利用，那么在再生产图式的一般框架内考虑当前的形势是很有用的。（Big Big Note）

与第一卷相比，第二卷还有其他显著的差异。在第一卷中，与技术细节相比，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以及发现自己陷入了无止境积累（“为积累而积累”）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更感兴趣。与“怎样”相比，他对“为什么”更感兴趣。而在第二卷，对于“为什么”的关注基本上消失了。相反，他建立了资本是怎样永远地进行积累的技术模型。读这几章的时候，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尽管很少提到它，始终是核心问题。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瓦西里·里昂惕夫是一名俄国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先是去了德国，后来又到了美国。他为了创立后来广为人知的“投入产出分析”，详细研究了马克思的模型。图 6 举出了一个典型的里昂惕夫矩阵。使用这样一个投入—产出矩阵，对于一个给定的产业（例如钢铁业），可以估计提高产出水平需要多少额外的投入（例如煤炭、能源和铁矿石），还能反复地追溯增加煤炭生产所需的额外投入（例如，额外的机器和这些机器所需的额外的钢铁）。它成为中央计划的一个重要工具。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和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对投资和劳动的合理的社会配置是公共政策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尽管使用这种技术进行的中央计划的名声并不太好，但在公司内部，我们正在使用其更精确的版本以确定复杂的生产体系中的最佳效率。

后来的研究从不同方向对这个图式的技术特性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且极大地提高了描述的数学复杂性。这些阐述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深了马克思留下的奥秘。例如，安德鲁·特里格最近的一项研究说明，“如果不能清楚地说明再生产图式的目的，那么对它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它们如何同第二卷的剩余部分联系起来，以及它们如何同整个《资本论》联系起来，就不能达成一致”。总之，用马克思自己的术语解释马克思，在这个情形中近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总括起来成为社会资本的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也就是说，就社会资本的总体来考察的循环，不仅包括资本的流通，而且也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后者本来只能由两部分构成：1. 资本本身的循环；2. 进入个人消费的商品的循环，也就是工人用工资，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或其中的一部分）购买的那些商品的循环。^{[4]390}

当你处理总体经济的问题时，千万不要认为可用的货币数量会有一个界限。由于现在货币已经失去了其金属基础，它能够由中央银行无限制地创造出来。非常引人瞩目的是，美联储可以宣布在任何它喜欢的时候将一万亿美元注入经济中。尽管事实上这可能存在一些政治上的限制（导致金融萧条），它们总是可以被绕过的。（Big Big Note）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要求为较长的时间预付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界限。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连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4]396}（Big Note: 长期投资的严重问题，麻烦在于，这种投资在再生产图式中基本都被假定为不存在的。）

在社会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在社会的生产中，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一样，在劳动期间较短的生产部门，工人将照旧只在较短时间内取走产品而不提供产品；在劳动期间长的生产部门，则在提供产品之前，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取走产品。因此，这种情况是由各该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不是由这个过程的社会形式造成的。在社会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4]396-397}（Note）

威廉·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取代了盖仑统治了几个世纪的理论。在盖仑的理论中，心脏是血液生产的中心，血液从心脏流到各个器官，然后被耗尽。这是一个从生产流向消费的单方向模型。与之相比，威廉·哈维把心脏看作是使血液在全身持续循环的一个泵，血液通过与外部资源物质进行的代谢转化得到补充和净化。魁奈将哈维的概念应用到了政治经济学中，因此马克思——带着对流动性、持续性以及价值流通的强烈关注——明显被魁奈的思考方式吸引住了。

魁奈坚持认为只有农业部门才生产价值，工业生产是寄生于农业的。魁奈不敢批评凡尔赛的挥霍性消费或贵族的消费主义，因此他假称，农民和拥有土地的贵族都从事价值生产，从而掩饰了对农民榨取的剩余价值。这个“重农主义的”（主要在法国）观点与“重商主义”（当时主要在英国）形成了对比，后者将通过贸易积累金储备看作是经济政策的圣杯。

马克思反对这两个学派的思想。但是，考虑到当时法国所盛行的产业结构，魁奈的重农主义见解似乎有一些合理性，因为从农业中榨取的剩余价值，支持了主要为贵族消费（可以去参观一下魁奈生活的凡尔赛，看看那个时代所谓的工业通常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奢侈品（珠宝、高档衣服、陶器、地毯，等等）的手工业的产业结构（与马克思看到的工厂完全不同）。

在盖仑的理论中，治疗通常都是流血类的（理解为：紧缩），或者后面会伴随着输血（理解为：世界各地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和流动性释放），这两者从马克思的理论观点来看，都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理论中面临危机时的稳定政策，要求分析资本流动的持续性遇到的主要阻碍和障碍；同时采取措施解决所有障碍，努力使经济体系回到再生产图式所展示的也许可能的那种均衡——我强调了“也许”，因为这绝不是一个必然。（Big Big Note）

年产品既包括补偿资本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即社会再生产，也包括归入消费基金的、由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就是说，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这

种消费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即维持），因而也包括总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再生产。^{[4]435}

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为总资本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4]437-438}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难点。在再生产过程中，不仅价值要得到补偿，使用价值也要得到替换。例如，如果要进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的话，进入到劳动力的价值的特定使用价值必须以恰当的数量生产出来。生产消费需要的特定的使用价值，也需要再生产出来。必须假定这些物质要求与价值关系的必要再生产是相称的。但是，这并不会自动实现。在一个典型的里昂惕夫投入产出体系的模型中，生产用于制造汽车引擎的钢铁所需的铁矿石和煤炭的数量，都可以在一个投入产出矩阵中模型化为一个物质过程。这个模型是物质模型，是建立在使用价值基础上的。伴随这些使用价值关系的资金流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可能会平稳运行，另一个可能就不会。我们以哪个为基础呢？马克思似乎两者都想选择。然而，接下来，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使用价值和物质模型，要么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要么被假定为会毫无疑问地塑造价格和货币、价值流动。我们所得到的，在以使用价值初步定义了生产部类间的一个宽泛的划分之后，是一个反映了使用价值的差异和要求的社会总资本运动的纯粹的价值（货币）分析。价值和货币分析与物质上的使用价值流动之间的潜在矛盾，并没有得到考察。

考虑到马克思的习惯——在《资本论》的开头就强调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对这个矛盾的掩盖暗示了这里是产生危机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应该寻找**再生产图式内的崩溃的地方**。事实上，这个分裂引起了从物质和使用价值方面解释再生产图式的学者（一般指新李嘉图学派，包括皮耶罗·斯拉法）与从货币方面进行考察的学者（与凯恩斯主义者类似）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要想合理地将这些图式用于社会协调，首先要废除货币资本的作用，这暗示了图式中的基本矛盾就出现在这里——而从货币流动的立场而言，固定资本形成的物质要求也阻碍了事物的平稳性和持续性这个事实，也暗示了一种源于与货币运动相关的物质方面的矛盾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我猜测，马克思可能会将新李嘉图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后来在理解这个图式上的分裂，看作是将资本的**内部矛盾在思想领域内外部化的经典案例**。当然，这些在文中都没有任何暗示。

这种互相交换是通过货币流通来完成的。货币流通成为交换的中介，同时也使这种交换难于理解，然而它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可变资本部分必须一再表现为货币形式，即表现为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劳动力的货币资本，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同时进行经营的一切生产部门，不论他们属于第一部类还是第二部类，可变资本都必须以货币形式来预付。^{[4]442-443}

很明显，“奢侈品生产中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挥霍，取决于这个阶级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奢侈品”。但是，这对于经济形势是很敏感的。危机暂时减少了奢侈品消费，这会随之减少可变资本的花费——而这又反过来减少了对非奢侈品消费资料的一般需求。“在繁荣时期，特别是在欺诈盛行期间，情况正好相反”，这时充分就业的工人阶级得到了更高的工资，事实上可能会购买少量的奢侈品。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需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4]456-457}（Big Big Note）

乍一看，似乎很难调和这个叙述与第 350 页的脚注，那里是这样描述的，“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事实上，马克思所说的“同义反复”并没有否认有效需求的重要性，而只是强调，唯一起作用的需求是有支付能力支持的需求。这再一次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在不考虑对使用价值的真实需求的情况下，货币（交换价值）是如何流通的。（Big Big Note）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收入在危机之前会上升，我认为这个观点从经验上来看并不正确。尽管 20 世纪 70 年代的危机是这个情况，但很难说 2007—2008 年爆发的危机符合这个观点。因此我建议修改马克思认为有效需求与资本真正的内在矛盾无关的一般叙述，而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是那些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许多人当然会不同意。

土地所有者（地租的承担者）、高利贷者（利息的承担者）等等，同时还有政府和它的官吏，食利者等等。这些家伙在产业资本家面前是作为买者出现的，而他们作为买者使产业资本家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他们各自也把“货币”投入流通，产业资本家则从他们手中得到这些货币。这时，人们总是忘记，他们最初得到并不断地重新得到的货币的来源是什么。（这个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最终必须来源于生产。但是，在我看来，它是来源于过去，还是预期来源于未来（例如，通过债务创造），似乎是一个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阐述的重要区别）。^{[4]470}

如果生产是社会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一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类，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的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4]473}（当然，这些就是里昂惕夫后来在其模型中所构建的投入产出关系。）

劳动力只是劳动者的财产（它将不断自行更新，自行再生产），而不是他的资本。劳动力是他为了生存而能够不断出卖和必须不断出卖的唯一商品，它只有到了买者即资本家手中，才作为资本（可变资本）起作用。^{[4]491}

第 XII 节：货币材料的再生产

既然归根结底必须把资本家阶级本身看做是投入流通的全部货币的源泉，每个资本家怎么能够从年产品中取出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他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怎么能够比他工人的货币多呢？

1. 这里唯一必要的前提是：总要有足够的货币使年再生产量的不同要素进行交换。这个前提不会因为一部分商品价值由剩余价值构成而受影响。假如全部生产归工人自己所有，从而他们的剩余劳动只是为自己的而不是为资本家的剩余劳动，那么，流通的商品价值量也还是那么多，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个商品价值量的流通所需的货币量也还是那么多。所以，在这两个场合，**问题只是：这全部商品价值借以进行交换的货币从何而来？——而绝不是：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

每一个开办新企业的资本家，在营业开始以后，都能把他为维持生活而用于消费资料的货币再捞回来，作为使他的剩余价值货币化的货币。但是一般说来，全部困难有下面两个来源：

第一，如果我们只考察资本的流通和周转，从而把资本家也只是看做资本的人格化，不是看做资本主义的消费者和享受者，那么，我们固然看见他不断把剩余价值作为他的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投入流通，但从来看不见有货币作为收入的形式存在于他的手中，从来看不见他为了剩余价值的消费而把货币投入流通。

第二，如果资本家阶级以收入的形态把一定货币额投入流通，那就好像他们为全部年产品的这一部分支付了一个等价物，因此，这一部分就好像不再代表剩余价值了。但是，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不需要资本家阶级花费分文。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白白地占有和享受了这些剩余产品，而货币流通也不能使这件事有所改变。

2. 每一个产业资本在开始的时候，都把用来购买全部固定资本组成部分的货币一次投入流通，但只是在若干年内逐渐通过出售其年产品再把它收回。所以，它最初投入流通的货币多于它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总资本每一次要用实物更新时，这种现象都重复发生。

3. 当其他资本家（撇开固定资本的支出不说）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他们为购买劳动力和流动要素而投入流通的货币时，生产金银的资本家（撇开作为原料使用的贵金属不

说)只是把货币投入流通,而只从流通中取出商品。不变资本(损耗部分除外)、大部分可变资本和全部剩余价值(资本家自己手中积累的贮藏货币除外),都作为货币投入了流通。

4. 一方面,固然有不是在当年生产的各种东西如地皮、房屋等等,其次,还有生产期间不止一年的各种产品如牲畜、木材、葡萄酒等等,都作为商品来流通。对于这种现象和其他现象,重要的是掌握住一点:除了直接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额外,总有一定量货币处于潜在的、不执行职能的状态,一旦遇到某种推动就可以执行职能。这类产品的价值,往往也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流通的,如同房屋的价值是在若干年内以租金的形式来流通的一样。^[4]⁵³¹⁻⁵³⁶

第十三章 固定资本问题和扩大再生产（第二卷第 20—21 章）

诚然，在第一个场合（需用实物更新的固定资本比例大于只是需要补充损耗的固定资本比例），同一劳动可以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量或增加劳动强度提供更多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弥补第一个场合的不足；但是发生这种变化的时候，总不免会有劳动和资本从第 I 部类的某个生产部门移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并且，每一次这样的移动，都会引起**暂时的紊乱**。其次，第 I 部类（由于增加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不得不用较多的价值来交换第 II 部类的较少的价值，因而第 I 部类的产品就要跌价。

在第二个场合则相反，第 I 部类必须压缩自己的生产，这对该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来说，意味着危机；或者第 I 部类提供的产品过剩，这对他们来说，又是危机。**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它却是祸害。**（Big Note）

对外贸易既然不是单纯补偿各种要素（按价值说也是这样），它就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

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问题就归结如下：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里是指在消费资料生产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资料年生产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辅助材料的数量不会因此而减少；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要素。^{[4]525-526}

简而言之，比例失调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也难以确定。但马克思显然断定即使两大部类间的交换正常进行，危机也会发生。

对此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固定资本流通造成的中断证实了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再生产过程都无法顺利地进行，因此比例失调的危机自始至终既是普遍的又是无法避免的。第二种解释则认为这种危机只是源自固定资本的流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固定资本流通的社会化就可以避免这一危机。固定资本流通的社会化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国家供给或干预

到更为激进的社会计划的形式，包括共产主义下去商品化的固定资本投资。但马克思并未排除，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在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帮助下，也许资本家自己就能克服困难。后一种解决方案的问题（如我们在第三卷中看到的）是它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引发了以与固定资本流通相关的货币运动为中心的投机性的繁荣和崩溃。尽管固定资本的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另一个更为严重的自发的金融危机问题又出现了。我们进一步考察这种情况。（Big Note）

但事实上，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再生产也并非一定是无政府状态的。许多长期固定资本投资都是由国家承担的，因此存在合理的社会规划和设计的可能性。联合资本（股份公司）的形成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辟了新的、或多或少有些无政府主义的协调模式（其不利方面是建成环境投资上的投机性繁荣，而其有利方面则是共同生产集体的生产和消费资料）。（Note）

扩大对外贸易和建立世界市场或许能够暂时地缓和危机，但最终他们只是将资本的矛盾转移到更为广阔的地理范围内罢了。（Big Note）

“扩大的再生产”必须在商品形式下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货币本身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要素”，^{[4]551} 因为如果没有可用的剩余商品，储蓄的货币也就没有用了。

贮藏（储蓄）的货币本身并不构成新的财富，但是它确实创造了“新的潜在货币资本”。但是，如果每个人都预期未来的扩张而进行贮藏，那现在这里就没有人会购买商品了，于是流通过程就中断了。滞销商品阻断了这一体系。只有在金的生产中，在金产品包含剩余产品，即剩余价值的承担者的时候，新的财富（可能的货币）才会被创造出来。

价值（包括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中的“实际平衡”要求“互相交换的商品具有同等的价值额”。

（上述平衡要求买卖的价值额互相抵消）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这个事实，已经包含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不仅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且也起货币资本的作用。同时又会产生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4]557}（Big Note）

（第一部类 Ia 卖给 Ib 的工人的剩余价值）是用来生产 Ic 的生产资料，而不是用来生产 IIc 的生产资料的，是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而不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前提是第 I 部类的全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即用在第 II 部类的商品上，所以，它只不过是由那种以自己的实物形式重新补偿不变资本 IIc 的生产资料构成的。因此，为了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第 I 部类的生产要能够少为第 II 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而相应地多为第 I 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完成这种过渡往往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由于第 I 部类的有些产品可以作为生产资料在两个部类起作用这一事实，完成这种过渡就容易些。^{[4]559}

这的确是需要注意的：许多产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能源了，无论在哪个部类都能充当生产资料。但我认为这一论点的主旨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后果。**它支撑了在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即必须优先考虑扩大第 I 部类的产出，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牺牲消费品的生产。**其出发点是：发展重工业，投资于生产的固定资本和基础设施的固定资本，并限制个人消费。最后当利用生产资料生产生产资料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开始关注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这是许多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走过的典型路径。（Big Note）

然而，在后来的文本中，马克思拒绝了“积累是靠牺牲消费来进行的这种一般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不过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相互矛盾的一种幻想，因为这种幻想假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是消费，而不是剩余价值的攫取和资本化，即积累”。^{[4]566} 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唯一的宗旨和目标就是不断创造并巩固越来越大的剩余价值和增加资产阶级的财富、特权和权力。在这一生产方式中，集中投资于为了生产生产资料而进行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忽略消费的策略是十分合理的。**人民群众的消费状况与其直接利益无关。因此，在社会主义计划的实践中，这种由阶级强加的优先对第 I 部类进行投资的做法的继续存在应该受到质疑。**（Big Note）

已经在一个国家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包括并入生产资本的劳动力，即剩余产品的创造者）越多，劳动的生产力，从而生产资料生产迅速扩大的技术手段越发展，因而，剩余产品的量无论是在价值方面或是价值借以体现的使用价值量方面越大。^{[4]560}

（货币）是绝对非生产的，它在这个形式上虽然和生产过程平行进行，但却处在生产过程之外。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死荷重。渴望利用这种作为潜在货币资本贮藏起来的剩余价值来取得利润和收入的企图，在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标。货币资本由此又以另一个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进程和巨大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4]561}

首先要假定最简单最原始形式的金属流通，因为，这样一来，流出和流回，差额的抵消，总之，在信用制度内表现为有意识的调节过程的一切因素，才会表现为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而存在的东西，事物才会以自然形式，而不是以后来所反映的形式表现出来。^{[4]563-564}

考虑到我们所了解的信用制度作为“阶级共有资本”所发挥的作用，不难发现信用制度远不是危机的根源。信用制度不但是消除货币流通障碍的主要机制，而且是更一般的避免危机或解决危机的主要机制，即使“整个机制的人为性质”会增加“扰乱正常的进程的机会”。因此，马克思在这些段落中频繁提到信用和银行体系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它们的矛盾性质（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可能使马克思拒绝了任何将它们的作用纳入这里的系统性的尝试。考虑到马克思对作为“所有颠倒错乱形式之母”的信用制度的分析，我们将形成一个更清晰的观点：信用制度是怎样把我们从比例失调危机的煎锅中拯救出来，又把我们投入了金融和商业危机的烈火中的。

第 I 部类形成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所以从第 II 部类的观点来看，就是消费不足）；

第 II 部类的商品储备搁置起来，不能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所以在第 II 部类出现相对的生产过剩）；第 I 部类的货币资本过剩，第 II 部类的再生产不足。^{[4]566}（Big Note）

第 II 部类作为总体来看，如上所述，比第 I 部类还有一个优点：它是劳动力的买者，同时又是再向自己的工人出售商品的卖者。每一个工业国家都提供了十分明显的实例，证明可以怎样利用这个优点，可以怎样在名义上支付正常的工资，事实上却一部分用实物工资制，一部分用伪造通货的办法（也许还不受法律的处罚），把其中的一部分在不付相应的商品等价物的情况下再夺回来，换句话说，再偷回来。例如，在英国和美国就是这样。（关于这一点，要列举若干恰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但是，这种做法，正好是第 I 点所讲的同样的做法，只不过伪装了一下，而且是迂回曲折地进行的。因此，这种做法要和前一种做法一样被排除。这里讲的，是实际上支付的而不是名义上支付的工资。^{[4]573}

近期，通过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而对美国数百万人的房屋的欺诈性剥夺，是这一观点在当代最明显的例证。过去四十年左右我称之为掠夺式积累的全部政治活动也是如此。

增长过程产生了一个奇迹般的和谐：确实，增长和新的资本积累使得原本不平衡的地方变得和谐了。当然，马克思仔细地选择了他的数字和条件使这一结果能成立。但他因此也证明了和谐的资本积累的可能性（绝不是一种概率）。他使这一进程看起来好像能不断持续下去。

用代数术语说，第 I 部类的追加投资是 $C1 + \Delta C1 + V1 + \Delta V1 + M01$ （最后一项是指追加投资用于扩张后资本家阶级剩余的消费），第 II 部类是 $C2 + \Delta C2 + V2 + \Delta V2 + M02$ 。保持这一动力机制顺利进行的均衡交换条件是 $C2 + \Delta C2 = V1 + \Delta V1 + M01$ 。

最大的问题是要达到这样的均衡状态到底需要什么。即怎样才能使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保持正确的比例和比率，以至于不存在一个部类生产过剩而相对的另一个部类经历消费不足的情况。显然，这一图式是不切实际的，并且马克思编造了这些数字以符合他的例子。（Big Note）

当汽车产业在 1914 年引进五美元的八小时工作日后，亨利·福特派遣了一队社会工作者去教导工人如何审慎地和理性地消费。而所谓的“理性”是这样定义的——工人能为资本家生产的任何消费品“创造市场”。如何通过有组织的消费主义使消费的个别性理性化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讨论。

投资基金无法在两大部类之间流通，意味着没有实现部类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机制。由于这是与第三卷中考察的利润率下降相关的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这里就有一个明显的理论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交换是按价值（而不是根据生产价格，就像第三卷前几章陈述的那样）进行的，且假定所有东西都实行等价交换。尽管货币资本的介入经常干扰这一问题，但流通中的货币方面并未完全纳入分析。一切都以一年为周期进行周转，固定资本形成和流通中最严重的问题大部分都被假定没了。通过地租、利息、商业利润和赋税等占有和剥削剩余价值的其他形式被忽略掉了。

但以这种方式建模的目的并不一定是要重现现实（尽管这种成功的模型或许会为最终重现现实打下基础）。马克思也许会这么说：这样的建模是为了凸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

结构（这里指的是再生产）的核心关系——本质。那么这些图式揭示了什么呢？很简单，资本以货币、商品和生产资本三种循环的方式持续流动，通过这一持续流动的资本进行的资本积累的再生产注定是棘手的，因而具有危机的倾向，并且某种危机（由固定资本流动或更一般的比例失调引起的）或许只能以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金融体系中）造成问题更大的危机为代价来解决。我喜欢指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危机的趋势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被转移了。（Big Big Note）

马克思未能回答自己的问题：“用于购买剩余产品的有效需求来自哪里？”这一问题是马克思在第 17 章遇到的，并试图在第 20 章和 21 章解决。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似乎对于激发某种类型的凯恩斯主义思想和 1930 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发挥了隐含的作用。

在凯恩斯看来，要实现和谐的经济增长，政府（或者许多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如 IMF）必须实施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其他经济学家表明，只有通过一条技术和组织变革（生产率 c/v 的演进）的独特路径，才能保持合理的比例。然而，实际的技术变革路径并不必然与平衡增长的需要相适应。偏离了平衡增长的需要技术变革越多，比例失调的危机就越严重。（Big Big Note）

这些图式最早应用于苏联早期，那时一个叫费尔德曼的波兰经济学家为了制订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开始探索它们的功能。后来，马克思的图式被卡莱斯基（也是波兰人）和其他直接受凯恩斯理论影响的经济学家所借鉴，用以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内构建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和经济发展理论。埃弗塞·多马，广为人知的哈罗德—多马宏观经济增长模型的创始人之一，明确承认借用了马克思的图式。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所有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都借用了这一遗产。如果他们更认真地对待马克思的图式的话，传统经济学家将避免许多麻烦，并且（或许）大约在七十年前就能开始对宏观经济模型和公共政策计划的研究。

可以这么说，目前，我们更关注反资本主义方案中的“联合劳动”的方面而不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合理配置劳动力的问题。部分是因为后者与共产主义甚至社会民主国家——目前人们不再轻易相信（在我看来这么做是对的）这个制度——的统治和镇压有关，部分是因为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计划的经验总的来说不尽人意（尽管说它彻底失败了是错误的）。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其他地方说的那样，我们不能以这些特别的污点“为借口，来排除理论上的困难”。（Big Note）

第 II 部类必须依靠第 I 部类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这一切之所以出现既是因为马克思独断的选择，也是因为两大部类间的关系的不平衡性质，后者是第 I 部类相对第 II 部类更高水平的贮藏的不同影响造成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当然要彻底消除这些差异。这将完全有可能扭转两大部类的关系，使第 I 部类为第 II 部类服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目标是积累资本，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消费需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世界的目的将完全相反。

第十四章 反思

那么，我们能从建立了《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联系的“生产和实现的矛盾统一体”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第二卷说明的是，资本循环的连续性不断地受到产生于实现过程中的限制和界限的威胁。这些界限不同于那些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熟悉的、在劳动力市场上和生产领域内的界限。但是，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强调的，对实现过程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和界限，构成了一个对持续积累的动态的永久的威胁，并且频繁地引发重大危机。马克思甚至这样说道：“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5]393}

这些界限可以共同被看作是消费的界限以及“为积累而积累”规定的情况里的协调的界限。然而消费这样一个过于粗略的范畴本身难以涵盖所有涉及到的问题。首先，区分生产性消费（对原材料、能源、半成品和固定资本项目的消费）和最终消费（雇佣劳动者、资本家以及“非生产阶级”对消费资料和奢侈品的购买和消费）是至关重要的。为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对剩余价值进行的再投资行为，持续地扩大着生产性消费。但是，正如第二卷所说的，生产性消费产生了对用于生产每一个独特的商品的特定的使用价值的需求。……与此同时，新的需求和欲望（例如，最近的手机）的创造要求一个范围更广泛的商品投入，并且这些投入必须在资本需要它们时已处在准备好的状态。正如马克思在他对再生产图式的研究中所阐释的，虽然通过市场机制的供给，资本完成对所有这些需求的一种理性的协调不是不可能的，然而没有太多扰乱而完成均衡增长的可能性无疑是十分低的，这从而预示着比例失调（使用价值对一系列给定的生产过程的需求来说过多或过少了）的周期性危机。对均衡的波动性偏离是一回事，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而对均衡的单调的偏离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命题。

但是，不仅物质形态的使用价值的流动需要协调，货币（和价值）流动也需要与均衡增长的目标相一致。作为劳动的社会性的物质代表，货币与使用价值的性质毫不相关，货币量的流通必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保持均衡：不同劳动分工中的货币协调极易发生严重错误。正如马克思令人信服地指出的，这个问题不在于货币的总量可能相对不足，因为有许多能适应商品交换增加的货币机制（比如，对计算货币的使用）。问题在于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交换模式中，以不挫伤在每个交易点上实现利润的可能性的方式动员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当任何错误发生时——它必然会发生，我们很可能目睹生产过剩危机（就像马克思在第

二卷前四章中所阐述的)，其可能的表现形式是产生闲置的货币资本、闲置的生产能力和无法以可获利的价格售出的过剩的商品。结果是一场资本贬值的危机。危机会持续多久和影响多深，取决于各种实际情况。(Big Big Note)

然而，资本家之间围绕生产资料商品进行的复杂的交易，最终也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商品在最终消费领域的实现。

我们迄今为止所概述的都没考虑到周转时间差异的影响（劳动期间、生产时间、流通过间）。特别是，我们根本没有关注恼人的固定资本流通问题（和类似的拥有很长生命周期的固定项目，比如包括在消费基金中的房屋）。第二卷不遗余力地理论再现了这些流通过程如何运行并塑造了资本积累的时空而没有——这是关键——求助于信用体系。正如第一卷所提到的，结果是更大数量的货币资本贮藏在不起作用的非生产性状态。持有货币储备的必要性在于应对周转时间差异和周期性的固定资本更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越是错综复杂，就越需要贮藏货币。这种贮藏日益成为积累扩张的限制。这也使得创建一个适当的货币市场和成熟的信用体系愈发显得必要。结果是资本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存在的地点，这样“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独立（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5]397}

在关于货币和金融的章节中，有很多对马克思的思想彻底重建的迹象——尽管放到他全部著作的背景中，这更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对马克思最初思想的深度挖掘，而不是一种根本性的背离。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强调他对拜物教概念的重提和从这种拜物教概念到虚拟资本概念的转化的原因。马克思对货币资本的幻觉和幻象，对任何收入流资本化的幻想，以及对由此产生的过剩货币资本（IMF 通常称为流动性过剩）的无限积累的鞭辟入里的揭露，使他坚信：“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

马克思预想的大纲：

“一、（1）资本的一般概念。（2）资本的特殊性：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作为生活资料，作为原料，作为劳动工具。（3）资本作为货币。二、（1）资本的量。积累。（2）用自身计量的资本。利润。利息。资本的价值：即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的资本。（3）资本的流通。（ α ）资本和资本相交换。资本和收入相交换。资本和价格。（ β ）资本的竞争。（ γ ）资本的积聚。三、资本作为信用。四、资本作为股份资本。五、资本作为货币市场。六、资本作为财富的源泉。资本家。在资本之后可以考察土地所有权。然后考察雇佣劳动。以所有这三者为前提，价格运动作为在流通的内在整体性上被规定的流通来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三个阶级作为在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上和流通的各种前提上來看的生产。其次是国家。（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国家对外：殖民地。对外贸易。汇率。货币作为国际铸币。——最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解体。个人劳动实际转化为社会劳动以及相反的情况。”^{[4]219}

结果是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理论大厦，它对于资本主义可能采取的各种历史地理结构有着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对解释现实情形却不是这么有帮助的。这种现实情形包括对纯粹状态的偏离、纯粹状态的不完善以及对其进行的政治干预，以及那些金融的特殊性或者消费主义离奇的个别性等居于支配地位的情形。最重要的是，商业、金融危机和已确立的充满矛盾的资本运动规律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了 19 世纪肯特郡种植啤酒花和水果的行为，研究中我发现 19 世纪 40 年代在肯特郡中部的自耕农和西印度糖料种植园主之间形成了一个奇怪且不太可能的联盟。两个集团都叫嚷着要减少对糖征收的关税。对于水果种植者来说，这意味着更便宜的糖料和对用来制作果酱和蜜饯的水果的更大需求。这段时期是自由贸易思潮在英国最为盛行的时代，这个思潮是由**希望通过低廉的食物价格来降低劳动力价值**，从而增加他们可以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曼切斯特工厂主引导的。这股思潮主要关注面包的价格，工人们需要在面包上加一点东西。富含糖分的果酱（连同甜茶叶）可以及时为长时间工作的工人提供所需的能量。因而，正如悉尼·明茨在他的著作《甜味与权力》中指出的，产业利益促进了工人对这种可以及时补充能量的含糖食物的消费（因而茶歇时间一直是英国工人阶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对与劳动力价值和强度（在关于“工作日”的章节）有关的贸易政策的分析为这些工人阶级消费形式的推广确立了背景。

资本为这种看起来独特的文化习惯的形成和流传创造了某种“可能性条件”。住宅所有权和“美国梦”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子。

附录 A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卡. 资本论: 第一卷 (共三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ISBN: 9787010041155 (引用页: 3, 9-24, 31, 33).
- [2] 哈维 大.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M]. 刘英,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763610 (引用页: 4, 6-12, 14, 16-19, 21, 24, 25).
- [3] 马克思 卡, 恩格斯 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下册[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引用页: 18, 31, 43, 45, 86).
- [4] 马克思 卡. 资本论: 第二卷 (共三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ISBN: 9787010041162 (引用页: 27, 28, 33, 35-40, 42-46, 86-92, 94-103, 106).
- [5] 马克思 卡, 恩格斯 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上册[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引用页: 29-31, 105, 106).
- [6] 马克思 卡. 资本论: 第三卷 (共三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ISBN: 9787010041179 (引用页: 30, 47-53, 56-69, 71-77, 80-83, 85, 86).